

讀必部幹

本資是義主國帝
段階高最底義主

命革與家國

中動運義主產共
病稚幼「派左」的

礎基義主寧列論



社 放 解

· 讀 必 部 幹 ·

帝國主義本底最高階段
國 家 與 革 命
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左派」幼稚病
論 專 主 義 基 礎

出 版 者 解 放 社

發 行 者 新 華 書 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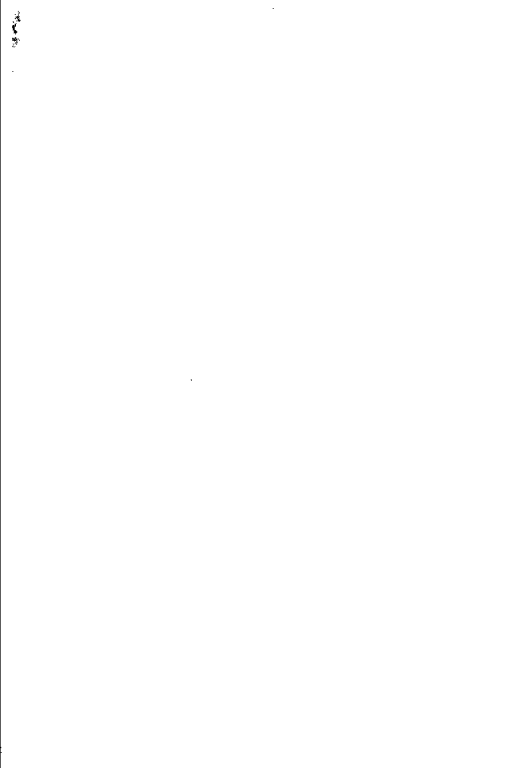
· 一 九 四 九 年 七 月 出 版 ·

1--35,000(P)

著 寧 列

病稚幼「派左」的中動運義主產共

試譯之述議倫道略說其啓教義主學究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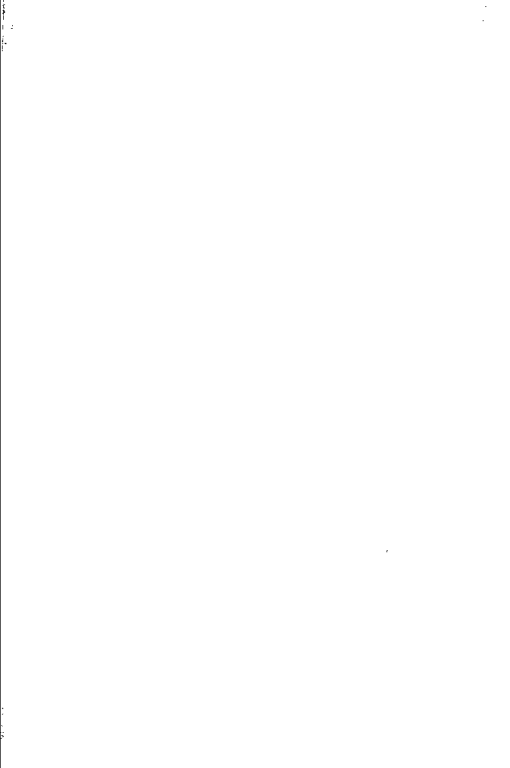
出版者的話

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左派」功偉病是依照蘇聯外國文書籍出版局一九四八年所出中文本列寧文選第二冊所載本書譯文翻印的。

爲了便利參考起見，我們將中文本列寧文選第十八卷所載本書「註釋」轉載在這裏，這個註釋是從俄文版列寧全集譯來的。

解放社編輯部

一九四九年三月



目 錄

- 一 在什麼意思上可以說俄國革命具有國際意義？ 七
- 二 布爾什維克成功的根本條件之一 一〇
- 三 布爾什維主義歷史底主要階段 一四
- 四 布爾什維主義是與工人運動內部那些敵人作鬥爭中成長，鞏固和鍛鍊出來的呢？ 二〇
- 五 德國共產主義「左派」。領袖、政黨、階級、羣衆間的相互關係 二〇
- 六 革命家應否在反動工會內進行工作呢？ 二六
- 七 應否參加資產階級的國會呢？ 二五
- 八 「不作任何妥協」呢？ 二八
- 九 英國共產主義「左派」 二九

一〇 幾個結論 二六

增補

一 德國共產黨人底分裂 二四

二 德國的共產黨人與獨立黨人 二七

三 意大利的屠拉梯之流 三〇

四 由正確的前提作出錯誤的結論 三三

簡要評釋 三六

一 在什麼意思上可以說俄國革命具有國際意義？

根據俄國無產階級奪取政權（舊曆一九一七年十月二十五日，即公曆十一月七日）後最初幾個月的情形看來，似乎因為落後的俄國與西歐各先進國有極大的差異，所以西歐這些國家的無產階級革命，將和俄國革命大不相同。現在我們已有相當豐富的國際經驗，這種經驗十分確切地表明出，我國革命底某些基本點所具有的意義，不是地方性的，不是民族特殊的，也不是俄國單獨的，而是國際的意義。這裏我所講的國際意義，並不是按它的廣義而言；若按我國革命對於各國的影響講來，那末，俄國革命，不僅在某些基本點上具有國際意義，而且在一切基本點和許多次要點上，都具有國際意義。不，我是按這字底極狹義而言，即是說，如果瞭解我國革命底國際意

義是指我國所發生過的現象在國際上也有重大的意義，或者說，這種現象由於歷史的必然性要在國際範圍中重演出來，那末，我們就必得承認，我國革命底某些基本點是具有這種國際意義的。

要是誇大這個真理，認為這個真理所包括的，不僅是我國革命基本點中的某些基本點，那自然是大錯特錯。須知將來即使在一個先進國家中無產階級革命得到勝利以後，多半會發生一種劇變：那時俄國很快地就會不是模範國家，而又成爲落後的（按『蘇維埃的』與社會主義的意義上說）國家——假若忽略這一點，也同樣是錯誤的。

但在目前的歷史階段上，客觀情形却正是如此：即俄國的榜樣向所有各國表明，它們在不遠的將來必然會遇到某些事件，而且是極重大的事件。各國的先進工人，早已懂得了這一點；而且在更常見的情形下，與其說是懂得了這一點，不如說是由於他們革命階級底本能已經感觸到了這一點。

因此蘇維埃政權與布爾什維主義底理論基礎與策略基礎就具有國際『意義』（按其狹義而言）。可是第二國際『革命的』領袖們，如德國的考茨基（二），奧國的鮑威爾（二）和阿得列爾（三）之流，却完全沒有瞭解這一點，因而他們也就成了反動者，成了最下流的機會主義與社會黨叛賣行爲底辯護士。例如，一九一九年在維也納出版標名爲全世界革命（“Weltrevolution” Sozi-

alistische Bucherei, Heft II; Ignaz Brand)的這本無名氏〔四〕的小冊子，特別明顯地表現了他們的整個思想進程和整個思想範圍，更確切些說，表現了他們的思想妄誕、見識迂腐、手段卑污和出賣工人階級利益的行爲，居然到了什麼程度，而且這一切都是用『保護』『全世界革命』的理想來作幌子的。

但是要詳細地來批判這本小冊子，容後有機會時再說，現在我們只要再講到一點：在很久以前，當考茨基還是馬克思主義者而不是叛徒的時候，他以歷史家的態度研究問題，而預見到了將來能有俄國無產階級革命精神成爲西歐模範的局勢。這是一九〇二年的事，當時考茨基在革命的火星報上〔五〕做了一篇標題爲斯拉夫夫人與革命的文章。請看他在這篇文章上所說的話吧：

『現在』（和一八四八年相反）『可以認爲，不惟斯拉夫夫人已經進入革命民族底隊伍，而且革命思想和革命行動底重心漸漸轉移到斯拉夫夫人那裏去了。革命的中心，自西方逐漸移向東方。十九世紀前半期，革命中心在法國，有時亦在英國。到了一八四八年，德意志踏進了革命民族底隊伍；新世紀開始時所發生的事變，使我們感覺到革命中心行將繼續移動，即向俄國移動；俄國曾從西方吸取了非常多的革命創作力，現在它自己或許要成爲西方革命毅力底泉源。烈火般燃燒着的俄國革命運動，也許將成爲最有力的藥劑來把現已開始滋蔓於我們隊伍中間的腐敗庸俗習氣與狹隘政客行爲，一律肅清，而使鬥爭渴望以及對於我們偉大理

想的熾熱忠誠，又能光芒萬丈地爆發起來。俄國久已不是西歐反動勢力與專制制度底支柱了。現在情形可說是恰恰相反。西歐正在成爲俄國反動勢力與專制制度底支柱；俄國革命家如果不是同時必須與沙皇底同盟者，即歐洲資本作戰，那末，他們或許早已打倒了沙皇。我們希望，他們在這次能够把兩個敵人一齊打倒，使新的「神聖同盟」，比它的先輩崩潰得更快一些。俄國現在的鬥爭，無論其結果如何，但是鬥爭中烈士們（可惜犧牲的烈士實在太多了）底苦痛和鮮血，總不會是落空的。他們的苦痛和鮮血將在整個文明世界裏灌溉着社會革命底幼芽，使之發育得更加迅速和更加茂盛。在一八四八年時期，斯拉夫人好像嚴霜一樣，摧殘了人民春氣中的鮮花。現在他們也許將成爲溶解反動勢力這冰雪的風暴，而一往直前地給各國人民開闢幸福的新春。——（卡爾·考茨基著：斯拉夫人與革命一文，載於一九〇二年三月十日出版的俄國社會民主黨革命報紙——火星報第十八期上）

考茨基在十八年前寫得多麼漂亮呵！

二 布爾什維克成功的條件之一

大概，現在差不多任何人都已看得見：如果我們黨內沒有極嚴格的真正鐵一般的紀律，如果我們黨沒有得到工人階級全體羣衆，即工人階級中所有的一切善於思索、忠實、自我犧牲、享有威

信而能引導或吸引落後階層者最完全最忠勇的擁護，那末，布爾什維克就會不僅不能把政權保持兩年半之久，而且不能保持兩月半之久。

無產階級專政是新階級爲反對較強大的敵人，爲反對資產階級而進行的最奮勇和最無情的戰爭，而資產階級底反抗，正因其被推翻（那怕是在一個國家內）而增加十倍，它的勢力不僅在於國際資本底力量，不僅在於資產階級各種國際聯系底力量和堅固性，而且還在於習慣底力量，在於小生產底力量。因爲，可惜小生產在世上還保留着很多很多，而小生產是經常地、每日每時地、自發地大批產生着資本主義和資產階級的。由於這一切原因，所以無產階級專政是必要的，不作長期堅持的殊死戰爭，不作這種需要有堅定性，需要有紀律，需要有堅忍不拔精神和統一意志的戰爭，便不能戰勝資產階級。

我再重說一遍，在俄國獲得勝利的無產階級專政底經驗，明白告訴一切不會思索或對這個問題不會思索過的人們說：實行無條件的集中制與無產階級底最嚴格的紀律，乃是無產階級戰勝資產階級的基本條件之一。

人們時常講到這點。但這點到底是什麼意思，這點在什麼條件之下才有可能，人們却很少加以思索。難道除了向蘇維埃政權及布爾什維克致歡迎辭外，不是還應把布爾什維克爲什麼能造成

革命無產階級所必需的紀律的原因，多多去極認真地加以分析麼？

布爾什維主義作爲一個政治思潮和政黨而存在，是從一九〇三年起。只有布爾什維主義存在以來的全部歷史，才能圓滿說明布爾什維主義何以能够造成並在最困難的條件下保持住無產階級勝利所必需的鐵的紀律。

這裏首先就發生一個問題：革命無產階級黨底紀律，是由什麼東西來維持的呢？是由什麼東西來檢驗的呢？是由什麼東西來鞏固的呢？第一，是由於無產階級先鋒隊底覺悟性，它對革命的忠實心，它的堅毅性，自我犧牲精神和英勇氣概。第二，是由於它善於與最廣大勞動羣衆——首先是與無產者勞動羣衆，但同樣也與非無產者勞動羣衆——聯系，接近，在某種程度上甚至可以說是與他們溶成一片。第三，是由於這先鋒隊所實現的政治領導正確，由於它的政治戰略與策略正確，同時須使最廣大羣衆都能根據本身經驗來確信其正確。如果沒有這些條件，那末真能成爲以推翻資產階級而改造全社會爲己任的先進階級政黨的革命黨，便不能實現其內部的紀律。如果沒有這些條件，那末要想建立紀律的企圖，就不免要變爲空談，變爲虛言，變爲矯飾。可是另一方面，這些條件又不是能一下子產生的。只有長期的努力，艱苦的經驗，才能造成這些條件；只有正確的革命理論，才能使這種條件易於造成，但這個理論又不是教條，而是只有在與真正羣衆

的、真正革命的運動底實踐密切聯繫起來，才能最終形成的。

布爾什維主義之所以能造成最嚴格的集中制和鐵的紀律，並且能在一九一七到一九二〇年異常困難的條件下順利實現這種紀律，其原因只在於俄國有許多歷史上的特點。

一方面，布爾什維主義是於一九〇二年在最堅固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基礎上產生的。而這個——只有這個——革命理論底正確，不僅是由整個十九世紀全世界的經驗證明了，而且特別是由俄國革命思想界底迷誤和動搖，錯謬和失望底經驗證明了。大約在前世紀四十年代到九十年代這五十年內，俄國進步的思想界，處在空前野蠻反動的專制壓迫之下，迫切地注視歐美在這方面的每一種『新發明』。俄國真正用了半世紀的辛苦閱歷忍受空前苦痛與犧牲，表現空前革命勇氣，異常努力和專心致志來從事探討、研究，從事實際檢驗，熬受失望苦楚，參照歐洲經驗等等這樣半世紀的辛苦閱歷，才掙得了馬克思主義這個唯一正確的革命理論。因為俄國革命人士不堪沙皇政府底迫害而不得不僑居國外，所以革命的俄國在十九世紀後半期擁有非常豐富的國際聯絡，對於各國革命運動底形式與理論非常熟悉，實為世界上任何一國所不及。

另一方面，在這個異常堅固的理論基礎上產生出來的布爾什維主義，又有了十五年（一九〇三到一九一七年）的實踐閱歷，這種閱歷底豐富，也是世界上無與倫比的。因為在這十五年内，

任何一國，無論就革命經驗，或就革命運動各種形式，即合法的與非法的，和平的與激烈的，秘密的與公開的，小組的與羣衆的，國會方式的與恐怖主義的種種形式彼此更替迅速和複雜性上說，都沒有過這樣多的閱歷，甚至近似這樣多的閱歷。任何一國都沒有在這樣一個短促的時期內，把現社會一切階級底各種鬥爭形式、鬥爭方法和鬥爭色彩聚積得這樣豐富，並且這個鬥爭又因為俄國落後和沙皇政府殘暴壓迫，而成熟得特別迅速，總是特別迫切特別有效地領會歐美政治經驗方面相當的『新發明』。

三 布爾什維主義歷史底主要階段

革命準備年代（一九〇三到一九〇五年）。處處感覺到風暴底逼近。一切階級內部都在醞釀着和準備着。國外僑民的報紙，都在理論上提出了革命底一切根本問題。三個主要階級，三個主要政治派別底代表，即資產階級自由派，小資產階級民主派（它掛着『社會民主』黨與『社會革命』黨的招牌）以及無產階級革命派底代表，在綱領觀點與策略觀點上進行激烈的鬥爭，以此預示和準備着行將來臨的公開階級鬥爭。凡羣衆在一九〇五到一九〇七年以及一九一七到一九二〇年間用武裝鬥爭來解決的一切問題，都可以（而且應當）在那時刊物上看到它們的雛形。在這

三個主要派別之間，自然還有無數其他中間的、過渡的、不徹底的派別。更確切一點說，在機關報、政黨、政派、政團間的鬥爭中，形成起真正代表階級的各政治思想派別；各階級都鍛鍊着自己思想上與政治上的適當武器，以備來日廝殺。

革命年代（一九〇五到一九〇七年）。一切階級都公開出台了。一切綱領上與策略上的觀點，都經受着羣衆運動底檢驗。罷工鬥爭底廣泛與激烈性，爲全世界空前所未有。經濟罷工轉變爲政治罷工，而政治罷工又轉變爲武裝起義。領導者無產階級與動搖不定的被領導者農民之間的相互關係，經受着實際的檢驗。在鬥爭的自發過程中，產生了蘇維埃的組織形式。當時關於蘇維埃意義的爭論，已預示一九一七到一九二〇年間的偉大鬥爭。國會的鬥爭形式與非國會的鬥爭形式，抵制國會的策略與參加國會的策略，合法的鬥爭形式與非法的鬥爭形式底交替，以及這些鬥爭形式間的相互關係與聯系——所有這一切，都表示出令人驚訝的豐富內容。如就羣衆和領袖，階級和政黨所受到的政治科學原理的訓練而言，那末這時期每一個月可以等於『和平』『憲法』發展時期的整整一年。沒有一九〇五年的『總演習』，則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底勝利便是不可可能的。

反動年代（一九〇七到一九一〇年）。沙皇制度勝利了。一切革命的與反政府的政黨都失敗

了。消沈、頹喪、分裂、渙散、叛變和猥褻言論等等代替了政治活動。對唯心哲學的趨向加強；神祕主義成爲掩蔽反革命情緒的煙幕。但同時正是這種大失敗給革命政黨與革命階級以真正的最有益的教訓，歷史辯證法底教訓，即瞭解進行、善於進行和巧妙進行政治鬥爭的教訓。患難之中識故交。戰敗的軍隊善於學習。

獲得勝利的沙皇制度，不得不加速破壞資本主義前期的宗法制度殘餘。俄國資本主義很快地發展着。非階級和超階級的幻想，相信可以避免資本主義的幻想，從此煙消雲散。階級鬥爭完全用新的方式表現出來，並且表現得更加顯著。

革命黨應當補習。它們已學習過怎樣進攻。現在應當瞭解，除了學會怎樣進攻而外，還必須學會怎樣正確退却。必須瞭解，——而且革命階級已在根據本身的沉痛經驗來學習瞭解，——不學會正確的進攻和正確的退却，是得不到勝利的。在一切被擊破的反政府黨和革命黨中間，布爾什維克退却得最有秩序，他們的「軍隊」損失的最少，他們的幹部保存得最好，黨內分裂最微（就其分裂的深度與難於挽救的程度而言），頹喪狀態最輕，它最能於用最廣大的規模，最正確的辦法和最強大的毅力去恢復工作。布爾什維克之所以能够如此。只是因爲他們無情地揭破並驅逐了專事空談的革命家，這些人不願瞭解，必須退却，必須善於退却；他們不願瞭解，一定要學

會在最反動的國會、最反動的職工會、協作社以及保險救濟等等組織中去進行公開工作。

革命高漲年代（一九一〇到一九一四年）。革命高潮最初發展得非常緩慢。一九一二年連拿慘案（六）發生後，便稍微快些了。布爾什維克克服莫大的困難，才打退了孟什維克。孟什維克是工人運動中資產階級的走狗，整個資產階級在一九〇五年以後，看清了他們的這種作用，所以百般幫助他們來反對布爾什維克。但如果布爾什維克不是運用了正確的策略，把非法的工作與必須利用的「合法可能」配合起來，那他們是永遠也不能打退孟什維克的。在最反動的杜馬內，布爾什維克奪得了全部工人議席。

第一次世界帝國主義戰爭時期（一九一四到一九一七年）。合法的國會工作，在「國會」極端反動的條件下，都使革命無產階級底政黨——布爾什維克黨獲得了極大的益處。布爾什維克的議員被流放到西伯利亞去（七）。社會帝國主義，社會沙文主義，社會愛國主義，不徹底的與澈底的國際主義，和平主義以及反和平主義幻想的革命主張，這些派別中各色各樣的觀點，都在我們國外僑民這裏的報紙上完全反映出來了。第二國際中的書呆子與老太婆，帶着輕視高傲態度，發起尊頭，嘲笑俄國社會主義運動內「派別」複雜及其彼此間鬥爭的劇烈，可是當大戰把一切先進國內稱頌一時的「公開」可能取消以後，他們甚至連近似俄國革命家在瑞士及在其他許多國家裏

所辦到的自由（秘密）交換意見，自由（秘密）定出正確觀點這樣的事情，都一籌莫展。因此各國公開的社會愛國派與「考茨基派」，都成了無產階級底最惡劣的叛徒。布爾什維主義在一九一七到一九二〇年間之所以能夠獲得勝利，其基本原因之一，就是由於它從一九一四年末起，就已無情地揭破了社會沙文主義和「考茨基主義」（法國的龍格主義（八），英國的獨立工黨首領與費邊派（九），意大利的居拉梯（一〇）等底見解，都與「考茨基主義」相同）之卑鄙醜態，而羣衆後來本看自身的經驗，也日益相信了布爾什維克觀點底正確。

俄國第二次革命（一九一七年二月至十月）。沙皇制度之不可想像的痼疾宿弊和腐敗現象（加上痛苦萬分的戰爭底深創鉅痛），造成了一種反對它的莫大的破壞力。在幾天之內，俄國就變成了資產階級的民主共和國，比世界上任何一國（在戰爭環境裏）都要自由一些。共和國就政府黨與革命黨底領袖，也和最「嚴格的國會制」共和國內一樣，出來組織政府，而且從前在國會內（雖然是在絕頂反動的國會內）反政府黨領袖底稱號，使得這種領袖易於在革命中繼續起自己的作用。

孟什維克與「社會革命黨人」，在幾個星期內，就精通了第二國際底歐洲英雄們，閥員主義派以及其他機會主義壞蛋們底全套方法和手腕，全般論據和詭辯。我們現在讀到一切描寫謝德曼

〔二二〕和諾斯克〔二三〕，考茨基和希法亭〔二四〕，倫勃爾〔二五〕和阿烏斯鐵得里茨〔二六〕，奧托·施威爾和弗里茨·阿得列爾，居拉梯和龍格，英國費邊派及「獨立工黨」領袖等等的文字，總覺得這（事實上也是如此）都是枯燥無味地重彈那套陳腔舊調而已。所有這些，我們都在孟什維克那裏看見過了。歷史惡作劇，使一個落後國家的機會主義者，把許多先進國家機會主義者底故技，變本加厲地表演出來了。

第二國際底一切英雄們遭受了破產，他們在估計蘇維埃和蘇維埃政權底意義與作用這個問題上大丟其臉，現在脫離了第二國際的三個主要政黨（就是德國獨立社會民主黨，法國龍格黨和英國獨立工黨）底領袖們在這個問題上的手醜行為與糊塗觀念，特別「燦爛地」表明出來了，所有他們都成了小資產階級民主主義偏見底奴隸（與一八四八年自命為「社會民主主義者」的小資產者完全一樣），凡此種種，我們在孟什維克底例子上都已經看見過了。歷史惡作劇，使俄國在一九〇五年產生了蘇維埃；一九一七年二月至十月間，孟什維克僞造了蘇維埃，而這些人因為不能了解蘇維埃底作用與意義，以至於破了產；現在，在全世界上都發生了蘇維埃政權的思想，這種思想以空前未有的速度傳播於各國無產階級中間，同時第二國際的老英雄們，也和我們的孟什維克一樣，因為不能了解蘇維埃底作用與意義，到處都在破產着。經驗已經證明，在無產階級革命

某些很重要的問題上，其他一切國家都必然要經過俄國所已經走過的道路。

布爾什維克在開始進行反對資產階級國會制（事實上的）共和國和反對孟什維克的勝利鬥爭時，是很審慎的，準備這種鬥爭也絕不是像現時在歐美各國裏所常聽說的那麼簡單。在這個時期之初，我們並不會號召推翻政府，而是說明：如果不預先改變蘇維埃底成份與情緒，那末，推翻政府是不可能的。我們並不會宣告要抵制資產階級的國會，即立憲會議，而是說過（自一九一七年我們黨底四月代表會議起，便用黨底名義正式說過）：有立憲會議的資產階級共和國，要比沒有立憲會議的好些，但「工農」蘇維埃共和國，却比任何資產階級民主國會制的共和國，都要好些。如果沒有這種謹慎的、周詳的、仔細的、長期的準備，那末，我們在一九一七年十月就不能得到勝利，也不能保持這個勝利。

四 布爾什維主義是與工人運動內部那些敵人作鬥爭中成長、鞏固和鍛鍊出來的呢？

首先而且主要的，是在與機會主義作鬥爭中，這種機會主義到一九一四年，澈底變成了社會沙文主義，澈底轉到了資產階級方面來反對無產階級。自然，這種機會主義曾經是布爾什維主義

在工人運動內部的主要敵人。它在國際範圍內現在仍然是主要的敵人。這個敵人無論過去和現在都是布爾什維主義所最注意的。布爾什維克在這方面的活動，現在國外也已經知道得很清楚了。

講到工人運動內部布爾什維主義底另一個敵人，就不同了。國外還很少知道，布爾什維主義是在和小資產階級的革命狂熱作長期鬥爭中成長發育和鍛鍊出來的。這種革命狂熱，類似無政府主義，或有些地方則竊無政府主義，它在所有一切主要問題上，都離棄無產階級的堅忍階級鬥爭所必需的條件與要求。在理論上為馬克思主義者所完全認定，並已為一切歐洲革命與革命運動經驗所充分證實的是：小有產者，即小業主（這一社會階層，在歐洲許多國家裏，有極廣大的羣衆代表），由於在資本主義制度下經常受到壓迫，且異常急速地陷於貧困和破產，所以容易轉到極端的革命狂熱，但不能表現出堅忍性、有組織、有紀律和堅定精神。被資本主義摧殘得以及於『發狂』的小資產者，也和無政府主義一樣，都是一切資本主義國家所固有的一種社會現象。這種革命狂熱之動搖不定，華而不實，以及迅速轉為馴服、消沈和幻想，甚至轉為『瘋狂』地醉心於某種資產階級的『時髦』思潮——這種本性，都是人所共知的。可是，革命黨在理論上抽象地承認這些真理，這還是絲毫不能使自己免去舊的錯誤，這種錯誤，一遇到意外事端，在特殊的——多少特殊的——環境裏，總是要以稍新的形式，即前此所未見過的外形，重新發作起來。

無政府主義，往往是對工人運動中機會主義罪惡的一種處罰。這兩種時形互相補充。俄國居民中，小資產階級成份雖較西歐各國更多，但無政府主義在兩次革命（一九〇五年與一九一七年）及其準備時期，影響上却比較微末，其原因，一部分毫無疑義是由於布爾什維主義底功勞，由於它始終進行了最無情和最不調和的反機會主義的鬥爭。我之所以說「一部分」，是因為削弱俄國無政府主義勢力的，還有另一個更重要的原因，這就是無政府主義在過去（十九世紀七十年代）曾發展得異常繁盛，因而澈底暴露了它的不正確性，暴露了它不能成爲革命階級的領導理論。

布爾什維主義還在一九〇三年產生時，便承受了與小資產階級的、半無政府主義的（或者是傾向無政府主義的）革命狂熱作無情鬥爭的傳統；這種傳統向來是革命的社會民主黨所具有的，而在一九〇〇到一九〇三年間，當俄國革命無產階級底羣衆政黨奠定自己基礎的時候，這種傳統就特別穩固了。布爾什維主義承受並繼續這種鬥爭，它在三個主要點上與那表現小資產階級革命狂熱最厲害的政黨，即與『社會革命黨』作鬥爭。第一個主要點，就是這個否認馬克思主義的政黨，絕不願（確切點說：是不能）了解，每次政治行動以前，必須先在客觀上嚴格估計到各階級底力量及其相互關係。第二個主要點，就是這個政黨把個人恐怖和暗殺手段，看作是自己的特殊

『革命精神』與『左的精神』表現，而我們馬克思主義者却堅決排斥這種手段。自然，我們之所以排斥個人恐怖，只是因為這種手段不適當，至於有些人竟在『原則上』斥責法國大革命底恐怖行為，或一般斥責那已經取得勝利而被全世界資產階級圍攻的革命黨所採取的恐怖手段，那末這種人還在一九〇〇到一九〇三年間就已被普列漢諾夫（二六）（那時他還是馬克思主義者和革命家）所嘲笑過和唾棄過（二七）。第三個主要點，就是『社會革命黨人』以為自己的『左的精神』，就在於他們惡意嘲笑德國社會民主黨內比較輕微的機會主義罪過，同時他們自己却在某些問題上，例如在土地問題或無產階級專政問題上，模倣該黨內極端的机会主義者。

這裏附帶說明一句，歷史的事實，現時已在全世界歷史巨大範圍內證實了我們所始終堅持的這種意見是正確的，就是說，革命的德國社會民主黨（請注意，普列漢諾夫還在一九〇〇到一九〇三年間就已要求開除伯恩施坦（二八）底黨籍（二九），而布爾什維克始終繼承着這種傳統，在一九二三年完全揭破了列金（三〇）底全部卑鄙叛變行動）原是最·近·似·於·革·命·無·產·階·級·為·取·得·勝·利·所·必·要·的·政·黨。現在一九二〇年，經過戰爭期間與戰後最初幾年一切可恥的破產與危機之後，可以明顯看出，在西歐一切政黨中間，正是德國的革命的社會民主黨，產生了最好的領袖，而且它重新恢復元氣和健康也比其他各國黨早些。無論在斯巴達克黨（三一）方面或『德國獨立社會民主

黨」內的無產階級左派方面，都可以看出這一點，這個左派進行着不屈不撓的鬥爭，反對考茨基、希法亭、萊得布爾（二二）、克里斯平（二三）之流底機會主義和空無氣節的行爲。如果我們現在把已經完全結束的歷史時期，即從巴黎公社起到第一個社會主義蘇維埃共和國成立時止這時期作一總的考查，便可看出馬克思主義對於無政府主義，一般地採取了十分明確的態度。歸根到底馬克思主義是對的；雖然無政府主義者曾正確地指斥大多數社會黨內所盛行的國家觀是機會主義的，但是，第一，這種機會主義乃是由於曲解或甚至故意隱匿馬克思對於國家的見解（我在國家與革命一書中，已經指出，恩格斯有一封致伯爾（二四）的信，異常明顯嚴厲而直截了當地揭破了社會民主黨內所流行的機會主義國家觀，可是這封信被伯爾由一八七五到一九一一隱藏了達三十六年之久）；第二，正是歐美社會黨中最忠實於馬克思主義的派別，最迅速地、最廣泛地糾正了這種機會主義的謬見，承認了蘇維埃政權，承認它優於資產階級的國會民主制。

布爾什維主義與自己黨內的「左」傾向鬥爭，其範圍有兩次是特別廣泛的：第一次是在一九〇八年關於是否參加最反動的「國會」以及是否參加受最反動法律限制的公開工人組織的問題；第二次是在一九一八年（布列斯特和約（二五）時）關於可否容許某種「妥協」的問題。

在一九〇八年，「左派」布爾什維克，由於固執己見，不願瞭解必須參加反動「國會」而被

開除了黨籍，那時「左派」——他們中間有許多是很好的革命家，後來又成了（並且現在也是）共產黨的忠實黨員——所特別援引的證據，便是一九〇五年抵制國會成功的經驗。當一九〇五年八月沙皇宣佈召集諮詢性的「國會」時，布爾什維克與一切反政府黨及孟什維克相反，曾宣佈抵制國會，而一九〇五年的十月革命也就果然把國會掃除了。那次抵制之所以正確，並非一般地不參加反動國會是對的，而是因為正確估計了當時的客觀形勢，即使羣衆罷工迅速轉為政治罷工，再轉為革命罷工，再轉為武裝起義的這種形勢。此外，那時的鬥爭是爲了這樣一個問題：讓沙皇去召集第一次代議機關，還是要設法把這召集權從舊政府手中奪取過來呢？但以後既沒有把握，而且不能有把握來斷定，是否會有同樣的客觀形勢存在，以及這種形勢是否會按照相同的方向和採取同樣的速度向前發展，所以，抵制的策略便不復是正確的了。

一九〇五年布爾什維克抵制「國會」，使革命無產階級獲得了非常寶貴的政治經驗，因為它表明了，在合法的與不合法的，國會內的與國會外的鬥爭形式互相配合的條件下，善於拒絕國會內的鬥爭，有時是有益處，甚至是必要的。但若把這種經驗盲目地、機械地、輕率地搬到別種條件和別種情況中去，便是大錯特錯。一九〇六年布爾什維克抵制杜馬，已經是一個錯誤，雖然這個錯誤是個不大的，容易改正的。至於一九〇七年，一九〇八年以及以後幾年的抵制，却是極嚴

重而很難糾正的錯誤，因為當時一方面既不能期待革命浪潮能很快高漲，更無急轉為武裝起義的希望，另一方面，正在維新的資產階級君主制度之整個歷史環境，使我們必須把公開工作與秘密工作互相配合起來。現在試一回顧已經完全結束的整個歷史時期，——這個時期與以後各時期之聯系，已完全表現出來了，——就特別顯著地表明，假使布爾什維克當時不在最激烈的鬥爭中，堅持一定要把公開鬥爭形式與秘密鬥爭形式配合起來，一定要參加最反動的國會以及參加受反動法律所限制的各種組織（如保險儲金會等），那末他們在一九〇八到一九一四年間，就決不能保持（更不用說鞏固、發展和加強）無產階級革命黨底中堅幹部。

一九一八年的鬥爭不會弄到分裂。那時『左派』共產黨人只在黨內形成了一個單獨團體或『小組織』，而且時間也不久。就在這一九一八年，『左派共產主義』最出色的代表，如拉狄克（二六）、布哈林（二七）等同志，都公開承認了自己的錯誤。他們以為布列斯特和約，是原則上不可容許的，並且對革命無產階級政黨說來是與帝國主義者進行妥協的有害行為。這的確是與帝國

● 凡評論個人的話，相當修改，亦可適用於政府和政黨。聰明人並不是不犯錯誤的人。不犯錯誤的人是沒有面

且也不能有的。聰明人是不犯重大錯誤，同時又是能迅速地糾正這種錯誤的人。

主義者的妥協，但在當時的情形之下，這種妥協正是必要的。

現在當我聽到例如「社會革命黨人」攻擊我們簽定布列斯特和約的這個策略的時候，或者當蘭斯白雷（二八）同志和我談話，講到「我們英國工聯底領袖們說，如果布爾什維克可以和別人妥協，那他們也可以和別人妥協」的時候，我總是首先用一個簡明「通俗的」比喻來回答說：

假定你的汽車被武裝強盜攔住了。你把自己的金錢、護照、手槍、汽車都交給他們。你因此才得幸免匪患。這當然是一種妥協。「Do ut des」（我給「你的金錢、手槍、汽車，『以便你給』我安全脫身的機會）。但是很難找到一個頭腦健全的人，會說這種妥協是「原則上不可容許的」，或者說，這個權行妥協的人是同強盜合夥（雖然強盜坐上汽車之後，可以利用汽車和手槍再去搶劫別人）。我們和德帝國主義強盜的妥協，正與這樣的妥協相類似。

但是俄國的孟什維克與社會革命黨人，德國的謝德曼派（考茨基派也與他們大同小異），與國的鮑威爾與阿得列爾（更不用說倫勒爾這批先生們），法國的倫諾德爾（二九）和龍格之流，英國的費邊派、「獨立黨」人、「勞動派」（「工黨分子」）等，在一九一四到一九一八年間以及一九一八到一九二〇年間，同他們本國的資產階級強盜，而且有時同「協約國的」資產階級強盜們妥協起來，以反對本國的革命無產階級，所有這些先生們底這種行動，才真是同強盜合

夥哩。

結論是很顯然的：「原則上」反對妥協，不問妥協的性質如何，而一般地絕對地反對任何妥協，這完全是孩稚氣，同這種孩稚氣甚至難於認真講話。一個政治家，如果願意為革命的無產階級謀利益，就應當善於根據具體情況去辨別那種妥協是不能容許的，是表現機會主義與叛賣行為的，對這類具體的妥協便要用全力去批評，最無情地去揭破，並毫不調和地向它宣戰，決不許那些老於世故「拘於細行」的社會黨人以及國會主義的狡猾之徒，藉「一般是否可以妥協」的談論來脫身卸責。英國工聯領袖以及費邊社和「獨立」工黨底先生們，正是用這個方法來卸脫他們所作的叛賣行為和已實行的這種確是最惡劣機會主義、叛賣、變節的妥協的責任。

有各種各樣的妥協。應當善於分析每個妥協或每個變相妥協底環境和具體條件。應當學習區分這樣的兩種人：一種人把金錢和武器交給強盜，為的是要減少強盜所能加與的禍害，以便後來易於拘捕和槍斃這班強盜；另一種人，把金錢和武器交給強盜，為的是要入夥分贓。這點在政治上決不是隨時都像在這個幼稚簡單的例子中，那樣容易分辨。如果有人異想天開，要替工人們想出一個包診百病的萬應藥方，或者約許說在革命無產階級的政策上，不會有任何困難和複雜情形，那他便祇是一個騙子。

爲避免誤解起見，我試來很簡單地敘述幾個基本點，作爲分析具體妥協的參考。

簽定布列斯特和約而與德帝國主義者實行妥協的這個政黨，從一九一四年末，就曾規定用它的真正的國際主義。它不怕在兩夥帝國主義強盜戰爭中提倡使沙皇帝制失敗的主張，它不怕指斥「保護祖國」的議論。這個政黨底國會議員，不去謀資產階級政府裏的總長高位，而却到西伯利亞去充軍。革命興起，推翻了沙皇制度，建設了民主共和國，使這個政黨受到新的極大的考驗：它不和「自己的」帝國主義者作任何妥協，而準備好了推倒他們，並且果然把他們推倒了。這個政黨，取得了政權以後，便澈底廢除了地主與資本家底私有制。這個政黨既公佈和廢棄了帝國主義者所締結的密約，又向各國人民建議和平，直到英法帝國主義者拆垮了和議而布爾什維克業已竭盡全力去促進德國和其他國家的革命以後，不得已才屈服於布列斯特強盜暴力之下。這樣的政黨，在這樣的環境下所締結的這樣的妥協，其完全正確性，對於一切人都已是日益昭然若揭的了。

俄國孟什維克與社會革命黨人（正如一九一四到一九二〇年間全世界上第二國際底全體領袖們一樣），一開始就實行叛賣，直接或間接辯護「保護祖國」口號，即保護本國的強盜資產階級。他們所繼續的叛賣行動，就是與本國的資產階級聯合，與本國的資產階級一起去反對本國的

革命無產階級。他們在俄國起初與克倫斯基〔三二〕和立憲民主黨聯合，後來又與高爾察克〔三三〕和鄧尼金〔三四〕聯合，正如他們在國外的同道者與各該國資產階級聯合一樣，都是投降到資產階級方面來反對無產階級。他們和帝國主義強盜妥協，自始至終只有一個目的，就是與帝國主義強盜合夥打劫。

五 德國共產主義「左派」領袖、政黨、階級、羣衆間的相互關係

現在我們所要說到的那些德國共產黨人，他們不稱自己爲「左派」，而稱爲——如果我沒有記錯的話——『原則上的反對派』。但是他們完全具有『左派幼稚病』底一切症候，這從下面的說明中可以看出得清楚。

有一本表現這個反對派觀點的小冊子，叫做德國共產黨（斯巴達克團）之分裂〔三五〕，是由萊因河岸法蘭克福城地方黨組出版的；這本小冊子把該反對派意見底實質，敘述得最顯著、確切、簡明扼要，只須引證其中幾段，便可使讀者認識這種實質：

「共產黨是最堅決的階級鬥爭底政黨……」

「……就政治方面看來，這個過渡時期（從資本主義過渡到社會主義）乃是無產階級專政時期……」

「現在發生一個問題：誰應當是專政底執行者：共產黨呢，還是無產階級呢？在原則上應努力實現共產黨底專政呢，還是實現無產階級底專政呢？」（着重點均按照原文）

往下該作者便責難德國共產黨「中央」，說「中央」企圖和德國獨立社會民主黨聯盟，說「中央」之所以提出「原則上承認一切政治鬥爭手段（包括參加國會）的問題」，只是爲要掩飾它想與獨立黨人聯盟的真正主要圖謀。這本小冊子上接着說道：

「反對派選擇了另一條道路。它以爲共產黨統治與黨底專政的問題，只是策略問題。無論如何，共產黨底統治乃是各種政黨統治的最後形式。原則上應致力於實現無產階級專政。所以黨底一切設施，黨底組織，黨底鬥爭形式，黨底戰略和策略，都須適合於這一目的。因之，凡是與其他政黨妥協，凡是回頭再去採用歷史上和政治上已經過時的國會鬥爭形式，凡是實行機動和妥協的政策，都應當十分堅決地予以排斥。」

「應特別強調無產階級所特有的革命鬥爭方法。爲要包括那些應在共產黨指導下進行革命鬥爭的最廣大無產階級羣衆及階層，就必須建立具有最廣闊基礎和最廣大範圍的新的組織形式。這種爲一切革命分子所匯集的組織，便是以工廠組織爲基礎而建立起來的工人聯合會。凡是聽從「退出職工會」口號的工人，都應當集合在這裏。正是在這裏，把從事鬥爭的無產階級，編成爲最廣大的戰鬥隊伍。只要承認階級鬥爭，承認蘇維埃制度，承認無產階級專政，便可以加入。至於此外對從事鬥爭的羣衆之政治教育以及鬥爭中的政治指導，

則是工人聯合會以外的共產黨任務！」

「可見，現在有兩個共產黨彼此對立着：

「一個是領袖底黨，這個黨企圖從上而來組織革命鬥爭，並支配這個鬥爭，它不惜採取妥協政策，贊成國會制度，以便造成一種局面，使他們可以參加實行專政的聯合政府。

「另一個是羣衆底黨，這個黨等待革命鬥爭從下而高漲起來，它爲了這種鬥爭，只知道並採用一個明確而向於目的的方法，就是排斥任何國會制度和機會主義手段；這個唯一的方法，便是毫無條件的批判，階級，以俾然後建立無產階級的階級專政來實現社會主義！」

「……那裏是領袖專政——這裏是羣衆專政！這便是我們的口號。」

這就是表明德國共產黨內反對派觀點的最重要的論旨。

每個布爾什維克，凡是自覺地參加過或親切地觀察過一九〇三年以來布爾什維主義底發展史，一讀到這番議論之後，便立刻會說：「這是何等陳腐的，早已聽慣了的廢話！這是何等『左』的幼稚氣！」

但是我們要把這種議論更切近地考察一下。

單從提出「是黨專政，還是階級專政？是領袖專政（領袖黨），還是羣衆專政（羣衆黨）」

這一問題的事實來看，就可知道人們思想糊塗到了極端不可思議，無可救藥的地步。這些人枉費心機，異想天開，結果却弄巧反拙。誰也知道，羣衆是劃分爲階級的；只有把一般極大多數並不區分其在生產中之社會地位的人民與在生產中佔有特殊社會地位的類別對立時，才可以把羣衆和階級對立起來；誰也知道，在大多數情形下，至少是在現代文明國內，階級通常是由政黨來領導的；政黨通常是由最有威信，最有影響，最有經驗，被選出担任最負責職務而稱爲領袖的人們所組成的多少固定的集團來主持的。這都是起碼的常識。這都是簡明的事實。爲什麼偏要來這一套胡說八道？偏要這樣標新立異呢？一方面，大概因爲黨底公開狀況和秘密狀況之迅速更替，破壞了領袖、政黨和階級之間的普通、正常、簡單關係，於是人們陷入困難地位而弄得糊塗莫解。在德國，也如在歐洲其他國家裏，人們太習慣於合法生活，習慣於由各政黨按期舉行的代表大會遵照正確手續來自由選舉「領袖」，習慣於用國會選舉、羣衆大會、報章雜誌、職工會和其他團體情緒等等的簡便辦法來檢閱各政黨底階級成份。但是當革命急劇進展，國內戰爭擴大，因此不得不拋棄這種種通常的工作方式，而迅速轉到公開工作與秘密工作之互相更替及其互相配合，不得不採用「不方便的」「非民主的」方法來提出或推出或保留「一批領袖」——這個時候，人們便張皇失措，於是妄想出一種絕無僅有的謬論，大概荷蘭共產黨內某些黨員（三五），由於他們不幸

生在一個小國內，享有特別優越與特別穩固的公開狀況底傳統和條件，從來不曾見過公開狀況與秘密狀況之互相更替，於是陷入迷途，茫然無措，竟助長了這種荒謬的臆想。

另一方面，顯然只是推拾一些所謂『羣衆』、『領袖』這類現代『時髦』字眼，而毫不加以思索，隨便濫用。這些人時常聽到並且切實學會了怎樣攻擊『領袖』，怎樣把『領袖』和『羣衆』對立起來；但是他們却不善於想一想這彼此間的關係，不善於把問題闡明清楚。

在帝國主義戰爭末期以及戰後時期，在一切國家裏，『領袖』和『羣衆』之間背道而馳的現象表現得特別顯著。這個現象底根本原因，馬克思與恩格斯在一八五二年至一八九二年間已用英國的例子再三說明過。英國底壟斷地位使『羣衆』中產生出一部分半市儈的機會主義的『工人貴族』。這種工人貴族底領袖，總是投奔到資產階級方面，受資產階級直接或間接餵養。馬克思之所以從這班混蛋那裏博得令人尊敬的仇恨，就是因為他公開指斥他們爲叛徒。最新（二十世紀）的帝國主義，替某些先進國家創造了壟斷的特權地位，正是在這個基礎上，就在第二國際裏到處都出現了變節領袖，機會主義者，社會沙文主義者，他們祇顧自己本行底利益，自己工人貴族階層底利益。於是就造成機會主義政黨之脫離『羣衆』，即脫離最廣大勞動階層，脫離他們中間大多數，脫離工資最低工人的現象。如果不同這個禍害作鬥爭，不把這些機會主義的變節領袖加以

揭破，加以恥辱和驅逐，則革命無產階級的勝利便是不可能的；而第三國際所進行了的就是這樣的政策。

在此種情況下，一般地把羣衆專政和領袖專政對立起來，那就是荒謬愚蠢到可笑的地步。殊不知在『打倒領袖』這口號掩飾之下，實際上却把一些胡言爛語怪誕絕出的新領袖推舉出來，代替對於簡單事物持着一般人性見解的舊領袖，這就尤其可笑了。這些新領袖在德國便是勞芬別爾格〔三六〕、沃里夫赫木〔三七〕、霍爾斯爾〔三八〕、什列迭爾〔三九〕、文迭爾〔四〇〕、額列爾。額

● 共產主義工人報(四)，(漢字一九二〇年二月七日出版的第三十二期所載額列爾論解散政黨一文)上說：

『工人階級不先消滅資產階級民主制，便不能破壞資產階級的國家，但若不先破壞政黨，就不能消滅資產階級的民主制。』

拉丁各國工團主義者和無政府主義者中間喧騰最昏亂的人物，可以『心曠神怡』了，因為顯然以馬克思主義者自命的德國人（額列爾及霍爾斯爾在上述報紙上發表的文章中，特別莊重地證明：他們認為自己是莊重的馬克思主義者，同時却特別可笑地說出荒謬絕倫的話，顯示他們不懂得馬克思主義底初步原理）也發表這種完全不合邏輯的謠言。可見僅僅承認馬克思主義，還不能免除錯誤。俄國人特別明白這一點，因為

列爾企圖「加深」問題，他宣稱政黨都是具有「資產階級性」的，宣佈政黨根本上就不需要，這真是絕頂的荒謬之談，我們只有對之搖頭棄絕。這真是：如果固執錯誤，深刻地辯護錯誤，將錯誤「貫徹到底」，那末，小錯誤就常常可以弄成怪誕絕倫的大錯誤。

否認黨，否認黨的紀律——這就是反對派底主張所得到的結果。這就等於完全解除無產階級底武裝，以幫助資產階級。這就等於小資產階級的散漫、動搖、不能堅忍、不能團結、不能整齊動作等等的劣根性，這種劣根性如果任其橫行，必使任何無產階級的革命運動都會一敗塗地。從共產主義的觀點上看來，否認黨就無異是從資本主義破產底前夜（在德國），而不經過共產主義低級階段和中級階段，一躍而至共產主義底最高階段。我們在俄國（推倒資產階級以後的第三年）正經歷着從資本主義過渡到社會主義，即共產主義低級階段去的初步。階級仍舊存在，而且任何地方在無產階級取得政權以後多年內，階級還是會存在的。只有在英國，這個時期或許可以縮短，因為那裏沒有農民（但總還是有小業主！）。消滅階級，這不僅是驅逐地主和資本家，——這一點我們是已經比較容易地做到了，——而且還是消滅小商品生產者，但這種人是不可驅逐，

不可鎮壓的，須要和他們和睦共居，可以（而且應當）改造他們，重新教育他們，並且只能是用很長期的、緩慢的、謹慎的、組織者的工作來改造他們，重新教育他們。他們用小資產階級自發勢力來從各方面包圍無產階級、浸染無產階級、腐化無產階級，在無產階級內部經常引起小資產階級的懦弱性、渙散性、個人主義，由在熱轉為灰心等等舊病復發的現象。所以在無產階級政黨內，必須有最嚴格的集中制與紀律，以便抵制這種惡劣影響，以便正確地、有效地和勝利地實現無產階級組織者的作用（這是無產階級底主要作用）。無產階級專政是為反對舊社會勢力及其傳統而進行的堅持的鬥爭，流血的與不流血的、強力的與和平的、軍事的與經濟的、教育的與行政的鬥爭。千百萬入底習慣勢力是最可怕的勢力。沒有在鬥爭中鍛鍊成鋼鐵一般的黨，沒有為本階級裏全體忠誠分子所信任的黨，沒有善於考察羣衆情緒和善於影響羣衆情緒的黨，那末要順利進行這樣的鬥爭，是不可能的。戰勝強大而集中的資產階級，較之『戰勝』千百萬小業主，要容易千百倍。而這些小業主以其日常、瑣碎、無影無形、不可摸捉的腐化作用所造成的結果，正是資產階級所需要的東西，正是使資產階級復辟的東西。誰祇要稍微減弱無產階級黨內鐵的紀律（特別是在無產階級專政時期），那他在事實上就是幫助資產階級來反對無產階級。

除了領袖、政黨、階級、羣衆間的相互關係問題外，還必須提出『戶動』工會的問題。但首

先讓我根據我黨經驗來講幾句結束前一問題的話。對於『領袖專政』的攻擊，在我們黨內過去是常常有的；我記得一八九五年第一次有過這樣的攻擊，當時黨還沒有正式成立，可是彼得城的中央團體（四二）已開始形成，它應當負起領導各區團體的責任。在我們黨底第九次代表大會上（一九二〇年四月），曾有一個小小的反對派，也聲言反對『領袖專政』，反對『寡頭政治』等等。因此德國『共產黨左派』的『幼稚病』，並沒有什麼稀奇的、新鮮的、可怕的地方。這個病症不經什麼危險就可以痊愈的，病後機體甚至還會強健一些。另一方面，因公開工作和秘密工作之迅速更替，而必須把總指揮部，必須把領袖特別『隱藏起來』，特別秘密起來的這種情形，曾常使我們黨內發生十分危險的現象。最壞的就是一九二二年馬林諾夫斯基（四三）這個好細混進了布爾什維克中央委員會這一事實。他使幾十幾百個極好極忠實的同志遭到破壞，弄得他們坐苦工牢獄，弄得其中許多人早死。他之所以未能造成更大的禍害，只是由於我們的公開工作和秘密工作配合得恰當。馬林諾夫斯基身任中央委員和杜馬代表，為博得我們底信任起見，不得不幫助我們創辦公開的日報，這些日報雖在沙皇制度下面也能够進行反孟什維克機會主義的鬥爭，能够採用適當的掩蔽方式去宣傳布爾什維主義原理。馬林諾夫斯基一隻手把幾十幾百個優秀的布爾什維克幹部送進苦工獄，送去遭死，而另一隻手却不得不幫助我們經過公開刊物，訓練出成千成萬新的

布爾什維克。對於這個事實，那些應當學會在反動工會內進行革命工作的德國同志（以及英、美、法、意的同志們），不妨好好加以思索。

現時在許多國家裏，就中也在最先進的國家裏，資產階級無疑地派遣奸細，而且將來也還要派遣奸細到共產黨內部去的。防範這種危險的手段之一，就是要把公開工作和秘密工作正確配合起來（四四）。

六 革命家應否在反動工會內進行工作呢？

德國「左派」已決然對這個問題作絕對否定的回答。他們以為用幾篇空洞言論和怒氣沖沖的

- 馬林諾夫斯基後來曾被德國俘虜。他在布爾什維克被改回德國，立刻被捕，交法庭審判；竟被我們的工人槍決了。孟什維克特別惡毒地攻擊我們這個錯誤，攻擊我們讓一個奸細混進了黨中央委員會。但是在克倫斯基執政的時期，我們要求逮捕杜馬議長羅特科（四九）並將他提交法庭審判，因為他在戰前已經知道馬林諾夫斯基是好細，卻沒有把這事實通知杜馬中的勞動派和工人；當時與克倫斯基一起參加政府的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都不贊助我們的要求，因此羅特科得以逍遙法外，自由自在地投奔到鄧尼金那裏去了。

驚嘆詞句把『反動的』和『反革命的』職工會大罵一頓（在這件事情上，作得特別『有力』和特別魯莽的，要算是霍爾茲爾了），也就足以『證明』：革命家，共產黨人不僅不需要而且不容許在黃色的、社會沙文主義的、妥協的、列金派的、反革命的職工會內進行工作。

不管德國『左派』怎樣堅信這種策略是革命的，而其實，這種策略乃是根本錯誤，內中除了空話之外，別無絲毫內容。

爲說明這點起見，我根據本文的計劃，先從我們俄國底經驗說起，——本文的目的就是要把布爾什維主義歷史上和現今策略上所可普遍採用的、具有普遍意義的、必須普遍實行的原則，應用到西歐國家中去。

領袖、政黨、階級、羣衆間的相互關係，以及無產階級專政和無產階級政黨對職工會的關係，現時在我國的具體情形，有如下述。專政是由組織在蘇維埃中並受布爾什維克共產黨領導的無產階級來實行的，據最近一次黨代表大會（一九二〇年四月）底統計，黨員共有六十一萬一千人。在十月革命前後，黨員人數變動很大（四六）；以前，甚至在一九一八年和一九一九年，黨員人數要少得多。我們擔心黨過於擴大，因爲一般趨炎附勢巧於鑽營的人，勢必乘機混進到執政黨內來，而這些人本來是只值得槍斃的。一九一九年冬，當尤金尼奇（四七）離彼得堡只有幾俄里

遠，鄧尼金已抵奧勒爾（距莫斯科僅僅二百五十俄里）的時候，即當蘇維埃共和國危在旦夕之際，而野心家，無賴漢和鑽營祿位之徒以及一般不堅定分子，決不能指望把加入共產黨作為陞官發財的捷徑（他們只能指望因此遭受絞死和拷打）的時候，——這時我們才最後一次大開黨門，但也僅僅是對於工人和農民大開黨門。黨每年召集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最近一次代表大會上，每個代表，代表一千黨員），由大會選舉十九人組成中央委員會來領導全黨；同時還有人數更少的機關常駐莫斯科進行日常工作，這種機關就叫做『組織局』和『政治局』，每局均由中央全體會議選出五個中央委員組成之。這樣看來，就成為真正的『寡頭政治』了。在我們的共和國內，不經黨中央的指示，任何一個國家機關，都不能解決任何一個重要的政治問題或組織問題。

黨在自己的工作中，直接依靠職工會。據最近這次職工會代表大會（舉行於一九二〇年四月）底統計。工會會員已在四百萬人以上。職工會形式上是非黨的組織，而實際上絕大多數職工會底一切指導機關，首先自然是全俄總工會（全俄職工會中央執行委員會），都是由共產黨員組成，執行黨底一切指令。一般和整個說來，結果就是一個在形式上非共產黨的，靈活而比較廣闊的很有力量的無產階級的機關，而黨就是經過這個機關去和本階級以及羣衆發生密切聯系的；階級專政就是經過這個機關而在黨領導下來實現的。如果不與職工會結成極親密的聯系，如果沒有職

工會底熱烈擁護，如果沒有職工會不僅在經濟建設上，而且在軍事建設上奮不顧身的工作，那當然，我們不要說兩年，便是兩個月也不能統治我們的國家和實現專政。自然，這種最親密的聯系，在實踐上乃是很複雜而紛繁的工作：如進行宣傳、鼓動，及時地經常地不僅與職工會領導者，而且與一般在羣衆中有影響的職工會工作人員舉行會議，與孟什維克作堅決的鬥爭，因為孟什維克直到現在還有一些信徒（雖然人數很少），他們教唆這些信徒實行各種反革命的勾當，從思想上擁護（資產階級）民主制，鼓吹職工會『獨立』（離開無產階級政權而獨立！）起，一直到對無產階級紀律實行怠工等等爲止。

我們認爲經過職工會來與『羣衆』發生聯系，還是不夠的。在革命過程中，實際生活給我們造成了一種制度，這就是非黨的工農代表會議，我們要用全力來贊助、發展和擴大這種制度，以便考察羣衆底情緒，接近他們，解答他們的需要，從他們中間提拔出優秀的工作人材來担任國家職務等等。最近頒佈的將國家監督事宜人民委員會改組爲『工農檢查院』的法令中，曾規定這類非黨的代表會議有權選舉國家監督人員去担任各種檢查事項等等。

其次，黨底全部工作，都是經過不分職業而包括一切勞動羣衆的蘇維埃進行的。縣蘇維埃代表大會這種民主機關，就在世界上最好的資產階級民主共和國裏也不曾見過；經過這種代表大會

（黨對於這種大會是極爲注意的），並經過特別派往鄉村去担任各項職務的覺悟工人，來實現無產階級對於農民的領導作用，實現城市無產階級底專政，對資產階級性的、剝削的、投機的富農進行有系統的鬥爭等等。

『從上至下』看來，從實現專政的實踐看來，無產階級國家政權底一般機構，就是如此。我們相信讀者一定會懂得：俄國布爾什維克既熟悉這種機構，又親眼看見這種機構怎樣在二十五年內從秘密的小組發展起來，那他們聽了什麼『自上』或是『自下』，什麼領袖專政或是羣衆專政等等議論，自然要把這種議論當做幼稚可笑的爭辯，如像爭辯究竟是左腳還是右腳對人更有用處一些一樣。

同樣，德國左派所發表的那種莊重的、非常淵博的、極端革命的論調，說什麼共產黨人不能並且不應在反動工會內工作，什麼可以拒絕這種工作，什麼必須退出職工會，必須另外創設一種嶄新的、清一色的、由很可愛的（大概大部分都是很年青的）共產黨人臆想出來的『工人聯合會』等等，——這樣的論調，我們也不能不覺得是同樣幼稚可笑的廢話。

資本主義所必然遺留給社會主義的，一方面是工人中間舊有的、歷來形成的職業上和手藝上的分立；另一方面是職工會，它們只是很緩慢地，經過許許多多年才可以而且定會發展成爲規模

較大、行會氣味較少的生產工會（不僅包含同行、同業和同一職業，並包含整個生產部門），然後經過這種生產工會，進而消滅人與人中間的分工，以及教育、訓練和培養出具有全面智識的、受有全面訓練的人，即能夠作所有一切事情的人。共產主義正是向這個方向走去，它必須向這個方向走去，並且定能到達這個目的，不過須要經過許多年份。目前就企圖具體實現那完全發展的、完全鞏固和形成的、完全開展和成熟的共產主義所將造成的這種未來結果，就無異於教四歲的小孩去學高等數學。

我們能夠（而且應當）不是用幻想的，不是用我們所特別造就出的人材來着手建設社會主義，而是用資本主義遺留給我們的人材來建設社會主義。這當然是很困難的一件事，不過除此以外，任何其他解決這種任務的辦法，都是簡直不值一提的輕舉妄動。

在資本主義發展初期，職工會乃是工人階級底一個巨大的進步，因為這是工人們由散漫無力進到初步階級聯合的過渡。當無產者階級聯合底最高形式，即無產階級底革命黨（要是這個黨不學會把領袖與階級、領袖與羣衆聯合爲一，成爲一個不可分離的整體，它便不配享有這種名稱）開始發育的時候，職工會就必然暴露一些反動的色彩，暴露一些行會的狹隘性，暴露一些不問政治的態度以及一些因循守舊的積習等等。但是除了經過職工會，除了經過職工會與工人階級政黨

底互相聯系之外，無產階級在世界任何地方，從來沒有過別的發展道路，而且也不能有別的發展道路。無產階級奪取政權，這是無產階級這個階級底巨大進步，何況這時，黨必須不僅用舊的精神，而且更要用新的精神去教育和領導職工會；但同時黨不要忘記，職工會現在還是，並且將來在一個長久期間內還會是一種必要的『共產主義學校』以及無產者實現自己專政的預備學校，還會是使全國經濟底管理職能首先逐漸轉到工人階級（而非個別職業）手上，然後再轉到全體勞動者手上所必需的工人團體。

上述職工會底一些『反動色彩』，在無產階級專政時期是免不掉的。誰不懂得這點，他便完全不懂得從資本主義進到社會主義這個過渡底基本條件。害怕這種『反動色彩』，企圖避開它，避過它，那便是再愚蠢不過的了，因為這就等於害怕無產階級先鋒隊所應起的作用，即訓練、啓發、教育工人階級和農民中最落後階層和羣衆並吸收他們來參加新生活的那種作用。另一方面，倘若把無產階級專政底實現，推延到社會上再沒有一個抱職業狹隘心理的工人，再沒有一個抱行會和工聯主義偏見的工人的那天，這更是大錯特錯。政治家底藝術（而且是共產黨人對於自己任務之正確瞭解）也就在於正確地估計這種條件與時機：使無產階級先鋒隊可以勝利地去奪取政權，使無產階級先鋒隊在奪取政權時及奪取政權後，能於得到工人階級和非無產階級勞動羣衆之

充分廣大階層底充分贊助，使無產階級先鋒隊在奪取政權以後能於教育、訓練和吸引日益增多的勞動羣衆去保持、鞏固和擴大無產階級的統治。

其次。在那些比俄國更進步的國家裏，職工會的一些反動色彩，無疑義地，曾經表現得而且應當表現得比俄國更厲害得多。在我們這裏，孟什維克以前在職工會裏之所以有依據（現在他們在很少數的職工會內也還有一部分依據），正由於存在有行會的狹隘心理，職業的自私主義和機會主義。西歐的孟什維克在職工會內『盤據』得更加牢實，那裏所形成的職業主義的、狹隘的、只圖私利不顧大局的、貧婪的、市儈式的、趨向於帝國主義的、受帝國主義收買的、爲帝國主義所腐化了的『工人貴族』，要比俄國有過的強大得多。這是無可爭論的事實。在西歐，同葛培爾茲（四八）輩、如沃（四九）輩、亨德孫（五〇）輩、麥爾黑姆（五一）輩以及列金之徒作鬥爭，要比在我國同孟什維克作鬥爭困難得多，我們這裏的孟什維克，在社會地位和政治觀點上與這些人完全是一路之貉。應該無情地進行這種鬥爭，必須像我們過去那樣把這種鬥爭貫徹到底，直到把機會主義和社會沙文主義底一切不可救藥的領袖人物完全揭破，並把他們趕出工會之外爲止。如果這種鬥爭沒有進行到一定的程度，那就不能夠奪取政權（而且不應該試圖奪取政權），何況這種『一定的程度』在不同的國家裏和不同的條件下，是不一樣的；正確地估計這種程度，只有各國那些

深謀遠慮、經驗豐富、熟悉情形的無產階級政治領導者才能勝任。（我國一九一七年十月二十五日無產階級革命勝利後幾天，即十一月所舉行的立憲會議選舉，也就可以作為測量俄國這種鬥爭勝負的尺度。在這次選舉中，孟什維克一敗塗地，他們僅獲得七十萬票——加上南烏加索一帶的票數，共計只有一百四十萬票；而布爾什維克却獲得了九百萬票。請參看我的論文：立憲會議選舉與無產階級專政，登載於共產國際雜誌第七、八兩期合刊上。）

但是，與「工人貴族」作鬥爭，我們是用工人羣衆的名義來進行的，並且爲的是要吸引工人羣衆到我們這方面來；我們與機會主義和社會沙文主義領袖們作鬥爭，爲的是要吸引工人階級到我們這方面來。如果忘記這個最明顯最初步的真理，那就是愚蠢。而德國「左派」共產黨人做的正是這種蠢事，他們以工會上層分子反動和反革命爲理由，便主張：退出工會！！拒絕在工會中工作！！要建立新的臆想出來的工人組織形式！！這真是不可寬恕的蠢舉，這無異是共產黨人給資產階級以莫大的幫助。須知我們的孟什維克與職工會內一切機會主義的、社會沙文主義的、考茨基派的領袖一樣，無非是「資產階級在工人運動中的走狗」（我們總是用這句話來稱呼孟什維克）或者是「資產階級在工人中間的代辦」（labor lieutenants of the capitalist-class）這是美國的丹尼耳·德立昂（五二）派很好的、極確切的說法。不到反動工會內去工作，這就是把不十分開通的或落後

的工人羣衆委棄在反動領袖，資產階級底走狗，工人貴族或「資產階級化了的工人」（參看恩格斯於一八五二年寫給馬克思的論英國工人的信（五三））底影響之下。

正是這種主張共產黨人不參加反動工會的荒謬「理論」，最清楚地說明這些「左派」共產黨人對於影響「羣衆」問題採取了怎樣輕浮的態度，說明他們高喊「羣衆」是怎樣濫用這個名詞。要想能够幫助「羣衆」，並獲得「羣衆」底同情、愛戴和贊助，便應該不怕困難，不怕那些「領袖」（他們由於是機會主義者和社會沙文主義者，所以大多數都是直接或間接與資產階級和警察局勾結的）搗亂、陷害、侮辱和攻擊，凡是有羣衆的地方，就一定要到那裏去工作。應當善於承受任何犧牲，善於克服最大的障礙，以便有系統地、不屈不撓地、堅忍不拔地、耐心地在一切凡是有無產階級羣衆或半無產階級羣衆的機關、會社、團體內進行宣傳和鼓動工作，那怕這些組織是極端反動的。而職工會與工人協作社，恰恰就是（後者至少有時是）羣衆薈萃的這種組織。據瑞士人民政治月刊（五四）一九二〇年三月十日的統計，英國工會會員，從一九一七年末到一九一八年末，由五百五十萬人增至六百六十萬人，即增加了百分之十九。到一九一九年末，其會員人數已達七百五十萬人。我手邊沒有關於德法兩國這同類的材料，但人所共知的確鑿事實，證明這兩國的工會會員也大量增加了。

這些事實最顯著不過地說明了一件也爲其他千百個例子所證實了的事情，即正是在無產階級羣衆中，在「下層」羣衆中，在落後羣衆中，覺悟程度和組織渴望，日益增長着。在英法德各國，有好幾百萬工人初次從一盤散沙現象，進到初步的、低級的、最簡單的、最易接近的（對於那些還受着資產階級民主偏見所薰染的人們說來）組織形式，即職工會，而那班雖則革命，但是不高明的左派共產黨人却袖手旁觀，空喊「羣衆」「羣衆」！竟拒絕在職工會內進行工作！！藉口這些職工會「反動」而拒絕工作！！懸想一種嶄新的、純潔的、沒有沾染資產階級民主偏見，沒有沾染行會主義和狹隘職業主義惡習的「工人聯合會」，說什麼這種聯合會將成爲（將成爲！）廣大的工會，只要（只要！）「承認蘇維埃制度與專政」就具有入會資格（參看前面引文）！！

比「左派」革命家所作的這種更沒有理智，更危害革命的事情，是再也不想像不出來的了！如果我們現時在俄國，有了打敗俄國資產階級和協約國資產階級的兩年半空前勝利以後，竟提出「承認專政」作爲加入職工會的條件，那我們就是做蠢事，破壞自己在羣衆中間的影響，幫助孟什維克。因爲共產黨員底全部任務，就是要善於說服落後分子，要善於在他們中間做工作，而不是懸造一些幼稚的「左的」口號去和他們隔絕。

無疑的，葛培爾、茲萊、亨德孫、如沃、列金、亞那班先生們一定很感謝這類「左的」革命

家，因為他們正像德國的『原則上的』反對派（上帝保佑我們擺脫這種『原則』吧！）一樣，或像美國的『世界產業工人協會』（五五）裏某些革命者一樣，鼓吹退出反動工會並拒絕在工會中工作。無疑的，機會主義底『領袖』先生們將採用各種資產階級的外交手腕，依靠資產階級政府、神父、警察、法庭底援助，以便阻擋共產黨人加入職工會，以使用各種方法把他們排出工會，使他們極不使於在工會中工作，並對他們施以侮辱、攻擊和追究。我們應當善於對付這一切，不怕任何犧牲，甚至在必要時不惜採取任何機動，巧智，非法手段，緘默態度，隱瞞真情，祇求打入工會，留在工會內面，無論如何都要在那裏進行共產主義的工作。在沙皇時代，一九〇五年以前，我們沒有絲毫『公開的機會』，但當暗探局長蘇巴托夫（五六）召集反動的工人大會和組織反動的工人團體來企圖捕獲革命黨人並與他們作鬥爭時，我們就派遣了我們的黨員到這種大會和團體中去（我自己還記得其中有巴布石金同志，他是彼得城一個出色的工人，在一九〇六年被沙皇將軍槍斃了），他們在那裏和華衆取得聯絡，想方設法進行鼓動，並使工人脫離了蘇巴托夫派底影響。在西歐，因為趨向於合法的、憲政的、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的偏見，特別根深蒂固，所以

● 莫培爾茲曼、亨德孫、知沃曼、列金之徒與蘇巴托夫派毫無二致，所不同的地方，僅在他們穿着西歐的服

上述工作當然較難進行。但這種工作，是能够進行，而且必須有系統地去進行的。

據我個人的意見，第三國際執行委員會應當直接責斥，並應當向下屆共產國際代表大會提議責斥那種一般地不參加反動工會的政策（應當詳細說明這種不參加反動工會的舉動是不合理的，對於無產階級革命事業是極有害的），同時也應當指斥荷蘭共產黨某些黨員底行動路線，因為他們——直接地或間接地，公開地或暗藏地，整個地或局部地——都贊助了這種不正確的政策。第三國際應當和第三國際底策略斷絕關係，對於難解決的重要問題，不應該迴避，不應該抹煞，而要直截了當地提出來。我們已經把全部真理公開告訴了『獨立黨人』（德國獨立社會民主黨），我們也應當把全部真理公開告訴『左派』共產黨人。

七 應否參加資產階級的國會呢？

德國『左派』共產黨人用極鄙視而且極輕浮的態度，否定地來回答這個問題。他們有什麼證據呢？在上面的引證中我們已經看見過：

裝，表現歐洲的風彩，當他們實行自己那無恥的政策時，採用文明、細巧、民主的粉飾辦法而已。

『……凡是回頭再去採用歷史上和政治上已經過時的國會鬥爭形式，都應當十分堅決地予以排斥……』

這樣張大其辭算是到了可笑的地步，而這顯然是不正確的。『回頭再去採用』國會制度！莫非德國已成了蘇維埃共和國嗎？似乎還沒有吧！那麼又怎說得上『回頭再去採用』呢？難道這不是空談麼？

國會制度是『歷史上已經過時的』。在宣傳上講來，這是對的。但是誰都知道，從宣傳到實際廢除國會制度，還相隔得很遠。幾十年前，本有全部理由來宣佈資本主義是『歷史上已經過時的』，但這並不是說，因此就不需要在資本主義基礎上進行很長期和很頑強的鬥爭。就全世界歷史講來，國會制度是『歷史上已經過時的』，即是說，資產階級國會制度時代已告終結，無產階級專政時代已經開始。這是毫無疑義。但全世界歷史的尺度，是以數十年來計算的。遲早十年或二十年，這在全世界歷史的尺度上看來，並無足輕重，從全世界歷史範圍看來，是渺不足道，甚至無法加以大略的估計。可是正因為如此，所以講到實際政策問題的時候，援引全世界歷史尺度，便是理論上莫大的謬誤。

國會制度『在政治上已經過時了』麼？這却是另一個問題。如果這話是對的，那末『左派』底立場就很穩固了。不過這一點應該用極認真的分析去加以證明，但是『左派』連試行這種分析

的門徑都摸不着。在共產國際駐阿姆斯特丹臨時辦事處公報，期（Bulletin of the Provisional Bureau in Amsterdam of the Comintern International），February 1920）上，載有關於國會制度的提綱（五七）這篇提綱顯然表現荷蘭的左派或左傾的荷蘭派底意見，他們的分行，在下面我們就可以看見，也是十分糟糕的。

第一，大家知道，還在一九一九年一月，德國「左派」就已認為國會制度「在政治上已經過時了」，這種意見完全與盧森堡（五八）和李卜克內西（五九）這些「卓絕的政治領導者底見解相反」。大家知道，「左派」是錯誤了的。單是這一點，就已立刻根本推翻那說國會制度「在政治上已經過時了」的論據。「左派」應該證明，為什麼他們當時所犯的顯然錯誤，現在已不復成為錯誤了。他們絲毫不來加以證明，而且也不能加以證明。政黨對於本身錯誤所持的態度，就是表明這個黨是否鄭重，是否在真正執行自己對本階級和勞動羣衆所負義務最重要最可靠的尺度之一。公開承認錯誤，揭露錯誤底原因，分析產生錯誤的環境，仔細討論改正錯誤的方法——這才是鄭重的黨底標誌，這才是黨執行自己的義務，這才是教育和訓練階級，以至於羣衆。德國的（以及荷蘭的）「左派」不去執行自己這種義務，不用極端注意、仔細和審慎的態度去研究自己彰明較著的錯誤，這樣也就恰恰證明他們不是階級底政黨，不是羣衆底政黨，而只是知識分子和少數沾染

知識分子惡習的工人底小組和小團體。

第二，在『左派』底法蘭克福地方小組所出版的該小冊子上，除了上面已經詳細摘引的言論之外，我們還可以讀到：

『……依然跟隨着中央黨』（天主教的『中央』黨）『政策走的數百萬工人，是反革命的。山鄉村無產者中間產生出無數萬反革命軍隊。』（見原書第三頁）

這幾句話顯然說得太輕浮，太誇張了。但這裏所敘述的基本事實，乃是確鑿的；『左派』既承認這個事實，便特別明顯地證實自己的錯誤。既然『數百萬』和『無數萬』無產者，不僅一般地還贊成國會制度，而且簡直是『反革命的』，那末又怎能說國會制度『在政治上已經過時了』呢！可見在德國，國會制度在政治上並還沒有過時。可見德國『左派』是把自己的主觀願望以及自己思想上和政治上的態度，當作爲客觀事實。這對於革命家是最危險的錯誤。在俄國，因爲沙皇制度底壓迫異常野蠻和殘暴，而在這種壓迫之下，經過特別長久的時日，並在特別複雜的形式中產生了各種派別的革命家，而且是非常忠實、熱烈、英勇和意志堅強的革命家；在俄國，革命家所犯的這類錯誤，我們特別親近地觀察過，特別注意地研究過，特別知道得清楚，所以當別人犯了這種錯誤時，我們也看得特別明白。國會制度，在德國共產黨人看起來，自然是『在政治上

已經過時了』的，可是問題正在於不要把我们所認為過了時的東西，當作是階級也認為過時了，羣衆也認為過時了的東西。由此我們又看出『左派』不會判斷事理，不會以階級底政黨，以羣衆底政黨自處。你們決不應該把自己降低到羣衆底水準上去，不應該降低到階級中落後階層底水準上去。這是毫無疑義的。你們必須把適耳的真理告訴他們。你們必須把他們的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的和國會制度的成見，叫做一種偏見。但同時你們也必須清醒地考察正是整個階級（而不僅是它的共產主義先鋒隊），正是全體勞動羣衆（而不僅是他們的先進分子）之覺悟程度與準備程度底實在情形。

就即令不是『數百萬』和『無數萬』，而只有人數尚多的少數產業工人跟隨着基督教神父走，只有少數農村工人跟隨着地主和富農（Grossbauern）走，那末，根據這一點，也已經可以毫無疑義地做出結論說，在德國，國會制度在政治上並還沒有過時，革命無產階級底政黨必須參加國會選舉，參加國會講壇上的鬥爭，其目的正是在於教育本階級底落後階層，正是在於喚醒和啓發鄉村中不開通的、被抑壓的和愚昧無知的羣衆。在你們還無法解散資產階級國會和其他任何反動機關的時候，你們便必須在這些機關內部工作，正是因爲在那裏還有被神父及鄉村陋習所愚弄的工人；不然，你們就有成爲空談家的危險。

第三，『左派』共產黨人關於我們布爾什維克，說了很多譁議的話。有時我禁不住要說：你們最好少恭維我們幾句，多研究研究布爾什維克底策略，多認識認識這些策略吧！一九一七年九月至十一月間，我們參加了俄羅斯資產階級國會的選舉，即參加了立憲會議的選舉。我們當時的策略是否正確呢？如果不正確，那就應該明白指點出來，並加以證明，這是國際共產主義規定正確策略時所必須的。如果是正確，那便應該從這裏做出一定的結論。當然，決不能把俄國條件與西歐條件等量齊觀。但當專門談到這樣一個問題：『國會制度在政治上已經過時』這概念究竟是什麼意思的時候，就絕對必須切實估計到我國的經驗，因為如果不估計到具體經驗，那麼這一概念就很容易變成空話。我們俄國布爾什維克在一九一七年九月至十一月間，豈不是比西方任何一國共產黨人，都更有理由來說國會制度在俄國是政治上已經過時的東西麼？當然，我們是更有理由來這樣說的，因為問題不在於資產階級國會是否早已存在，而在於廣大勞動羣衆已如何準備好（在思想上，政治上，實踐上準備好）來採用蘇維埃制度，解散（或容許解散）資產階級民主國會。一九一七年九月至十一月間，俄國城市工人階級、兵士和農民，由於有種種特別條件，已準備得非常好來採用蘇維埃制度和解散最民主的資產階級國會，——這是完全不容置辯，完全確定的歷史事實。雖然如此，但布爾什維克並沒有抵制立憲會議，而是在無產階級奪得政權以前和

以後都參加了立憲會議的選舉。至於這幾次選舉曾經得到非常寶貴的（而對於無產階級也是極有益處的）政治成效這點，我敢說，我在上述那詳細分析俄國立憲會議選舉結果的論文中，已經證明出來了。

由此得出不容爭辯的結論，證明了甚至在蘇維埃共和國勝利以前幾星期內，甚至在這個勝利以後，參加資產階級民主國會，不僅不使革命無產階級受到什麼害處，反而使它易於向落後羣衆證明這種國會爲什麼應被解散，易於把這種國會解散成功，易於使資產階級國會制度成爲『政治上過時了』的東西。如果不顧到這種經驗，同時却希冀隸屬於共產國際，隸屬於應當用國際眼光來制定策略（不是狹隘的或單純民族的策略，而是國際的策略）的共產國際，這便犯了極大的錯誤，這正是在口頭上承認國際主義，而在事實上背棄國際主義。

我們現在來看石『荷蘭左派』主張不參加國會的論據。上面所說到的『荷蘭派的』提綱，其中最主要的一條，即提綱第四條的譯文（從英文譯出）如下：

『資本主義的生產制度已被破壞，社會是在革命熱流之中，此時參加國會的活動，與羣衆本身直接行動比較起來，已逐漸失去意義了。在這種條件下，國會將成爲反革命底中心，成爲反革命的機關；而另一方面，工人階級建立蘇維埃，作爲自己政權底工具，此時，拒絕參加任何一種國會活動，甚至是必要的。』

第一句話顯然就錯了，因為羣衆直接行動，例如大罷工，無論何時，都比國會活動更爲重要，而不僅在革命時候或有革命形勢的時候才是如此。這種顯然毫無根據，從歷史和政治觀點看來都是錯誤的論證，祇是特別明顯地說明，作者絕對沒有估計到一般歐洲的經驗（法國一八四八年和一八七〇年革命前夜的經驗，德國一八七八年至一八九〇年間的經驗等等），也沒有估計到俄國的經驗（參看上文），即關於配合公開鬥爭和秘密鬥爭這一意義重大的經驗。這個問題，一般說來是非常重要的，尤其是因爲在一切先進的文明國家內，由於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間的內戰日益成熟與逼近，由於盡情破壞合法權利的共和政府（只要看美國的例子就够了）及一般資產階級政府對共產黨人所施行的瘋狂追究等等，以致公開鬥爭與秘密鬥爭的配合，對於革命無產階級底政黨很快就會一天比一天成爲必要（而且有些地方已經成爲必要了）。這一異常重要的問題，荷蘭人和一般左派分子却絲毫沒有瞭解。

第二句話，首先從歷史觀點上看來，是錯誤的。我們布爾什維克參加過最反革命的國會，經驗表明正是在俄國第一次資產階級革命（一九〇五年）之後，這種參加，對於革命無產階級政黨準備第二次資產階級革命（一九一七年二月），以及後來準備社會主義革命（一九一七年十月），不但有益，而且是必要的。其次，這句話非常違反邏輯。所謂國會日益成爲反革命底機關和中心

（附帶說明一句，事實上，過去任何時候，國會都沒有成爲反革命底中心，且也不能爲反革命底中心），而工人正在建設作爲自己政權工具的蘇維埃，由這兩句話中就可得出結論說，工人必須在思想上，政治上，技術上準備起來，以便進行蘇維埃反對國會的鬥爭，由蘇維埃來解散國會。但從這裏絕不能得出結論說：在反革命的國會內部有反政府的蘇維埃派存在，不但不會促進解散國會，反而會使這件事情困難起來。當我們進行勝利鬥爭反對鄧尼金和高爾察克的時候，我們從來沒有看見過，在他們那裏有站在蘇維埃方面的、無階級的反對派這一事實，而對我們的勝利毫無關係。我們明白知道，當我們一九一八年一月五日解散立憲會議的時候，在將被解散的反革命立憲會議中，站在蘇維埃方面的反對派，有澈底的布爾什維克派和不澈底的社會革命黨左派，這並沒有使我們解散立憲會議的事情發生困難，反而使這件事情容易進行。這個提綱的作者們，完全弄糊塗了，他們縱然不是忘記了一切革命的經驗，至少是忘記了許多革命的經驗；這些革命經驗證明：在革命時期，反動國會以外的羣衆行動與國會內同情於革命的（如果是直接贊助革命的，那就更好）反政府派聯合一致，是怎樣特別有益。據荷蘭人與一般『左派』在這方面的議論看來，他們不過是這類的革命教條主義者，從來未曾參加過真正的革命，或者從來也未曾深刻探討過革命史，或者只一味表現幼稚態度，以爲主觀上『否認』某種反動機關，便算是實際上用許

多客觀因素底共同力量，把這機關破壞了一樣。

破壞對新政治（不僅是政治）思想的信任並加以危害的最有效方法，便是藉擁護這種思想爲名而把這種思想引到荒謬絕倫的地步。因爲任何真理，如果把它說得『過火』（如老狄慈根（六〇）所說的一樣），大吹特吹，超出了它實際上所能應用的限度以外，便可以弄成荒謬謬論，而且在這種情形下，它甚至會必然被引到荒謬絕倫的地步（六一）。荷蘭的和德國的『左派』對於蘇維埃政權優於資產階級民主國會制度這個新真理的効勞，正是此種欲益反損的蠢笨行爲。自然，誰要是照舊籠統地說，無論在什麼條件下，都不應該拒絕參加資產階級國會，那也是不對的。這裏我不來試圖說明在那些條件下抵制國會才是有益的，因爲本文底任務，祇是關係於討論國際共產主義策略中幾個迫切問題，而來估計到俄國的經驗。俄國經驗告訴我們，布爾什維克應用抵制國會的策略，第一次是有效而正確的（一九〇五年），第二次是錯誤的（一九〇六年）。當我們分析第一次情形時，便可看到那次抵制，使反動政府沒有召集成反動國會，當時的情形是：國會以外的羣衆革命行動（尤其是罷工運動）發展得異常迅速，無產階級與農民中任何一個階層都不給反動政府以任何的贊助，革命無產階級由於罷工鬥爭與土地革命運動，而保證了自己對廣大落後羣衆的影響。十分顯然，這個經驗對目前歐洲的情形是不適用的。根據上述的理由，

也同樣十分顯然，荷蘭人及『左派』據護（那怕是有條件的）不參加國會的主張，根本上是不正確，對於革命無階級底事業祇有害處。

在西歐與美國，國會已成了工人階級中先進革命分子所特別仇恨的東西，這是無可爭辯的事實。這也是完全自然的，因為在戰時和戰後，國會中絕大多數社會黨及社會民主黨議員底行為實在是最卑污、最無恥、最變節的了。但在解決怎樣去與公認的毒藥作鬥爭的問題時，若為仇恨國會的情緒所迷惑，那就不僅是愚蠢，而且是罪惡。在西歐許多國家裏，革命情緒現時可以說是『新奇的東西』或『罕有的東西』，因為人們期待這種情緒，實在是太長久，太枉然，太迫切了，或許正是這個緣故，就使他們這樣易於為情緒所屈。自然，沒有羣衆中的革命情緒，沒有促進這種情緒高漲的條件，那就不能使革命的策略變為行動，但我們在俄國，由於有了長期艱苦流血的经验，確信到這樣一個真理，就是說，革命策略決不能祇根據革命情緒來規定。規定策略，就必須把本國（及鄰國和世界其他各國）一切階級力量加以清醒而極客觀的估計，並且估計到革命運動底經驗。僅僅咒罵國會機會主義，僅僅否認參加國會，來標榜自己的『革命精神』，這是很容易的事，但正因為太容易，所以這不是解決困難任務，更不是解決最困難任務的辦法。在歐洲各國國會裏，建立真正革命的國會黨團，要比在俄國困難得多。這是不言而喻的。但這祇是

下列全部真理底局部表現，而全部真理是：俄國在一九一七年那種歷史上非常新奇的具體形勢下，是容易開始社會主義革命的，而俄國要繼續這個革命，並把這個革命貫徹到底，却就比西歐各國難些了。我這在一九一八年初就已經指出這一點，此後兩年來的經驗已完全證實這種論斷是正確的。俄國當時的特殊條件：（一）有可能將蘇維埃革命與藉這個革命結束工農深受其苦的帝國主義戰爭的事業，聯結起來；（二）有可能在一定時期內利用兩個雄震全球的帝國主義強盜集團間的決死鬥爭，這兩個集團當時不能聯合起來反對它們的敵人蘇維埃；（三）有可能支持較為長期的國內戰爭，這局部是因為我國疆域極廣和交通不便；（四）當時在農民中有非常深刻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運動，使無產階級黨能把農民黨（即社會革命黨，其大多數是激烈反對布爾什維主義的）那裏的革命要求拿來，並因無產階級奪得政權而一舉實現之，——這樣的特殊條件，現時在西歐是沒有的，而且這些條件或類似條件的重演，是不很容易的。因此——除其他某些原因以外，——西歐要開始社會主義革命，就比我們難些，要想『繞過』這種難局，『跳過』為革命目的而利用反動國會的難關，那真是十足的孩稚氣。你們要建設新社會？同時却害怕在反動國會內建立由堅決忠實英勇共產黨人所組成的卓越國會黨團時所遇到的困難！難道這不是孩稚氣麼？

德國的李卜克內西、瑞典的赫龍特（六二），甚至沒有羣衆自下的贊助，尚且能作出用真正革命精

神去利用反動國會的模範，難道一個迅速發展的革命羣衆政黨，處在戰後羣衆懷有失望與憤激情緒的環境中，反而不能在那些惡劣的國會內鍛鍊出一個共產黨的黨團來嗎？！正因為西歐工人中的落後羣衆，尤其是西歐小農中的落後羣衆所污染的資產階級民主主義及國會制度偏見，比俄國的要厲害得多，所以共產黨人祇有在資產階級國會這種機關內部，才能（並且應該）進行長期的、堅強的、百折不回的鬥爭，以便去揭發、消除和克服這種偏見。

德國「左派」抱怨他們黨內的「領袖」壞，因此悲觀失望，以至走到「否認」：「領袖」的可笑地步。在「領袖」們常須隱藏起來的條件下，要造就可靠的、受到考驗和有威望的好「領袖」，特別困難，而且若不把公開工作與秘密工作配合起來，若不使「領袖」受到考驗（就中也要在國會鬥爭舞台上考驗「領袖」），是無法克服這種困難的。我們的批評，並且是最嚴厲、最無情和最堅決的批評，不應該拿來反對國會制度或國會活動，而應該用去反對那些不善於以革命精神、以共產主義精神來利用國會選舉、利用國會講壇的領袖，特別是反對那些不願意這樣做的領袖。只有這樣的批評——當然同時要驅逐不適當的領袖，代之以適當的領袖——才是既有益處又有實效的革命工作，這種工作，一方面教育「領袖」，使他們不愧為工人階級與勞動羣衆的領袖，同時又教育羣衆，使他們學會正確地分析政治情況，並學會瞭解從這種情況中產生出來往往是非常

複雜錯綜的任務。

八 『不作任何妥協』麼？

我們從法蘭克編出版的小冊子中引來的那段話裏，看見過『左派』何等堅決地提出這個『不作任何妥協』的口號。可惜，這些無疑是以馬克思主義者自命並願意做個馬克思主義者的人，怎樣忘記了馬克思主義底基本真理。試看一八七四年恩格斯反對那三十三個布期基派公社社員底宣言時所說的話吧；恩格斯同馬克思一樣，也是屬於那種稀有的和極稀有的著作家之列的，他們每部大作中的每一句話，都含有極深遠的意思。

- 我很少有機會去認識意大利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左派』。波爾迪加（六三）同志及其『共產黨人』，和波爾迪加同會的主張，無疑義是不對的。可是據他所出版的兩期蘇維埃（六四）（一九二〇年一月十八日和二月一日出版的第三期和第四期）和由塞拉威（六五）同志編輯的共黨主義（第一期至第四期，一九一九年十一月一日至十一月三十日這期間內出版）（六六），以及幾份不全的意大利資產階級報紙看來，我以為他有一點是對的。就是波爾迪加同志及其小組織之攻擊屠拉梯及其同道者，這是正確的；因為這些人

恩格斯說：

「布朗基派的公社社員在自己的宣言中寫道：——我們之所以是共產主義者，就是由於我們在達到我們目的的道路上，不停頓於什麼過渡階段，不去妥協，因為妥協只是延緩勝利之日，延長奴隸制度底壽命……」

「德國共產黨人之所以是共產主義者，就因為他們，是經過一切非由他們而由歷史進程所造成的各種過渡階段和妥協，濟濟德捷看見並且始終追逐他們的最後目的：即消滅階級和建設沒有土地私有制及生產資料私有制的社會。這三十三個布朗基主義者之所以是共產主義者，就因為他們以為自己既然願意跳過各種過渡

留在一個承認蘇維埃政權和無產階級專政的政黨裏，依然當國會議員，並繼續他們最有害的機會主義的政策。塞拉底同志及整個意大利社會黨容忍這種現象，自然是一個錯誤，由於這種錯誤，也會發生與匈牙利一樣深刻的禍害和危險，在匈牙利，塞拉梯一流的先生們從內部來對黨和蘇維埃政權怠工。對機會主義黨員們採取這樣錯誤的，不徹底或無組織的態度，一方面可以產生共產黨「左派」，他方面在某種限度內，可以保護共產黨「左派」的存在。塞拉底同志雖然不對，他指斥議員屠拉梯「不徹底」(共產主義雜誌第三期上)，但真正「不徹底的」，却是意大利社會黨，因為它容忍屠拉梯等這類機會主義的議員。

階段和妥協，便是萬事妥貼了，如果日內一動起手來——這是他們確信的——而政權落到了他們手中，那末，後天一就會施行共產主義」。因此，如果這件事情不能立刻辦到的話，那他們也就不做共產主義者了。」

『把自己的急燥性，當作理論根據，這是何等幼稚氣啊！』（見恩格斯著：布爾基派公社社員底綱領，載於德國社會民主黨的民國報（*Volkstaat*）〔六七〕上，一八七四年，第七十二期。引自一八七一至一八七

五年文集，俄文版，一九一九年彼得城出版，卷在十一至五十三頁）

恩格斯在這篇論文中對於瓦爾揚〔六八〕深致敬意，說瓦爾揚有『不可磨滅的功績』（瓦爾揚和黑得〔六九〕直到一九一四年八月背叛社會主義以前都是國際社會主義底最大的領袖）。但對於他的明顯的錯誤，恩格斯却詳盡地加以分析過。自然，在年齡很輕毫無經驗的革命者看來，也如該數頗大很有經驗的小資產階級革命者看來，『容許妥協』，好像是異常『危險』，不可瞭解和不正確的勾當。並且許多詭辯家（這班十二分『有經驗』的政客）底議論正是同蘭斯白雷同志所提到的英國機會主義領袖底議論一樣：『既然布爾什維克可以作某種妥協，那末爲什麼我們不可以作任何妥協呢？』但是經過多次罷工（只拿階級鬥爭底這一種表現來說）教訓的無產者，通常都能很好領會恩格斯所敘述的這一深遠的（哲學的、歷史的、政治的、心理的）真理。每個無產者都親身經歷過罷工，忍受過『妥協』，即當工人要求條件全未達到，或僅僅達到一部分，也不得

不去上工，這時他們只好同被恨入骨髓的壓迫者和剝削者『妥協』。每個無產者，處在羣衆鬥爭和階級矛盾加劇的環境之下，常常看見兩種妥協間的差別：一種妥協是爲客觀條件所迫（罷工者儲金窮竭，沒有外方援助，飢寒交迫，困苦不堪），這種妥協，絲毫無傷於接受妥協的工人們之忠於革命的精神以及他們準備將來鬥爭的決心；另一種妥協是叛賊底妥協，他們進行這種妥協，表面上也藉口客觀原因，而實際上却是他們貪圖私利（破壞罷工的工賊也締結『妥協』！），怯懦畏縮，甘願向資本家効勞，屈服於資本家底威嚇，或屈服於勸說，或爲微利所誘，甘言所惑。（這種叛賊底妥協，在英國工人運動史中，工聯會領袖進行得最多，然而差不多所有其他各國工人，也在各種不同的形式內，看見了類似這樣的現象。）

當然，有時也可以遇到異常困難複雜的個別情形，使人們要費極大的力量，才能正確決定某種『妥協』底真實性質，如在有些殺人案件中，很難斷定這種殺人行爲，究竟是完全正常的，甚至是必要的行爲（如必要的自衛），抑或是不可饒恕的粗野舉動或甚至是精密佈置的謀害？當然在政治上，有時因各階級和各政黨間之國內和國際相互關係異常錯綜複雜的緣故，所以有許多事件，若辨別起來，較之辨別罷工時是合理的『妥協』，或者是工賊及出賣階級的領袖等等所進行的背叛階級的『妥協』，要困難得多。若是想擬定一種包治百病的藥方，或製定一種能適用

於一切情形的總規則（『不作任何妥協』！），那就是荒謬的想法。我們要有清醒的頭腦，善於來分別考察各個事實。黨的組織和名實相符的黨內領袖底作用，也就在於要使本階級一切有思考力的代表，在長期的、艱苦的、各種各樣的、多方面的工作中，培養出必要的知識、必要的經驗、必要的（除了知識與經驗之外）政治警覺性，以便敏捷而正確地來解決各種複雜的政治問題。

幼稚而毫無經驗的人們，以為祇要一般地承認可以妥協，就會抹煞機會主義與革命馬克思主義或共產主義中間的任何界限，對機會主義，我們正在進行而且必須進行毫不妥協的鬥爭。至於這些人們，假使他們還不懂得在自然界和社會中的一切界限都是活動的，並且在相當限度內都是有條件的，那就只有給他們以長期的教育、訓練、啓發及增加其政治閱歷和生活經驗才能加以糾

● 每個階級，即令在最開明國家底環境下，即令是最先進的階級而且因目前形勢使它的一切智慧力發揚到最高度的時候，其中總還有——而且當階級尚屬存在，當無階級的社會還沒有在本身基礎上完全鞏固和充分發展起來時，必然會有本階級的不上思想和不會思想的代表。否則，資本主義便不成其為壓迫階級的資本主義。

了。

正。在每一個別的或特殊的歷史關頭底實際政治問題上，重要的事情，是善於辨別出其中表現最主要形式的不可容許的、叛賣的、體現着危害革命階級之機會主義的妥協，說明這種妥協的害處，並用全力去與這種妥協作鬥爭。當一九一四到一九一八年間，兩夥同樣掠奪和同樣殘暴的國家中間進行帝國主義戰爭的時候，最主要的、最基本形式的機會主義，就是社會沙文主義，即主張『保護祖國』；在這樣一種戰爭中，主張『保護祖國』，實際上就等於保護『本國』資產階級底掠奪利益。在戰爭以後，保護強盜式的『國際聯盟』；保護與本國資產階級直接或間接訂立的聯盟來反對革命無產階級和『蘇維埃』運動；保護資產階級的民主制和資產階級的國會制度來反對『蘇維埃政權』；凡此種種，都是不可容許的叛逆妥協底最主要表現，而這種妥協綜合起來，就成爲危害革命無產階級及其事業的機會主義。

德國『左派』在法蘭克福出版的那小冊子上寫道：

『……應當十分堅決地拒絕與其他政黨作任何妥協；應當拒絕一切機動和妥協的政策。』

也真奇怪，這些『左派』既抱着此種見解，却沒有堅決地責斥布爾什維主義！德國『左派』不會不知道在布爾什維主義全部歷史中，無論在十月革命前或十月革命後，都充滿着它對其他政黨，其中也對資產階級政黨採取機動，通融和妥協的事實！

爲推翻國際資產階級而進行的戰爭，要比國家間的普通戰爭中最頑強的戰爭困難百倍，長久百倍，複雜百倍；要進行這樣的戰爭，而事先就拒絕採用機動手段，拒絕利用敵人間的利害矛盾（那怕是暫時的矛盾），拒絕與各種可能的同盟者（那怕是暫時的、不穩固的、動搖的、有條件的同盟者）通融和妥協，這豈不是可笑了極點麼？這豈不是正像我們想攀登一座艱難險阻，未經考察，未通人跡的高山時，却預先拒絕有時要迂迴前進，有時要折轉回來，放棄已定的方向而試走各種各樣的方向麼？而那些沒有經驗和缺少覺悟到了這種地步的人（如果這真是因爲他們年輕，那還算好：『上帝』本來就讓青年人在相當歲月內說說這類蠢話的），居然還能得到荷蘭共產黨裏一些黨員底擁護（不管是直接的或間接的，公開的或隱蔽的，完全的或部分的擁護）哩！！

在無產階級第一次社會主義革命成功以後，在一個國家內推翻了資產階級以後，這個國家的無產階級，在很長時期內，依然比資產階級要薄弱些，首先簡單是因爲資產階級有很廣泛的國際聯系，其次就因爲在這個推翻了資產階級的國家裏，小商品生產者使資本主義和資產階級自發地、不斷地重新恢復和重新產生出來。要想戰勝更強大的敵人，只有用最大的努力，同時必須最精細地、最留心地、最謹慎地、最巧妙地一面利用敵人中間的各種『裂痕』（那怕是最小的裂痕），利用各國資產階級中間以及每個國家內各種或各派資產階級中間的各種利害衝突，他方面

利用各種機會（那怕是極小的機會）以獲得人數衆多的同盟者，儘管是暫時的、動搖的、不穩定的、靠不住的、有條件的同盟者。誰不懂得這一層，誰就是絲毫不懂馬克思主義，絲毫不懂一般的現代科學社會主義。誰要是在比較長久的時期中，在比較複雜的各種政治情況中，不會在實際上證明他會實地應用這個真理，那他就還沒有學會怎樣幫助革命階級去進行鬥爭，把全體勞動人類從剝削者的壓榨下解放出來。以上所說的一切，對於無產階級奪取政權以前及以後時期，都是一樣適用的。

馬克思和恩格斯說過，我們的理論並不是教條，而是行動底指南（七〇）；考茨基、奧托·鮑威爾等等這類「享有專利權的」馬克思主義者底最大錯誤，最大罪惡，便是他們不懂得這個真理，不會在無產階級革命最緊要的關頭應用這個真理。馬克思以前的俄國偉大社會主義者契爾內舍夫斯基（七二）就已說過：「政治活動，並不是涅瓦大街（這是彼得堡一條寬廣、清潔、平坦、筆直的大街）上的康莊大道」（七三）。自契爾內舍夫斯基以來，俄國革命家因輕視或忘記這個真理，遭受了無數的犧牲。我們無論如何都要達到使西歐和美國的「左派」共產黨人以及獻身於工人階級的革命家，不至於像落後的俄國人一樣，曾費了如此高貴的代價，來領會這個真理。

俄國的革命社會民主黨人 在沙皇制度崩潰以前，屢次利用了資產階級自由派，就是說同他

們締結過多次實際的妥協；在一九〇一年到一九〇二年，當布爾什維主義還沒有發生的時候，火星報編輯部（參加這個編輯部的有普列漢諾夫、阿克雪里維得（七三）、查蘇里奇（七四）、馬爾托夫（七五）、波特列索夫（七六）和我）就同資產階級自由派政治領袖司徒盧威（七七）訂了一個正式的政治聯盟（雖則為時並不長）（七八），同時我們却善於不斷地進行思想上和政治上最無情的鬥爭，去反對資產階級自由主義，去防止工人運動內部有絲毫資產階級自由主義影響底表現。布爾什維克總是繼續採用同樣的政策。自一九〇五年以後，他們總是堅持工農聯盟，以反對自由資產階級和沙皇制度，但同時向來都不拒絕贊助資產階級去反對沙皇政府（例如在第二級選舉或複選時），並且也不停止與資產階級革命的農民黨，即「社會革命黨人」作最堅決的思想鬥爭與政治鬥爭，揭發他們是冒充社會主義者的小資產階級民主派。一九〇七年，在選舉杜馬時，布爾什維克曾與「社會革命黨人」訂立過短期的正式政治聯盟。一九〇三年到一九一二年時，我們曾幾次多年地在形式上與孟什維克共處於統一的社會民主黨內，但始終沒有停止與他們作思想上和政治上的鬥爭，把他們看作是無產階級內傳播資產階級影響的人和機會主義者。在大戰時，我們同「考茨基派」、孟什維克左派（馬爾托夫）及一部分「社會革命黨人」（如切爾諾夫（七九）、那唐松（八〇）），締結過某些妥協，我們同他們在齊美瓦爾得和昆塔爾一齊開會，發表過共同

宣言，但無論何時，我們都沒有停止或鬆懈過思想上和政治上的鬥爭，來反對『考茨基派』，反對馬爾托夫輩和切爾諾夫輩（那唐松死於一九一九年，他那時完全接近我們，幾乎是與我們心投意合的，個『革命的共產主義』（八）民粹派者）。正當十月革命之際，我們會同小資產階級的農民締結了政治同盟，這個同盟雖非正式，但極為重要（而且是很有成效的），我們那時完全接受了社會革命黨的土地綱領，而未加以絲毫修改，這也就是我們無疑地締結了妥協，以使向農民證明，我們並不想以多數壓制他們，而是想同他們妥協。同時我們會向『左派社會革命黨人』建議，訂立正式的政治同盟（不久以後便實現了這種同盟），請他們參加政府；但至布列斯特和約成立後，他們破裂了這個同盟，而到一九一八年七月時，甚至舉行武裝暴動，後來竟進行武裝鬥爭來反對我們。

所以，德國『左派』，因德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想和『獨立黨人』（『德國獨立社會民主黨』，即考茨基派）訂立同盟，使攻擊中央，我們自然認為這是『左派』底輕舉妄動，這是表現『左派』錯誤的明證。我們俄國也有過與德國謝德曼派相類似的孟什維克右派（參加克倫斯基政府的），也有過曾反對孟什維克右派而與德國考茨基派相類似的孟什維克左派（馬爾托夫）。工人羣衆之逐漸離開孟什維克而轉向布爾什維克，這種情形，我們在一九一七年間，顯然可以看到：

在一九一七年六月舉行的第一次全俄蘇維埃代表大會上，我們祇佔有百分之十三的票數。社會革命黨人與孟什維克佔有大多數。在第二次蘇維埃代表大會上（舊曆一九一七年十月二十五日），我們佔有百分之五十一的票數。爲什麼德國工人這種與俄國全係同一性質的由右向左的轉變趨勢，不立刻增強共產黨人底勢力，却先增強了居中的『獨立』黨（雖然這個『獨立』黨從來不會有過任何獨立的政見，不會有過任何獨立的政策，而祇是搖擺於謝德曼派和共產黨人之間）底勢力呢？

很明顯的，這原因之一就是由於德國共產黨人執行了錯誤的策略，德國共產黨人必須大膽地公開承認這個錯誤，並學會糾正這個錯誤。這個錯誤就是拒絕參加反動的資產階級國會和反動的工會，這個錯誤就是左傾幼稚病底無數表現，這種病症現在已明顯地暴露出來了，因此也就可以更好更快地，對於身體更有益處地把這病症療治好。

德國『獨立社會民主黨』內部，顯然是不一致的；其中除掉那些已證明自己不能了解蘇維埃政權與無產階級專政意義，不能領導無產階級革命鬥爭的機會主義老領袖（考茨基、希法亭，而克里斯平、萊得布爾之流，看來，大半也是如此）以外，還形成了一個左派，即無產階級派，這個派別發展得非常迅速。該黨數十萬黨員（大概共有七十五萬），是離棄謝德曼而迅速走向共產

主義的無產者。這個無產階級左派，在萊比錫城舉行的獨立黨人代表大會上（一九一九年），已經提議無條件地即刻加入第三國際。如果害怕同一獨立社會民主黨一底這個左派「妥協」，那真是可笑了。反之，共產黨人定要去找而且要找得同他們作這樣一種妥協的適當形式，這種妥協，一方面，可以促進並加速與此派作必要的完全溶合，他方面絲毫不拘束共產黨人進行思想上與政治上的鬥爭，去反對「獨立黨人」中間的機會主義右派。要定出這樣一個適當的妥協形式，大概是不容易的，然而祇有騙子才會約許德國工人和德國共產黨人，有「容易」致勝的道路。

如果「純潔的」無產階級，沒有為那些由無產者到半無產者（就是那些一半依靠出賣勞動力謀生的人），由半無產者到小農（及小手工業者、小家庭手工業者以及一般的小業主），由小農到中農等等這形形色色的無數過渡階層所包圍；如果無產階級本身的內部，沒有開通程度不等的差別，沒有鄉幫、職業、有時是宗教等等的區分，那末，資本主義便不成其為資本主義了。因此，無產階級底先鋒隊，無產階級底覺悟部分，即共產黨方面，就必須而且絕對必須向其他各種無產者團體，向各種工人的及小業主的政黨，採取機動，通融和妥協的辦法。問題是在於我們應當善於運用這個策略，來提高無產階級的覺悟性、革命精神、鬥爭能力和致勝能力底一般水準，而不是降低這種水準。我們應當順便指出一下：布爾什維克戰勝了孟什維克。這不僅會要求我們在

九一七年革命以前採取機動、通融、妥協的策略，即在十月革命以後，也是如此；自然，我們所採取的這種策略，都是足以促進、增進、鞏固和增強布爾什維克而削弱孟什維克的。小資產階級民主派（孟什維克也在內）必然要搖擺於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之間，搖擺於資產階級民主制度與蘇維埃制度之間，搖擺於改良主義與革命主義之間，搖擺於愛護工人與畏懼無產階級專政之間等等。共產黨人底正確策略，應該是利用這種動搖，決不應忽視這種動搖；既是利用這種動搖，那便要對某些傾向於無產階級分子讓步，當其傾向的時候予以讓步，視其傾向的程度來決定我們讓步的程度，同時却要與那些傾向於資產階級分子作鬥爭。由於我們應用正確策略的結果，遂使孟什維主義在我們俄國過去和現在都日益瓦解，使頑強的機會主義領袖陷於孤立無援的地位，使優秀的工人與小資產階級民主派中的優秀分子，都轉入到我們營壘裏來。這乃是長期的過程，那種例如『不作任何妥協，不作任何機動』的十萬火急的『決議』，只能去妨害那加強革命無產階級影響和擴大革命無產階級力量的事業。

末了，德國『左派』固執己見，不承認凡爾賽和約，這也是他們無疑義的錯誤之一。像聶爾的這種見解，表現得愈加『莊嚴』和『鄭重』，愈加『堅決』和武斷，結果就愈加笨拙。在現今國際無產階級革命的條件下，僅僅唾棄那種荒謬絕倫得甚至主張與德國資產階級訂立同盟，

以便對協約國作戰的「民族布爾什維主義」（勞芬別爾格等），是不夠的。應當瞭解，不允許蘇維埃德意志（如果德意志蘇維埃共和國不久可以成立的話）暫時承認和服從凡爾賽和約的這種策略，根本錯誤。但是不能由此得出結論說，當謝德曼輩高踞政府的時候，當匈牙利蘇維埃政權還沒有被推倒的時候，當維也納蘇維埃革命還不是絕對沒有可能去援助蘇維埃匈牙利的時候，在當時這樣的條件之下，「獨立黨人」要求在凡爾賽和約上簽字，是正確的。那時獨立黨人所作的機動迂迴辦法，實在不好得很，因為他們多少替出賣階級的謝德曼派分了責任，他們多少離開了與謝德曼派作無情（而且是極冷靜的）階級鬥爭的觀點，而走到了「無階級的」或「超階級的」一點上去。

然而現在的局勢却顯然不同，現在德國共產黨人不應當束縛自己的手足，不應當肯定警言，說共產主義一旦取得勝利，就一定要否認凡爾賽和約。如果這樣做，那就是愚蠢。應該說：謝德曼派和考茨基派屢次叛賣了階級，結果障礙了（而且局部的簡直是危害了）與蘇維埃俄羅斯及蘇維埃匈牙利聯合起來的事業。我們共產黨人，將採用一切辦法，去促成和準備這個聯合，至於凡爾賽和約，我們並不一定而且並不立刻就加以否認。順利取消凡爾賽和約的可能，不僅有賴於德國蘇維埃運動底勝利，而且有賴於國際蘇維埃運動底勝利。謝德曼派和考茨基派障礙着這種運

動，我們却贊助這種運動。問題底本質就在於此，根本的差別也就在此。既然我們的階級敵人，剝削者及其走狗謝德曼派和考茨基派，把加強德國及國際蘇維埃運動，加強德國及國際蘇維埃革命的許多機會，都空空放過了，那末，這罪過就應由他們去担負。德國的蘇維埃革命會加強國際的蘇維埃運動，而國際的蘇維埃運動，却是反對凡爾賽和約，反對一般國際帝國主義的最強大的堡壘（而且是唯一可靠，牢不可破，具有全世界威力的堡壘）。把解除凡爾賽和約的問題，定要必須立刻放在第一位，放在使其他被帝國主義壓迫的國家擺脫帝國主義壓迫的問題之前，這就是市儈國家主義（只配考茨基、希法亭、奧托·鮑威爾這一流人去提倡的），而不是革命的國際主義。在歐洲無論那一個大國家裏，德國也在內——實現推翻資產階級，這對於國際革命是一個極大的勝利，爲了這種勝利，如果有必要的话，就讓凡爾賽和約比較長期存在，也是可以而且應當的。既然俄羅斯一個國家爲了革命利益能够忍受布列斯特和約至數月之久，那末，蘇維埃德意志，在與蘇維埃俄羅斯聯盟之下，爲了革命利益而忍受爲時更久的凡爾賽和約，也決不是不可能的事。

英法等帝國主義者做好圈套來陷害德國共產黨人，挑撥他們說：『請你們講講，你們不願在凡爾賽和約上簽字吧。』而德國「左派」共產黨人，不去巧妙地運用機動以反對好狡百出的而且

此刻還是強於他們的敵人，不去向敵人說『現在我們要在凡爾賽和約上簽字』，却像三歲孩子一樣，果然走上這個圈套。事先束縛自己的手足，公開告訴目前武裝比我們完備的敵人，說我們是否要同他作戰，且何時要同他作戰，這是愚蠢，而不是革命精神。我們明知這場戰鬥對敵人有利，對自己不利，却居然前去應戰，這是罪惡；如果革命階級底政治家，不會從事『機動，通融、妥協』，以避免分明不利於自己的戰鬥，那末，這種政治家，是絲毫也沒有用處的。

九 英國共產主義『左派』

(八二)

英國還沒有共產黨，但在工人中間却有新起的、廣闊的、強有力的、迅速增長的、前途極大的共產主義運動；有幾個政黨和政治組織（如『不列顛社會黨』、『社會主義工黨』、『南威爾斯社會主義協會』、『工人社會主義聯合會』），它們想建立共產黨，彼此間正在進行這一談判。

『工人社會主義聯合會』出版的工人無畏艦週刊（第六卷，第四十八期，一九二〇年二月二十一日出版）（八三），由西爾維婭·潘克林爾斯特（八四）同志主編，其中載有她寫的走向共產黨去一文。這篇論文敘述上列四個組織談判的經過，而談判的內容，就是根據加入第三國際，承認以蘇維埃制度來代替國會制度，承認無產階級專政等原則，來建立統一的共產黨。那知對於立刻成立

統一的共產黨的主要障礙之一，就是參加國會問題及新的共產黨加入舊的『工黨』問題上的意見分歧。這個『工黨』係大半由工聯組成之工會主義的，機會主義的和社會沙文主義的政黨。『工人社會主義聯合會』也同『社會主義工黨』一樣，反對參加國會選舉，反對參加國會，反對加入『工黨』，因此就和『不列顛社會黨』全體黨員，或多數黨員的意見相左，在前者看來，『不列顛社會黨』是英國『各共產主義政黨中的右派』（見潘克赫爾斯特底論文，第五頁）。

總之，根本的分歧正和德國的相同，雖然分歧所表現的形式（在德國的，比在英國的更加接近於『俄國式』）以及其他許多情形有很大的區別。我們且來把『左派』的論據考查一下吧。

關於參加國會問題，潘克赫爾斯特同志引證了登載於該期週刊上加拉克爾（W. Gallacher）同志（八五）底一篇論文，這篇論文是加拉克爾同志用格拉斯哥地方『蘇格蘭工人委員會』名義寫的（八六），他寫道：

『本委員會肯定地反對國會制度，而且各種政治組織底各派都是贊助這委員會的。我們是蘇格蘭革命運動底代表，這個革命運動力圖在生產中（在生產各部門內）建立革命組織，並在全國各處，建立以社會委員

● 似乎社會主義工黨反對加入『工黨』，但不是全體黨員都反對參加國會。

會為基礎的共產黨。我們同正式的國會議員們吵鬧得够久了。我們認為不必公開向他們宣戰，而他們也害怕開始攻擊我們。

然而這種狀況不能長久繼續下去。我們在全部戰線上正在節節勝利。

「蘇格蘭獨立工黨」人批黨員羣衆，一想起國會制度，就愈益覺得討厭；一切地方團體，幾乎完全贊成蘇維埃（蘇維埃這個名詞，是根據俄文發音用英文拼成的）或工人蘇維埃。當然，這對於那些吃政治飯的（或以政治為職業的）先生們，有極嚴重的意義，因此他們用盡一切方法，來說服他們的黨員回到國會主義方面去。革命的同志不應當（所有者重點都是作者加上的）讓這夥匪徒。我們在這一方面鬥爭將是很困難的。這場鬥爭中，最壞的一點，便是那些把私人利益看得高於革命利益的人們底叛變。對於國會主義之任何擁護，簡直就是幫助我們不列顛的謝德曼和諾斯克一流人物，使政權落到他們手裏去。亨德孫、克略英斯（八七）之徒已是無可救藥的反動派。正式的獨立工黨，日甚一日地受到資產階級自由黨勢力的支配，這些自由黨人在麥克唐納（八八）、斯顯頓（八九）這夥人底黨彙中找到了自己精神上的寄託。正式的獨立工黨極端仇視第三國際，而羣衆則贊成第三國際。無論用什麼方法擁護機會主義的議員們，都不過是幫助麥克唐納、斯顯頓這班先生們。不列顛社會黨，在這方面毫無作用；這裏需要一個健全的革命的生產的（工業的）組織以及根據顯明確切的科學原則去行動的共產黨。如果同志們能夠幫助我們來建立這種組織與共產黨，那我們

便不勝歡迎；如果同志們不能幫助，而又不願意擁護以動分子來販賣革命，那麼，就請千萬不要干預此事；這種反動分子非常貪圖攫取議員的「普發」——問號是作者加上的一，如火如荼地想證明他們也和「主人們」一樣，即和資產階級的政治家一樣，能夠有成效地統治國家。

這封致編輯部的信，據我看來，把年輕的共產主義者或剛剛開始接受共產主義的普通工人底情緒和觀點，表現得異常透澈。這種情緒最值得歡迎，最有價值；應當善於重視和贊助這種情緒，因為沒有這種情緒，則英國的——而且是任何一國的——無產階級革命底勝利，會是沒有希望的。善於表現羣衆這種情緒的人，善於在羣衆中喚起這種（往往是矇矓的、不自覺的、未喚醒的）情緒的人，應該加以愛護，應該關心地予以種種幫助。但同時必須直接公開地告訴他們說：在大革命鬥爭中領導羣衆，單靠情緒是不够的；最忠實於革命的人們所將要犯的或已經在犯的某種錯誤，乃是足以妨害革命事業的錯誤。加拉克爾同志致編輯部的這封信，毫無疑義地包含着德國「左派」共產黨人所犯着的和俄國「左」的「布爾什維克在一九〇八年和一九一八年所犯過的一切錯誤底萌芽。

該信作者義憤填膺，表現出最可寶貴的無產階級對於資產階級「階級政治家」的仇恨（這不僅是無產者，而且是一切勞動者，即德國人所說的一切「小百姓」都瞭解和切近的一種仇恨）。

被壓迫和被剝削羣衆底代表所表現的這種仇恨，實在是『一切智慧之母』，實在是各種社會主義運動和共產主義運動及其成功的基礎。但是這封信底作者大概沒有估計到：政治乃是一種科學，乃是一種藝術，這種藝術不是自空而降，不是白白可以得到的；無產階級若想要戰勝資產階級，就必須造就自己的無產階級的『階級政治家』。而且要使這樣的政治家不弱於資產階級的政治家。

該信作者明白瞭解，達到無產階級目的的工具只能是工人蘇維埃，而不是國會，凡是至今尚不了解這點的人，不論他是最有學問的，是最老練的政治家，是最誠懇的社會主義者，是最淵博的馬克思主義者，是最誠實的公民和謹守家風的人，但他總是一個最兇惡的反動者。然而不讓『蘇維埃的』政治家加入國會，不從國會內部來瓦解國會制度，不由國會內部去準備蘇維埃將來解散國會這一任務上的勝利，這樣是否能使蘇維埃戰勝國會呢？——這封信的作者連這個問題都沒有提出，甚至不曾想到有提出這個問題的必要。但同時該作者却說出了一種完全正確的意見，他說英國共產黨必須根據科學的原則來行動。科學所要求的是：第一，要估計其他國家底經驗，尤其是這些也是資本主義國家所正在經歷或不久前業已經歷過的十分類似本國情形的經驗；第二，要估計到在該國內部活動的一切力量、集團、政黨、階級和羣衆，絕不能僅僅根據一個集

團或一個政黨底願望與見解，覺悟程度與鬥爭決心來決定政策。

至於說亨德孫、克略英斯、麥克唐納、斯腦頓之流是無可救藥的反動派，這是很對的。說他們想把政權拿到自己手裏（並且他們寧願同資產階級共同組織聯合政權），說他們想依照資產階級的老方式來『實行統治』，說他們一旦獲得政權，定會和謝德曼、諾斯克之徒如出一轍，這也是正確的。所有這些全都不錯。但由此所得出的結論，絕不是說贊助他們就是背叛革命，而是說工人階級底革命家爲着革命利益，應該在國會方面給這些先生們以相當的幫助。爲了說明這個意思，我且來引用英國現時兩種政治文件：（一）內閣總理路易·喬治（九〇）一九二〇年三月十八日的演說（根據一九二〇年三月十九日曼徹斯特導報（"The Manchester Guardian"）（九一）上面的記載）；（二）『左派』共產主義者西爾維婭·潘克林爾斯同志在上述的她那篇論文內所發表的議論。

路易·喬治在他的演講中，駁斥阿斯克維特（九二）（當時特請阿斯克維特到會，但阿氏拒絕了）及那些不願意與保守黨聯合而想接近工黨的自由黨人。（在加拉克爾同志致編輯部的信中，我們也看到了有些自由黨人轉入獨立工黨的事實。）路易·喬治證明自由黨與保守黨有聯合之必要，而且要密切聯合，否則，那圖謀實行生產資料『公有制』的，即路易·喬治所寧願稱爲『社

會主義的工黨，就會獲得勝利。這個英國資產階級底領袖用通俗的語言，向着他的聽衆，向着那以前大概還不瞭解這點的國會主義的自由黨黨員解釋道：『這，在法國叫做共產主義，在德國叫做社會主義，在俄國叫做布爾什維主義。』路易·喬治又說明，這是自由黨人所根本不能接受的，因為自由黨人是根本贊成私有制的。他說：『文明到了危險境界了，』因此自由黨員與保守黨員必須聯合起來……路易·喬治接着說：

「：如果你們走到農業區域去，那末，你們在那裏所看到的，自然依舊是那些沒有什麼變動的老黨派。那裏離危險還遠。那裏還沒有危險。但是運動一旦到了農業區域，那裏的危險，也就會和現在某些工業區域一樣的巨大。我國五分之四的居民，是經營工商業；而從事農業的，未必有五分之一的居民。這是我想到將來危險時，始終注意到的一種情形。法國居民大都從事農業，那裏有確定觀念底鞏固基礎，這種基礎變動得不很快，也不很容易受革命運動底激盪。在我國就不同了，我國比世界任何其他國家都容易顛覆；如果它開始動搖起來，那末，由於上述原因，它就會比其他國家崩壞得更加厲害。」

讀者從這裏可以看出路易·喬治不僅是一個聰明人，而且他從馬克思主義者那裏學得了不少的東西。我們也不妨從路易·喬治那裏來學些東西吧。

我們再從路易·喬治演講以後所進行的討論中，引出下面一段有趣的問答：

【高斯 (Wallace) (九三) 先生問道：現時產業工人中間有很多是自由黨黨員，我們從他們那裏得到許多援助，請問內閣總理認爲自己在工業區域裏對於產業工人採取的這種政策會有什麼結果。該不會因此使目前忠實擁護我們的工人轉過去大大加強工黨底勢力嗎？】

內閣總理回答說：我所抱定的完全是另一種見解。自由黨人互相傾軋這件事實，無疑義地使得很多自由黨人失望而轉入工黨，在工黨內已經有很多自由黨人，他們都很能幹，現在他們都從事於破壞政府底威信。結果無疑是大大加強同情工黨的輿論。一般輿論，並不趨向於工黨以外的自由派，而趨向於工黨，這是最近補選運動所證明的事實。】

附帶說說，這一段話特別表明資產階級中最聰明的人物，弄得怎樣糊塗而不能不幹些無可救藥的蠢事。就在這點上資產階級也會滅亡的。我們的人，或許也做蠢事（自然要有一個條件，就是這些蠢事不很大，而且能及時改正），但我們的人終歸會成爲勝利者。

另外一個政治文件，就是『左派』共產主義者西爾維婭·潘克赫爾斯特同志的以下一番議論：

「德克平同志（九四）（不列顛社會黨總書記）把工黨叫做「工人階級運動底主要組織」。不列顛社會黨中另一個同志，在第三國際代表會議上，把不列顛社會黨底觀點表現得更加明顯，他說：「我們把工黨看

做是有組織的工人階級。」

「我們不贊同這一種對於工黨的意見。工黨黨員雖多，但裏面有很大一部分黨員是消極的和萎靡不振的。這些男女工人之所以加入工聯，因為他們廠內工友是工聯底會員，又因為他們都想領取補助金。」

「但是我們認爲工黨之所以有這樣多的黨員，也因為工黨是一派思想底產物，而英國工人階級底大多數現時還沒有走出這派思想圈子，雖然民衆底腦筋裏已醞釀着極大的變化，而快要改變這種情形。」

「不列顛工黨與其他國家的社會愛國團體一樣，在社會自然發展底過程中，必然會上台執政。共產黨人底任務就是聚集力量以推翻社會愛國派，我們在英國也就不應當拖延這種活動或遊移不定。」

「我們不應當因增加工黨底力量，而來分散自己的力量；工黨上台，是不可避免的。我們須集中我們的力量，去建立共產主義運動，以便戰勝工黨。工黨快要組織政府了；革命的反政府派，必須準備着向工黨政府進攻。」

總之，自由派資產階級，放棄他們歷史上已爲百年來經驗所體證，且對於剝削者異常有利的「兩黨制」（剝削者底兩黨）制，認爲必需聯合兩黨的力量，來與工黨鬥爭。一部分自由派，好像覆舟時的老鼠一樣，紛紛跑到工黨方面來，左派共產主義者認爲工黨必然會上台執政，並且承認現在大多數工人都贊成工黨。他們根據這種情形，竟作出一個奇怪的結論，西爾維婭·潘克赫爾

斯特同志用以下的話把這個結論說出來了：

「共產黨不應當締結任何妥協；它必須保全自己學說底純潔，保全自己的獨立性，使它不致爲改良主義所玷污；它的使命是勇往前進，而本中途遲留和轉折，逕直地向共產主義革命走去。」

恰恰相反，因爲英國多數工人還跟着英國的克倫斯基輩或謝德曼輩這批人走，因爲他們還沒有嘗過由這批人組成的政府的滋味，而俄國和德國，正因爲嘗過這種滋味，工人才大批地轉向共產主義，由此可以毫無疑義地得出結論說，英國共產主義者必須參加國會，必須由國會內部幫助工人羣衆在事實上認識亨德孫和斯腦頓政府成立後的結果，必須幫助亨德孫輩和斯腦頓輩去戰勝聯合起來的路易·喬治和邱吉爾（九五）。若是不這樣做，便會使革命事業更加困難，因爲如果沒有工人階級多數底觀點轉變，則革命是不可能的，而這種轉變，却又是由羣衆底政治經驗所造成的，只靠宣傳是決不行的。如果工人中現在顯然無力的少數，知道（或至少必應知道）多數工人經過一個短時期以後，在亨德孫和斯腦頓戰勝路易·喬治和邱吉爾的條件之下，便會對於他們自己的領袖表示失望，轉而擁護共產主義（或者至少會對共產黨人守中立，而且大半是守善意的中立），而此時，這無力的少數人却說『不妥協，不中途轉折，要勇往前進』，這種口號，顯然是錯誤的。這好像一萬人與五萬敵人交戰一樣，前者本來應當『停住』，『轉折』，甚至締結『妥

協一，以待不能即刻出發的十萬援兵，然而他們不這樣做，却前去與敵人硬拼。這只是知識分子的孩稚氣，而不是革命階級底鄭重策略。

一切革命，特別是二十世紀所有三次俄國革命所設置的革命基本規律，就在於：爲着革命，僅僅只是被剝削被壓迫羣衆覺得不能照舊生活並要求改革，還是不夠；於着革命，還必須剝削者已不能照舊生活和照舊統治。只有當「下層」不願照舊生活而「上層」不能照舊生活和照舊統治時，革命才能獲得勝利。這個真理，換句話說就是：如果沒有全國的危機（既牽動被剝削者，又牽動剝削者的危機），那末革命是不可能的。這就是說，爲着革命，第一，必須要多數工人（或至少是要多數有覺悟、有思想、在政治上積極的工人）完全明瞭革命是必要的，並抱有爲革命而犧牲的決心；第二，必須要統治階級遭到政府危機，這種危機甚至將最落後的羣衆都捲入政治運動（任何真正革命底標誌，就是從前很消沉的被壓迫勞動羣衆中，迅速產生很多能作政治鬥爭的代表，其數量十倍或甚至百倍地驟增起來），使政府軟弱無力，而使革命者有可能迅速推翻政府。

在英國，這兩個使無產階級革命可以得到勝利的條件，很明顯地正在日益發展着，這是從路易·喬治底演說中也看得出來的。「左派」共產主義者的錯誤現時之所以加倍危險，正因爲我們

看到有些革命者對於這兩種條件，都抱着不充分思索、不充分注意、不充分自覺、不充分估量的態度。如果我們不是一個革命的小團體，而是革命階級底政黨，如果我們要爭取羣衆（不如此，我們便會成爲簡單的空談家），那末，第一，就必須幫助亨德孫或斯腦頓去打倒路易·喬治和邱吉爾（更確切點說：必須逼迫前者去打倒後者，因爲前者害怕自己的勝利！）；第二，就必須幫助工人階級底多數從自己的經驗上看出我們主張底正確，即是說，使他們確認亨德孫和斯腦頓這流人物完全無用，確認這流人物的小資產階級的和叛賣階級的天性，確認這些人物之必然破產；第三，就必須促進下面這種時機的到來，那時多數工人由於對亨德孫輩失望，使可以一舉推翻亨德孫之流的政府，且有獲得勝利的極大可能；因爲既然那個極精明強幹的，不是小資產階級而是大資產階級的路易·喬治，尙且表現張惶失措，並由於昨天和邱吉爾（磨擦），今天又和阿斯克維特（磨擦）而使自己的力量日益削弱（並削弱全體資產階級的力量），那末，將來亨德孫這批人底政府就定會更加張惶失措，進退維谷了。

我要更具體地來說一說。在我看來，英國共產主義者應當把他們的四個黨派（四個黨派都很弱，其中有一兩個更是弱得不堪），在第三國際的原則上，在必須參加國會的條件下，合併起來，成爲一個共產黨。共產黨可以向亨德孫和斯腦頓這流人提議『妥協』，提議訂立選舉協定，

向他們說：我們共同前去反對路易·喬治和保守黨底聯盟，按照工人投給工黨或投給共產黨的票數（不在選舉時，而是用特別表決辦法）來分配國會中的議席，同時我們要保持着宣傳、鼓動及政治活動的完全自由。沒有最後這個條件，當然就不能去和他們聯盟，因為否則便是叛賣階級；英國共產主義者絕對必須堅持和爭得揭發亨德孫和斯腦頓這批人的完全自由，如同俄國布爾什維克（從一九〇三到一九一七總共十五年內）對於俄國的亨德孫輩和斯腦頓輩，即對於孟什維克所堅持過並爭得了的一樣。

如果亨德孫和斯腦頓之流贊同在這種條件下訂立聯盟，那我們便贏了，因為議席的多少，對我們並不重要，我們並不去追逐議席，在這件事情上儘可讓步（但亨德孫之流，尤其是他們的新朋友——也可以說是他們底新主人——那些轉到獨立工黨方面來的自由派，主要目的是爲了獵取議席）。我們贏了，因爲正當路易·喬治自己『激動』羣衆之際，我們能在羣衆中來展開我們的鼓動工作，因而我們不僅幫助工黨加速組織自己的政府，而且幫助羣衆加速瞭解我們共產主義者反亨德孫輩的全部宣傳，我們應該毫無避諱，毫不減默地去進行這種宣傳。

如果亨德孫和斯腦頓之流拒絕在這種條件下同我們訂立聯盟，那我們更加贏了。因爲我們立刻便指明給羣衆看（要注意，甚至在純粹是孟什維主義的，十足機會主義的獨立工黨內部，羣衆

也贊成蘇維埃)；亨德孫這批人寧願接近資本人，而不願使一切工人聯合起來。我們馬上便在羣衆面前佔了上風，這些羣衆聽了路易·喬治那段很正德的、很有益的(對於共產主義有益的)漂亮演說之後，將特別同情於全體工人的聯合，以反對路易·喬治與保守黨的聯盟。我們立刻使顧了，因為我們在羣衆面前證明了亨德孫和斯腦頓這班人害怕戰勝路易·喬治，害怕單獨取得政權，他們偷偷摸摸企圖獲得路易·喬治底幫助，而路易·喬治却公然想去與保守黨攜手來反對工黨。應當指出，俄國一九一七年二月二十七日(舊曆)革命之後，我們布爾什維克反孟什維克和反社會革命黨人(即俄國的亨德孫輩和斯腦頓輩)所進行的宣傳，也正是在上述情況內，獲得了勝利的。我們那時告訴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說：你們拋開資產階級，取得全部政權吧，因為你們在蘇維埃中佔着多數(一九一七年六月第一次全俄蘇維埃代表大會上，布爾什維克只佔了百分之十三的票數)。但俄國的亨德孫和斯腦頓一流，害怕拋開資產階級而取得政權，資產階級却明知在立憲會議選舉中，社會革命黨與孟什維克(這兩個政黨結成極親密的政治聯盟，實際上它們只是一個小資產階級的民主派)將一定獲得多數，於是把這個選舉再三拖延下去，而社會革

● 俄國一九一七年十一月立憲會議選舉，根據當時消息，其結果如下：參加選舉者有三千八百萬人以上，布爾

命黨人與孟什維克却沒有能力來毅然決然地澈底反對這種拖延現象。

如果亨德孫和斯腦頓之流拒絕同共產主義者聯盟，則共產主義者立刻就可奪取羣衆同情心並使亨德孫和斯腦頓喪失信用這方面，獲得贏局，即令我們因此失去幾個議席，這對於我們是毫不重要的。那時我們只在極少數絕對可靠的區域內，即是說，只在我們候選人之提出不致於使該地自由黨人戰勝工黨黨員的區域內，才提出我們自己的候選人。那時我們在選舉鼓動中，要散發宣傳共產主義的傳單，並在沒有我們候選人的一切區域內，請選民投票贊成工黨候選人而反對資產者。潘克赫爾斯特和加拉克爾兩同志，如果認爲這樣便是背叛共產主義，或是放棄反對社會主義叛徒的鬥爭，那他們就錯了。恰恰相反，共產主義革命的事業，無疑義地會因此得到好處。

英國共產主義者，現在甚至於去接近羣衆，甚至於要使羣衆聽完他們的話，都時常感覺棘手。如果我以共產主義者的資格出來講話，請大家投票贊成亨德孫而反對路易·喬治，那末羣衆

什維克獲得了百分之二十五的票數，地上及資產階級各政黨共獲得了百分之十三的票數，小資產階級民主

派，即社會革命黨和孟什維克以及同類的各小團體共獲得了百分之六十二的票數。

定會聽我講話的。那時我不僅可以淺顯地說明爲什麼蘇維埃比國會好，爲什麼無產階級專政比（用資產階級『民主制』招牌作掩飾的）邱吉爾專政好，而且也可以說明我之所以要投票贊成亨德孫，支持亨德孫，正好像絞索支持着絞犯一樣，使亨德孫這批人能更快地組織他們的政府，這也會證明我的意見是正確的，也會使羣衆轉到我這方面來，也會促進亨德孫和斯騰頓之流在政治上的死亡，正如他們在俄德兩國裏的同道者所遭遇過的命運一樣。

如果有人出來反對我，說這種策略太『狡猾』，太複雜，羣衆不會了解，說這種策略會分散和割裂我們的力量，妨礙集中我們的力量去進行蘇維埃革命等等，那我便要對這些『左的』反對者說：不要把你們教條主義的論調，加到羣衆身上去吧！俄國羣衆文化程度，大概不會比英國的高，而要比英國的低些。但羣衆瞭解了布爾什維克；布爾什維克在蘇維埃革命底前夜，即一九一七年九月，提出了參加資產階級國會（立憲會議）的候選人名單，在蘇維埃革命後的第二天，即一九一七年十一月，又舉行了立憲會議底選舉，而到一九一八年一月五日布爾什維克就把這個立憲會議解散了，這種情況並沒有妨礙布爾什維克，反而幫助了布爾什維克。

英國共產主義者中間第二種意見分歧，亦即是否要加入工黨這個問題，我在這裏不能多說。關於這個問題我所知道的材料太少，而這個問題又特別複雜，因爲英國『工黨』，異常特別，在

本身結構上，與歐洲大陸的普通政黨太不相同。不過毫無疑義的是，第一，要是有人認為『共產黨必須保全自己學說底純潔，保全自己的獨立性，使他不致為改良主義所玷污；它的使命是勇往前進，而不中途逗留和轉折，逕直地向共產主義革命走去』，就想根據這一類原則得出革命無產階級的策略，那末，他在這個應否加入『工黨』的問題上也必然要犯錯誤的。因為這一類原則，只不過是重演法國布朗基派公社員們在一八七四年宣稱『否認任何妥協和任何過渡階段的錯誤。第二，毫無疑義，在這個問題上，共產主義者的任務，和任何時候一樣，也就是要善於把共產主義總的和基本的原則，應用到本國各階級和各政黨相互關係底特殊情形上去，應用到本國走向共產主義的客觀發展中的特殊情形上去，這種特殊情形乃是各國互異的，我們應該善於研究，探索和猜度這種特殊情形。

然而這不僅有關英國共產主義運動，而且有關一切資本主義國家內共產主義運動發展的總結。現在我們就來講述這個問題。

一〇 幾個結論

一九〇五年俄國資產階級革命，表現出世界歷史上一個異常特殊的轉變：世界上第一次在一

個最落後的資本主義國家裏，罷工運動的範圍和力量達到了空前未有的程度，單在一九〇五年一月一個月內，罷工人數比過去十年內（一八九五到一九〇四年）平均每年罷工人數，超過了十倍，而自一九〇五年一月到十月，罷工不斷增多，且規模宏大。落後的俄國在許多異常特殊的歷史條件影響之下，第一次向全世界不僅昭示了被壓迫羣衆在革命時的自動精神之躍進式的增長（在一切大革命中都是如此），而且昭示了無產階級底作用比它在全國人口中所佔的百分數不知要大若干倍，昭示了經濟罷工與政治罷工底配合，接着由政治罷工轉爲武裝起義，以及產生了受資本主義壓迫的各階級之羣衆鬥爭及羣衆組織底新形式——蘇維埃。

一九一七年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首先使蘇維埃在全國範圍內達到全面的發展，隨後就使它在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中獲得了勝利。不到兩年功夫，就表現出蘇維埃具有國際性質，就表現出這種鬥爭形式與組織形式普及於全世界工人運動中，就表現出蘇維埃底歷史使命是要成爲資產階級國會制度及一般資產階級民主制度底掘墓人與繼承者。

不僅如此。工人運動底歷史證明：在一切國家中工人運動都要（而且已經開始）經歷着這種鬥爭，即日益生長、日益強健和走向勝利的共產主義之首先而且主要與本國的（每個國家的）『孟什維主義』，就是與機會主義及社會沙文主義的鬥爭；第二，也與共產主義『左派』作鬥爭

(這可以說是一種補充的鬥爭)。第一種鬥爭，在一切國家內，似乎毫無例外，都已開展起來，這種鬥爭乃是第二國際(目前事實上已被打死了)和第三國際間的鬥爭。第二種鬥爭，在德國，在英國，在意大利，在美國(至少，『世界產業工人協會』及無政府工團派底一部分，固執共產主義)左派底錯誤，雖然這些組織差不多全體，差不多一律承認蘇維埃制度)，以及在法國(過去工團派底一部分，對於政黨及國會制度採取不正確的態度，同時他們也承認蘇維埃制度)，也就是說，非但在國際性的範圍內，而且在全世界範圍之內，無疑義地，都可以看到。

但是，每個國家底工人運動，雖然到處都經過實質上乃是同類的預備學校以達到戰勝資產階級，但各國工人運動經歷這發展過程時，都是各自不同的。並且巨大的先進資本主義國家，走着這條道路，比布爾什維主義快得多，布爾什維主義成爲有組織的政派以後，歷史給了它十五年的準備期間，它才獲得了勝利。第三國際在一年的極短期間內，已獲得有決定意義的勝利，把那黃色的，社會沙文主義的第二國際擊潰了，而第二國際僅在幾個月前，還是比第三國際強大得無可比擬，儼如牢不破的龐然巨物，享有全世界資產階級方面直接的、間接的、物質的(關員高位、護照、刊物)和思想的贊助。

現在的全部問題就是要使各國共產黨人十分自覺地認清同機會主義及『左派』教條主義作鬥

爭之原則上的基本任務，同時又顧計到因各國經濟、政治、文化、民族成份（如愛爾蘭等）、所屬殖民地以及宗教派別種種特徵，以致這種鬥爭所必然具有的具體特點。現在到處都感覺得到，對於第二國際的不滿正在繼續擴大和增加，這種不滿是由於第二國際的機會主義，是由於它不會或者不能創立一個真正集權的、真正起領導作用的、能够在革命無產階級爲建立全世界蘇維埃共和國而鬥爭中運用革命無產階級國際策略的中央機關。必須認識清楚，這樣的中央領導機關無論如何都不能建立在使鬥爭策略規律千篇一律、死板劃定、彼此雷同的基礎上。當各民族間的民族差別和各國家間的國家差別尙屬存在時（這些差別，甚至在全世界無產階級專政實現以後，還要在很長時期內存在着），則各國共產主義工人運動底國際策略之統一，不在於消除多樣性，不在於取消民族差別（這在目前，是可笑的幻想），而是要去正確運用共產主義的基本原則（蘇維埃政權，無產階級專政），使這些原則底細節方面能有正確的形式上的變動，使這些原則能正確適應於民族的和民族國家的特殊情形。在每個國家中爲解決統一的國際任務，爲戰勝工人運動內部的機會主義與左傾教條主義，爲推翻資產階級，建立蘇維埃共和國與無產階級專政而採取具體辦法的時候，應當善於考察、研究、探索、猜度和把握每個民族的特點，這便是一切先進國家（而且不僅是先進國家）在目前歷史階段上的主要任務。吸引工人階級底先鋒隊，使這個先鋒隊贊助蘇

維埃政權而反對國會制度，贊助無產階級專政而反對資產階級民主制，在這個問題上的主要事情（自然遠不是所有一切事情，然而主要是重要的事情），已經是做到了的。現在要把一切力量，一切注意力集中在往下一個步驟上面，這個步驟，看來似乎比較次要，——從某種觀點上說，也的確是比較次要，——但在實踐上，却更切近於實際解決任務：這就是要找得過渡到無產階級革命或接近於無產階級革命的形式。

無產階級的先鋒隊在思想上已被我們奪得了。這是主要點。如果沒有這一點，那就連走向勝利的第一步都做不到。可是，這與勝利相隔還很遠。單靠先鋒隊是得不到勝利的。當整個階級，當廣大羣衆還沒有站在直接贊助先鋒隊的立場上，或至少是站在對先鋒隊嚴守善意中立而完全不會援助其敵人的立場上時，單叫先鋒隊去進行決戰，那就不僅是愚蠢，而且是罪惡了。而爲要使真正整個階級，真正廣大的被資本壓迫的勞動羣衆都站上這個立場，僅靠宣傳，僅靠鼓動，還是不夠的。要達到這一點，就要有這些羣衆本身的政治經驗。這是所有一切大革命底基本規律，這個規律現在不僅在俄國，而且在德國都已十分有力而彰明較著地證實了。不僅俄國文化落後往往不識字的羣衆，就連德國文化程度頗高個個識字的羣衆，也必須親身閱歷一番，感覺到第二國際武士們的政府真是完全懦弱無能，完全沒有氣節，完全孤立無援，完全向資產階級逢迎獻媚，完

全卑鄙醜態，感覺到若不堅決轉到共產主義方面來成立無產階級專政，那就必不可免會有極端反動分子（俄國的科爾尼洛夫（九六），德國的卡普（九七）及其同類）底專政。

國際工人運動中覺悟的先鋒隊，即共產黨，共產主義集團和派別，其當前任務就是要善於把廣大羣衆（而現在廣大羣衆大半還是酣睡、消沉、守舊、因循，而沒有醒悟的）引導到這種新立場上，確切一點說，就是要不僅善於領導自己的黨，而且也要善於領導這些羣衆，以使他们們接近和轉到新的立場上來。從前若沒有在思想上、政治上完全戰勝機會主義與社會沙文主義，那末，當時那第一個歷史任務（即吸引無產階級底覺悟先鋒隊到蘇維埃政權與工人階級專政方面來的任務），就不能解決；現在若不消滅左傾教條主義，不完全克服和擺脫左傾教條主義底錯誤，那末，目前這第二個任務，即善於引導羣衆走上能够保障先鋒隊在革命中得到勝利的新立場這任務，同樣也就不能完成。

當以前我們的任務是在於吸引無產階級先鋒隊到共產主義方面來的時候（現時在相當的程度內還是這樣），宣傳使佔了第一位；在這方面講來，甚至那些小組雖帶着小組的一切弱點，也是有益處的，也能作出成效來。但是現在到了羣衆實際行動的時候，要佈置百萬大軍（假使可以用這個述語的話），要配備現社會內一切階級的力量，以便作最後的決戰，到了這個時候，單靠宣

傳的老技巧，僅僅重複「純粹」共產主義底真理，是絲毫沒有用處的。這時，不能像未曾領道過羣衆小組宣傳員所本來計算的那樣，只計算到幾千人；這時應當計算到幾百萬人 and 幾千萬人。這時我們不僅要問自己：我們是否已使革命階級先鋒隊信服，而且還要問：現社會中一切階級——定要是毫無例外的一切階級之起歷史作用的力量是否已經佈置就緒，以致決戰時機已經因下列條件而完全成熟，也就是說：第一，一切敵視我們的階級勢力已經充分錯亂，他們彼此間已充分衝突起來，已因進行力不勝任的鬥爭而充分疲竭；第二，一切猶豫動搖而不穩定的中間分子，即那與資產階級有分別的小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民主派，已在人民面前充分揭穿自己，已因實踐方面的破產而充分丟醜；第三，在無產階級中，羣衆贊助進行最堅決最奮勇革命行動以反對資產階級的那種情緒已經開始並很強大地上漲起來。那時，革命時機就成熟了；那時，我們的勝利，如果我們正確估計到以上簡述的一切條件，並正確選定時機，那我們的勝利，就有保證了。

一方面在邱吉爾派和路易·喬治派（這種政治人物，各國都有，只帶些微少的民族差異）中間的分歧，他方面在亨德孫派和路易·喬治派中間的分歧，從純粹共產主義，即抽象共產主義，亦即還沒有成熟到作實際行動、作羣衆政治行動的共產主義底觀點上看來，是渺小而毫不重要的。但從羣衆實際行動底觀點上看來，這種分歧却是極端極端重要。一個共產黨人如果不僅想做

個覺悟的、篤信的、有思想原則的宣傳家，而且想做一個革命中羣衆底實際領導者，那他的整個任務，他的全部事業，便在於估量到這些分歧，在於猜透這些『朋友』中間之不可避免的，使所有這些『朋友』一齊削弱的衝突完全成熟的時機。要把極端忠於共產主義思想的忠忱，與善於在實踐方面從事一切必要的妥協、機動、通融、轉折、退却等等的才幹融匯起來，以便促進亨德孫這流人（如果不舉出名人的話，那末，就可以說是第二國際底英雄們，即自命爲社會主義者的小資產階級民主派代表們）底政權之成立與倒台；促進他們在實踐上必然破產，因爲這種破產正是用我們底精神，正是向着共產主義這個方向去啓發羣衆的；促進亨德孫派——路易·喬治派——邱吉爾派中間（孟什維克及社會革命黨人——立憲民主派——帝制派中間；謝德曼派——資產階級——卡普派中間等等）必然的磨擦、爭執、糾紛和完全決裂；並且要正確地選擇這些『神聖私有制底柱石』中間決裂得最厲害的時機，以使用無產階級底堅決進攻去擊破所有這一切人並奪取政權。

一般歷史，特別是革命史，總是比较最好的政黨，即最先進階級底最覺悟先鋒隊所想像的，其內容要豐富得多、繁雜得多、生動得多、『狡猾』得多。這是顯而易見的，因爲最好的先鋒隊也只能表現幾萬人的意識、意志、情感和想像；而革命却是在人們一切才智能力特別高漲和緊張之

際，由最激烈之階級鬥爭所鞭策的數千萬人底意識、意志、情感和想像來實現的。由此便得出兩個很重要的實際結論：第一，革命階級爲實現自己的任務起見，必須善於把握毫不除外的一切社會活動底形式或方面（在奪取政權以後，有時候還要冒着巨大危險去完成它在奪取政權以前所未完成的事業）；第二，革命階級必須時時準備着極迅速地突然地由一種形式來代替另一種形式。

一個軍隊，倘若不決心學會使用敵人所有的或者能夠有的一切武器，一切鬥爭手段和方法，那麼誰也會承認這個軍隊底態度愚蠢，或甚至是一種罪行。可是這點在政治上比在軍事上更加明顯。因爲在政治上愈難趁先知道，在將來此種或彼種條件之下，究竟那一種鬥爭手段對於我們適用和有利。倘若我們不把握一切鬥爭手段，那末，當其他階級的狀況，發生不以我們意志爲轉移的變動，而提出我們特別薄弱的活動形式時，我們就會遭受極大的失敗（有時甚至是致命的失敗）。如果我們把握了一切鬥爭手段，那怕當時情形不容許我們採取最厲害的、能極迅速地給敵人以致命打擊的那種武器，我們也一定能夠得到勝利，因爲我們所代表的是真正先進真正革命階級底利益。沒有經驗的革命者，往往以爲公開的鬥爭手段是機會主義的，因爲資產階級特別是在這一方面時常（尤其是在非革命時期，在「和平」時期）欺騙和愚弄了工人；往往以爲只有秘密的鬥爭手段才是革命的。但這不正確。正確的是那些例如當一九一四至一九一八年帝國主義戰爭

時期，在最自由民主國家的資產階級極無恥和極厲害地欺騙了工人，禁止人們談論大戰底強盜性質這一真理的條件下，不能和不顧（請你不要說『我不能』，而說『我不顧』罷）採用秘密鬥爭手段的政黨和領袖，的確是機會主義者和出賣工人階級的叛徒。但是革命者，如果不會把秘密的鬥爭手段和一切公開的鬥爭手段配合起來，那末，他們便是極壞的革命者。在革命已經爆發並熾烈起來的時候，不管是誰都參加革命，有的由於狂熱薰必，有的由於追趕時髦，有的甚至是由於貪圖祿位，這時做一個革命者是不難的。無產階級在奪取政權以後，要經過極大困難，受盡千辛萬苦，才能擺脫這類的假革命家呵。當進行直接公開的、真正羣衆的、真正革命的鬥爭條件還沒有其備時，而善於做一個革命者，善於在非革命的、有時簡直是反動的機關中，在非革命的環境裏，在不能立刻瞭解必須採用革命行動方法的羣衆中，來捍衛革命底利益（用宣傳、鼓動、組織的方法），這就困難得多，也就有價值得多了。要善於尋求、探索和正確判定那種把羣衆引向於真正決勝負的、最後的偉大革命鬥爭之具體道路或事變底特別轉變關頭，——這便是西歐和美國現時共產主義運動底主要任務。

例如英國。我們不能知道，而且任何人也不能預先斷定，那裏什麼時候會爆發真正的無產階級革命，什麼緣由最足以喚醒、掀起並推動那些目前還未醒覺的極廣大羣衆去進行鬥爭。所以我

們必須把我們的全部工作都準備妥當，以便把「四肢都裝上蹄鐵」（正如已逝世的普列漢諾夫還是馬克思主義者和革命家的時候所愛說的那樣）。引起「山崩地裂」的，或許是國會危機；或許是由紛亂到了極點而日益險惡和日益加劇的殖民地與帝國主義矛盾中所產生出來的危機；或許是某種第三類的事變等等。我們所說的，並不是將來那一種鬥爭會決定英國無產階級革命底命運（這個問題絕對不會引起任何一個共產黨人懷疑，這個問題，對我們大家是已經解決了，並且已經是堅定不移地解決了的），我們所說的，究竟是那一種緣由，將來會喚起目前還在沉眠中的無產階級羣衆動作起來，並把他們直接引到革命跟前去。我們不要忘記，例如在資產階級的法蘭西共和國裏，在無論國際方面或國內方面，革命條件都會比現時少一百倍的環境中，單是像反動軍閥千百次無恥行爲之一（德來福斯（九八）案）的這樣一種「意外的」和「微末的」緣由，也就是以激動人民直接去實行國內戰爭！

在英國，共產主義者必須經常不斷地、不屈不撓地、毫不放鬆地既利用國會選舉，又利用不列顛政府底愛爾蘭政策、殖民地政策和全世界範圍內帝國主義政策上的一切事變，利用社會生活底其他各部門和各方面等，按照新的方法，即按照共產主義的方法，用第三國際底精神而不是用第二國際底精神來努力工作。此地我沒有時間，沒有篇幅來描寫「俄國」「布爾什維克」式參加

國會選舉和參加國會鬥爭的方法，但是我可以肯定地告訴國外的共產主義者說，過去俄國的國會選舉運動，與通常西歐的國會選舉運動是完全不同的。人們往往由此得出結論說，『是呵，在你們俄國，是這樣的，但在我們這裏的國會制度却是另一個樣子』。這是很錯誤的結論。全世界共產主義者，第三國際擁護者底任務，正是要在各方面，在生活的各部門中，把舊的、社會黨的、工聯派的、工團主義的國會工作方式，改造為新的，共產主義的國會工作方式。在俄國底選舉裏，也會經常有過真正不少的機會主義的行爲，純粹資產階級的，只顧小利的，資本主義投機撞騙的行爲。西歐和美國的共產主義者，必須學會創造一種新的、迥非尋常的、不是機會主義的、不是貪圖政位的國會工作方式：務使共產黨提出自己的口號，務使真正無產者在沒有組織的、備受抑壓的貧民幫助之下，散發傳單，走遍工人住宅，走遍鄉村無產者和窮鄉僻壤（幸而歐洲所有的窮鄉僻壤，要比俄國少許多倍，英國尤少）農民所住的茅舍，走到最平民式的茶樓酒肆中去，鑽進最大衆化的會社、團體和偶然集會裏去，在同民衆說話時不用學者的口吻（也不要過於用在國會中說話的語氣），絲毫也不爭逐國會議席的缺位，而要到處啓發思想，吸引羣衆，揭破資產階級食言的地方，利用資產階級所設立的機關，所舉行的選舉，向國民所發表的口號，來使羣衆盡量認識布爾什維主義；要知道，除選舉外，在資產階級統治下，平素是得不到這種機會的（自

然大罷工的機會是例外，因為在俄國大罷工的時候，類似的全民鼓動機關，工作得更加緊張）。在西歐和美國，進行這些事情，是很困難的，是十分困難的，但這些事情是可以進行而且應該進行的，因為不費氣力，一般地就不能解決共產主義底任務，既然花費氣力，那就要解決日益複雜，日益和社會生活各部門緊相聯系，並把各部門先後從資產階級手中奪取過來的實際任務。

在英國，也應當在軍隊中，在『本』國被壓迫和不平等民族中（如愛爾蘭、各殖民地）按照新的方式（不是按照社會黨的方式，而是按照共產黨的方式，不是用改良主義手段，而是用革命手段）來進行宣傳、鼓動與組織工作。須知在社會生活底這些方面，一般地在帝國主義時代，尤其是在大戰後的現在，當各民族已飽受戰爭痛苦而迅速認識真情實況的時候（這種真情實況，就是幾千萬人被打死和變為殘廢，只是為的解決一個問題：究竟是英國強盜，還是德國強盜將掠奪更多的國家），引火的燃料特別充足，釀成衝突，掀起危機，使階級鬥爭變本加厲的緣由，特別豐富。現時在全世界經濟危機和政治危機底影響下，在一切國家內，都有無數火星到處橫飛，我們不知道，而且也不能知道，到底是那顆火星子能燃起大火，即能特別喚醒羣衆，因此我們必須用我們新的、共產主義的原則，走到各方面，甚至到那最陳舊的、最腐敗的、看來是毫無希望的方面去進行工作，不然，我們將來便不能担負起自己的任務，便不能照顧到各方面，便不能掌握

所有各種武器，便不能準備好去戰勝資產階級（資產階級把社會生活底各方面都按資產階級的方式建成了——而現在也按資產階級方式把它們破壞了），也不能準備好在得到這種勝利之後，用共產主義的方式去改組全部社會生活。

現在當俄國無產階級革命以後，當這個革命在國際範圍內獲得了出乎資產階級及庸夫俗子意外的勝利之後，全世界都改換了樣子，資產階級也到處改換了樣子。資產階級爲『布爾什維主義』所嚇倒，它因痛恨『布爾什維主義』幾至神經錯亂，所以它一方面既促進事變的發展，另一方面又聚精會神，用暴力來鎮壓布爾什維主義，因此它也就在其他許多方面削弱了自己的陣地。一切先進國家的共產主義者在決定策略時，應當估計到這兩種情形。

當俄國立憲民主黨人及克倫斯基大舉攻擊布爾什維克時，——特別從一九一七年四月起，而到一九一七年六月和七月間攻擊得更加兇猛，——他們做得『太過火了』。出版至幾百萬份的資產階級報紙用盡各種腔調，大罵布爾什維克，反而喚起了羣衆去估計布爾什維主義；況且除了報章以外，整個社會生活中，由於資產階級『熱心』，反而大大引起了對布爾什維主義問題的爭論。現在各國百萬富豪在國際上的行動，也使我們不得不對他們表示誠懇謝意。他們盡心竭力攻擊布爾什維主義，與從前克倫斯基之流毫無二致；他們做這件事情，也和克倫斯基一樣，做得

『太過火了』，因而也幫助着我們。法國資產階級把反布爾什維主義問題作為選舉問題的中心，而責罵比較溫和的或動搖的社會黨人，說他們傾向布爾什維主義；美國資產階級張皇失措，把成千成萬的人，認為是布爾什維主義的嫌疑犯而大肆逮捕，到處造謠，說布爾什維克陰謀不軌，因之造成一種人心惶惶的空氣；英國資產階級，這個世界上『資格最老的』資產階級，不管它怎樣聰明，怎樣富有經驗，却做出了想像不到的蠢事，它建立了經費極端充裕的『反布爾什維主義協會』，出版專門評論布爾什維主義的書報，添僱很多的學者、鼓動家、神父來專門反對布爾什維主義；我們對於這些資本家先生們，應該鞠躬致謝。他們在替我們効勞工作。他們幫助我們，促使羣衆來注意布爾什維主義底實質和意義問題。本來他們也就不能有另一種作法，因為要想『絀口不說』布爾什維主義，要想剷除布爾什維主義，這點他們已經是辦不到了。

但同時資產階級差不多只見布爾什維主義底一方面：只見武裝起義、強力、恐怖；因此資產階級特別準備在這一方面，極力抵抗。在個別情形之下，在單個的國家裏，在某種短促期間內，資產階級也許能夠辦到這一點，——我們必須顧及到這一種可能；然而資產階級縱能達到這一點，對於我們，也是絕對沒有什麼可怕的。共產主義真可說是從社會生活底各方面『生長起來』，它的萌芽真正是無處不有，『傳染病』（這是資產階級及其警察很喜歡使用的最『愜意』

的比喻）已經根深蒂固地侵入到全機體之內。如果特別小心謹慎，『堵住』一個出口，『傳染病』又會從另一個出口，有時是完全意想不到的出口迸發出來。這是生活的必然現象。儘管資產階級東奔西撞、兇狂暴戾、肆意橫行，做出許多蠢事，預先報復布爾什維克，並儘情屠殺（在印度、匈牙利、德意志等國）幾百、幾千、幾十萬個明天或昨天的布爾什維克；儘管資產階級這樣橫行無忌吧，但它的命運總是和以前被歷史判處了死刑的一切階級底命運一樣。共產主義者應當知道，將來的世界，無論如何都是屬於我們的，因此我們能够（而且應當）既在大革命的鬥爭中表現極大的熱情，同時又能用最冷靜和最清醒的頭腦去估量資產階級瘋狂奔撞的行動。一九〇五年俄國革命，被殘酷地撲滅了；一九一七年七月，俄國布爾什維克被擊敗了；一萬五千名以上的德國共產黨人，被謝德曼和諾斯克協同資產階級和帝制派將軍們用極巧妙的詭計和欺詐手段所屠殺了；在芬蘭，在匈牙利，白色恐怖異常猖獗。然而在所有這些情形之下，在一切國家之內，共產主義運動還是日益鞏固，日益發展着；它是這樣根深蒂固，甚至連摧殘追究都不僅沒有削弱，反而加強着共產主義運動。要使我们更加有把握和更加切實地走向勝利，所缺少的只有一件事，這就是：一切國家底一切共產黨人，都要澈底覺悟到必須使自己的策略盡量靈活。蓬勃發展的共產主義運動，特別是各先進國家內的共產主義運動，目前所缺乏的，正是這種覺悟以及在實踐中體

現這種覺悟的本事。

那些博學的馬克思主義者而且從前是忠於社會主義的第二國際領袖們如考茨基、奧托·鮑威爾等底破產，可以（而且應當）成爲很有益的教訓。從前他們完全覺悟到必須採取靈活的策略，他們自己學習了馬克思底辯證法，而且以此教育過別人（從前他們在這方面的著作中，有許多永遠是社會主義文獻上有價值的東西），但是他們在應用辯證法的時候，却犯了極大的錯誤，或在實踐上完全暴露他們是非辯證論者，完全是不善於估計到形式底迅速更變，以及舊形式中迅速充滿新內容的人，遂使他們底命運與漢德曼（九九）、黑得和普列漢諾夫相差無幾。

他們破產底根本原因，就在於他們對工人運動和社會主義運動的發展，祇是『呆呆注視着』一個固定的形式，忘記了這個形式是片缺不全的，他們害怕看見那種因客觀條件改變而必然發生的急劇轉變，而繼續千篇一律地重複那種簡單的、讀熟了的、初看起來是不容爭辯的真理：三大於二。然而政治與其說像算術，不如說像代數，與其說像初等數學，不如說像高等數學。實際上，一切社會主義運動底舊形式，已經充實了新內容，因此在數字前面，出現了一個新符號，出現了一個『負號』，可是我們的這班聰明角色却固執成見，過去現在都還繼續在那裏肯定地向自己 and 別人說，『負三』大於『負二』。

我們要設法使共產主義者，不要重複同樣的，不過是從另一方面來的錯誤，更確切一點說，要趕快糾正並要使機體少受損害而迅速消除那種爲『左派』共產主義者所犯的同樣的，不過是從另一方面來的錯誤。不僅右傾教條主義是一種錯誤，左傾教條主義也是一種錯誤。當然，目前共產主義運動中『左傾』教條主義底錯誤與『右傾』教條主義（即社會沙文主義與考茨基主義）底錯誤比較起來，前者的危險性與嚴重程度，要小一千倍，然而，這祇不過是由於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左派』，還是很年幼的、剛剛發生的一種思潮。只是因爲這個緣故，這種病症，在一定條件之下，也許容易醫治好，所以必須用極大的努力來着手醫治這種病症。

舊形式破裂了，因爲舊形式裏面的新內容，即反無產階級的、反動的內容，已經發展到無法包容的地步。從國際共產主義發展上看來，我們現在有了這樣堅固、這樣強大有力的工作內容（爭取蘇維埃政權，爭取無產階級專政），足以使這種內容能夠而且應該無論在新的形式或舊的形式中表現出來，它能夠而且應該改造、戰勝與征服一切的形式，不僅是新的形式，而且是舊的形式，——其目的並不是要與舊形式調和，而是要善於把所有一切新舊形式變爲共產主義獲得完全的、和最後的、堅決的和澈底的勝利所運用的武器。

共產主義者要用全副力量，去使工人運動以及一般社會發展，走上最直捷、最便捷的道路，

向着使蘇維埃政權與無產階級專政在全世界上獲得勝利的目標前進。這是無可爭辯的真理。然而只要向前再多走一小步，——看來彷彿依然是向同一方向前進的一小步，——真理便會變成錯誤。只要像德國和英國左派共產主義者一樣，說什麼我們只承認一條道路，一條筆直的道路，我們不容許機動、通融和妥協，這就已經是錯誤了；這種錯誤，足以使共產主義受到極嚴重的損害，而且局部地已經並在繼續使共產主義受到極嚴重的損害。右傾教條主義會因固執成見，僅僅承認舊形式，忽略新內容，而完全破產了。左傾教條主義現在固執成見，無條件地否認一定的舊形式，看不見新內容能經過各種各樣的形式來開闢自己的道路，不知道我們共產主義者底責任，就是要把握一切形式，學會以最快的速度，用一種形式去補充別種形式，用一種形式去代替另種形式，使我們的策略去適應於不是由我們的階級或者不是由我們的努力所引起的各種形式的各種更替。

帝國主義世界大戰的慘禍，其卑鄙醜惡內容及其所造成的無出路狀況，如此強有力地推動和加速了全世界革命，這個革命在廣度和深度方面都發展得這樣迅速，具有這樣豐富的更替着的形式，供獻這樣有教益意義而在實踐上駁倒各種教條主義的論據，以致使我們有十足的根據來希望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可以很快地完全地醫治好『左派』共產主義幼稚病。

增補

全世界帝國主義者對無產階級革命實行報復，曾把我國掠奪一空，並不顧對本國工人所說的任何諾言，繼續加以掠奪和封鎖，而在這樣的條件下，當我國印刷局已設法料理好來印行我這本小冊子的時候，却從國外得到了一些補充材料。我並不把這本小冊子看作是比政論家短評較大的著作，因此要簡略地補述下列幾點。

一、德國共產黨人底分裂

德國共產黨人底分裂，現已成爲事實。『左派』或『原則上的反對派』已經另行組織『共產黨』，以別於『共產黨』。在意大利，也好像走到分裂的地步——我說『好像』，是因爲我僅僅有新到的兩期（第七期和第八期）左派報紙蘇維埃（*Il Soviet*），上面公開討論分裂底可能

與必要，同時也講到試制派（即反對參加國會的派別）（C）底代表大會，而這一派直到現在是屬於意大利社會黨內的。

與『左派』，即『反國會派』（其中有一部分人也反對政治，反對政黨，反對在職工會內工作）實行分裂，好像過去與『中派』（或考茨基派，龍格派，『獨立工黨』等等）實行分裂一樣，也許要成爲國際的現象。就讓它這樣吧。分裂總比觀念混亂要好些，因為觀念混亂既妨礙黨在思想上、理論上、革命精神上的發展和成熟，也妨礙黨內和衷共濟的，真正有組織的，真正準備無產階級專政的實際工作。

談『左派』在國內和國際舞台上實際把自己考驗一番吧，讓他們不要嚴格集中和具有鐵的紀律的黨，不要有善於掌握各方面、各部門、各種政治工作與文化工作的能力，去試試準備（並且接着就去實現）無產階級專政吧。實踐經驗很快就會教訓他們的。

不過必須加緊努力，要使與『左派』的分裂不致妨礙或儘少妨礙在最近將來工人運動中一切誠懇主張蘇維埃政權和無產階級專政的分子必然而且定要匯合成爲統一政黨的事業。俄國布爾什維克所特別稱幸的，就是他們遠遠在爭取無產階級專政的羣衆直接鬥爭以前，有十五年工夫，來進行有系統的、貫徹到底的鬥爭，既反對孟什維克（即機會主義者與『中派』），又反對『左

派』。而在歐美，現在却不得不用『急行軍』的辦法來進行這種工作。個別的人，特別是那些觀望領袖而沒有成功的人，會在長期之內固執成見，知過不改（如果他們缺乏無產階級的紀律觀念和『光明正大態度』的話），但工人羣衆，一旦時機成熟，便會迅速而容易地自己聯合起來，並把一切誠實的共產主義者聯合起來，成爲一個統一的黨，成爲有實現蘇維埃制度和無產階級專政能力的黨。

● 關於『左派』共產黨人，即反國會議，將來與一般共產黨人合併的問題，我還要指出下列一點。據我所讀到的德國『左派』共產黨人以及一般德國共產黨人底報紙判斷起來，『左派』有一層長處，就是他們比較一般的共產黨人善於在羣衆中進行鼓動工作。我在布爾什維克黨的經歷上也屢次看到過這類的行情，不過範圍較小並且是在個別的地方組織裏，而不是在全國範圍內。例如在一九〇七至一九〇八年間，『左派』布爾什維克有時候在某些地方鼓動羣衆，比我們更有成效。局部地這是因爲在革命時候或者革命情景逼壓歷在目的時候，採用『簡單』否認一切的策略，比較容易接近羣衆。然而這還不足以證明這種策略是正確的。可是無論如何，毫無疑義的，一個共產黨要想在事實上做革命階級，即無產階級底先鋒隊或先鋒部隊，而且要想學會領導廣大羣衆，不僅領導無產階級的羣衆，而且領導非無產階級的羣衆，被壓迫的勞動羣衆，那末，它就必

二 德國的共產黨人與獨立黨人

我在這本小冊子裏曾說過，共產黨人和獨立黨左派之間的妥協，對於共產主義運動是必要而且有益的，但要實現這種妥協，却是不容易的事。此後我收到的報紙，把這兩種意見都證實了。

一九二〇年三月二十六日出版的德國共產黨中央機關報紅旗（“Die Rote Rahne” Zentralorgan der Komm. Partei Deutschlands, Spartakusbund）第三十二期上，載有德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關於卡普和留特維茨（101）軍事『盲動』及關於『社會主義政府』的『聲明』。無論從基本的前提上，或從實際的結論上看來，這篇聲明都完全正確。基本的前提就是，目前還沒有無產階級專政底『客觀基礎』，因為『城市工人底多數』擁護獨立黨人，結論是：聲明對於那個『排除各資產階級政黨參加的社會主義政府』，採用『善意反對派』底態度（就是不準備用『強力來推翻』這個政府）。

須善於採用不管對於城市、對於工廠『街道』或對於鄉村都是最淺近、最明確、最清楚、最生動的說話與方法去進行宣傳、組織和鼓動的工作。

這個策略，基本上無疑義是正確的。可是，我們固然不應當在字句上吹毛求疵，但是有些地方却也不能緘默過去，例如社會主義叛徒們底政府，決不能（在共產黨底正式聲明上）稱之為『社會主義的』政府，謝德曼這一派人以及考茨基——克里斯平這班先生們的政黨既然是小資產階級民主派的政黨，那就不能說什麼排除『各資產階級政黨』這類的話，並且決不能寫出像『聲明』底第四條這樣的語句：

『：當政治自由可以無限制地利用，當資產階級民主制不能成爲資本專政時，這種情形，從無產階級專政發展的觀點上來看，爲了繼續奪取無產階級羣衆到共產主義方面來，是極爲重要：』

這種情形是不可能的。小資產階級的領袖，德國的亨德孫派（謝德曼派）斯腦頓派（克里斯平派）跳不出，且不能跳出資產階級民主的範圍，而這種民主制又不能不是資本底專政。德國共產黨中央爲要達到它所全然正確地力求獲得的實際效果，便完全不應當寫這些在原則上不正確和在政治上有害處的東西。爲獲得實際效果起見，祇須說（如果要講講國會式的客氣話）：當多數城市工人跟隨着獨立黨人的時候，我們共產黨人，祇好讓這些工人，去嘗試『他們自己』政府底經驗，以便他們自己能拋棄最後的市儈民主主義的（也就是『資產階級的』）幻想。這種說法完全是以做這種真正必要的妥協的根據，而妥協的內容應當是：我們在一定時期以內並不企圖用強

力去推翻多數城市工人所信仰的政府。但是在日常的羣衆鼓動工作中，並不受官場的國會式的客氣語所拘束，自然可以往下發揮說，讓謝德曼輩這類下流東西，考茨基、克里斯平輩這批庸俗之徒在事實上揭穿自己如何自欺，又如何欺騙工人；他們的『清潔』政府，會『最清潔不過地』做這一番『清洗』工作，來把社會主義、社會民主主義以及其他各種叛賣階級的社會主義底骯髒馬廐，『清洗』得乾乾淨淨。

『德國獨立社會民主黨』現時領袖們（有人說這些領袖已經根本喪失了自己的影響，那是不對的，在實際上，他們對於無產階級，要比那些自命爲共產主義者而且答應『擁護』無產階級專政的匈牙利社會民主黨人，更危險得多）底真正面目，在德國的科爾尼洛夫式的事變時，就是在卡普和留特維茨底政變時[●]，又一次地暴露出來了。一個雖然簡短，却很明瞭的描述，便是考茨基所做的一篇小小文章，題目叫做決勝負的關頭（"Entscheidende Stunden"）(1917)，這篇文章

● 這次政變，在一九二〇年三月二十八和三十日奧國共產黨極好的機關報紐頓上要當明瞭、簡單、切實地用馬

克思主義的方法闡述過。（"Die rote Fahne", Wien 1920, No. No. 236, p. 287; L. L. "Ein neuer

Abschnitt der deutschen Revolution"）

登在一九二〇年三月三十日出版的“Freiheit”（自由報，獨立黨人底機關報）上面，同時又有阿爾托·克里斯平底論政局（1011）一文（見一九二〇年，四月十四日自由報）。這些先生們絕對不會用革命家的態度去思索和論斷問題。這是些只會嘍嘍啜啜的市僧民主派，如果他們自稱為蘇維埃政權與無產階級專政底信徒，那末，他們對於無產階級的危險便要增加千百倍，因為他們事實上，在每個困難和危險的關頭，必然要作出叛賣的勾當……同時却『竭誠地』繼續自信，以為他們是幫助無產階級！要知道冒充共產主義者的匈牙利社會民主黨人，當他們由於胆小和無氣節的緣故，認為匈牙利蘇維埃政府底情形毫無希望，就在協約國資本家和協約國劊子手底走狗前面痛哭流涕，這時他們也是想『幫助』無產階級啊！

三 意大利的屠拉梯之流

上面所提到的那幾份意大利的蘇維埃報，完全證實了我在這本小冊子內所說的話：意大利社會黨，容忍這一類黨員，甚至這一批議員在自己的隊伍內，乃是一種錯誤。例如英國資產階級自由派報紙曼徹斯特導報駐羅馬通訊員這個局外的證人，更證實了這點，他於一九二〇年三月十二日，在該報發表了他和屠拉梯的一篇談話（104）。這個通信員寫道：

「屠拉梯先生認爲革命的危險，並不很大，不至於在意大利引起無根據的顧慮。極端派玩弄蘇維埃理論底烈火，祇是爲要使羣衆底情緒經常處在興奮與緊張狀態之中。然而這種理論純粹是海外奇談，是不成熟的綱領，實際上是毫不適用的。它只能是使勞動階級經常覺得有所希望。用這種學說做幻彩去迷惑無產者的人們，迫不得已進行日常鬥爭，以圖獲得一些往往是微末的經濟上的改良，好來遷延時日，使工人階級不致即時喪失自己的幻想，喪失對自己得意神話的信仰。由此就接連不斷發生大大小小的，各色各樣的罷工，直到最近郵政鐵路的罷工，——這些罷工使得國內嚴重局勢，愈加嚴重。因亞得到亞海問題而發生的困難，使全國憤慨不安，積欠外債和濫發紙幣使全國顛簸不振，但是我們的國家還遠未覺悟到有採用勞動紀律之必要，其實只有這種勞動紀律，才能恢復國內秩序和優裕生活！」

很明顯的，屠拉梯自己及其意大利資產階級的辯護士、幫手、教唆人等所掩蔽所粉飾的實情，却被英國的記者洩漏出來了。這種實情就是屠拉梯、特列維斯（二〇五）、莫其良尼、（二〇六）杜郭尼（二〇七）一流先生們底思想和政治工作正與英國記者所描寫的恰恰相同。這是澈頭澈尾的社會主義叛徒。他們主張在僱傭勞動奴役制下爲資本家發財而工作的工人應遵守秩序與紀律，單就這一點說，已是十足的叛變行爲了！所有這些孟什維克式的言論，對於我們俄國人該是何等耳熟呵！他們說羣衆擁護蘇維埃政權，該是何等有價值的承認呵！他們竟絲毫不懂得自發開展的罷工

運動底革命作用，該又是何等鈍拙，何等鄙陋的資產階級心理呵！真的，真的，英國資產階級自由派報記者替屠拉梯一流先生們幫了一次欲益反損的忙，他最好不過地證實了波爾迪加同志及其蘇維埃報中的友人們所提出的要求是正確的，他們要求意大利社會黨，如果想在事實上擁護第三國際，那就得仗義聲討，把屠拉梯之流的先生們趕出自己隊伍，那就要不僅在名義上，而且在事實上成爲真正的共產黨。

四 由正確的前提作出錯誤的結論

但是波爾迪加同志和他的「左派」友人，却從對於屠拉梯這流先生們所下的正確批評中，作出了一個錯誤的結論，以爲凡是參加國會都是有害的。意大利「左派」並不能拿出絲毫鄭重的論據來辯護這個觀點。他們簡直不知道（或故意忘記）國際上有過用真正革命方式，即真正共產主義方式利用資產階級國會而毫無疑義是有益於準備無產階級革命的模範例子。他們簡直不懂得「新的」利用國會制度的方法，而只是高聲大嚷，千番百次以至無窮地說那種「舊的」、非布爾什維克的利用國會制度的方法。

這正是他們根本錯誤的所在。共產主義運動中，不僅在國會方面，而且在一切活動方面都應

該加添（而且若不進行長期的、堅持的、頑強的工作，便無法添加）原則上新穎的、根本上與第二國際底傳統不同的東西（同時要保留並發揚第二國際所貢獻的好東西）。

就拿編輯工作來說吧。報章、小冊子、傳單等都是用來進行必要的宣傳、鼓動和組織工作的。在一個多少文明的國家內，羣衆運動決不能沒有編輯機關。儘管你責罵『領袖』，儘管你發誓要使羣衆不受領袖底影響而保全純潔，也還是不能使我們不利用那些由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出身的人物來進行這個工作，還是不能使我們脫離在資本主義下進行這個工作時所處的資產階級民主的、『私有制的』氣氛和環境。甚至我們在推翻了資產階級，由無產階級奪得了政權兩年半以後，還是爲羣衆（農民和手工業者）中資產階級民主的、私有制的關係所形成的這種氣氛，這種環境所環繞着。

利用國會是工作底一種形式，編輯事業是工作底另一種形式。如果在這兩方面的工作人員是真正的共產主義者，是無產階級羣衆政黨底真正黨員，那末，這兩種工作底內容，都可以成爲共產主義的，而且應當成爲共產主義的。但無論在前一方面或後一方面——而且在資本主義下，以及從產本主義進到社會主義的過渡時期內，無論在那一方面的工作——都必然會遇到這樣一些困難和特殊任務，這種困難和任務是無產階級爲要利用從資產階級中出身的知識分子來達到自己

的目的，爲要戰勝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底成見和影響，爲要削弱小資產階級環境的抵抗力（往後還要完全改造小資產階級的環境）所必須加以克服和解決的。

一九一四至一九一八年的戰爭以前，在各國，很『左』的無政府主義者和工團主義者等痛罵國會制度，嘲笑被資產階級所腐化了的社會黨議員，抨擊鑽營祿位的行動等等，可是他們自己却借著編輯工作，借著工會工作，去做同樣資產階級式的鑽營祿位的勾當，難道這樣的例子當時我們不是看得非常之多麼？如果只就法國來說，難道如沃和麥爾黑姆這些先生們底行爲，不是標本式的例子麼？

『拒絕』參加國會的幼稚氣，就在於他們想用這樣『簡單的』、『輕易的』、『似乎是革命的方法』來『解決』與工人運動內部的資產階級民主影響作鬥爭這一種困難任務，而事實上他們只是掩耳盜鈴，只是閉起眼睛不看困難，只是用空話來迴避這種困難罷了。極無恥的鑽營祿位行爲，資產階級式的利用議席肥缺，改良派的對國會工作的驚人曲解，卑鄙的市儈陋習——凡此種種，毫無疑義都是資本主義到處產生着的，不僅在工人運動以外，而且在工人運動內部產生着的通常和最流行的標本現象。然而資本主義及其所造成的資產階級環境（這種環境，就在推翻了資產階級以後，也消逝得很慢，因爲農民經常不斷地重新產生出資產階級），在工作和生活底各方

面，都產生出形式上稍有差別，而實際上完全相同的資產階級式的鑽營勾當，民族沙文主義，市儈卑污行爲等等。

親愛的抵制國會派和反國會派的人們呵，你們自己覺得自己『異常革命』，但事實上，你們是看見與在工人運動內部之資產階級影響作鬥爭時發生了比較不大的困難，就爲這些困難所嚇倒了，殊不知你們底勝利，即推翻資產階級和由無產階級奪取政權的事業，將產生同樣的困難，而且困難的程度要大得多，要大無數倍。你們同小孩子一樣，被今天的小困難所嚇倒了，却不知道到了明天和後天你們還必須學習，必須補習怎樣去克服同樣的，而程度却不知要大多少倍的困難。

在建立了蘇維埃政權時，會有更多的由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出身的人鑽入到你們的和我們的無產階級政黨裏面來。他們將鑽進蘇維埃，鑽進法庭，鑽進行政機關中來，因爲我們不用資本主義所培養出來的人材，就不能建設，並無從去建設共產主義，因爲我們不能趕走和消滅資產階級的知識分子，我們應當戰勝他們，改造他們，重新淘養和重新教育他們，——猶之在無產階級專政基礎上，在長期鬥爭中來重新教育無產者自己一樣，因爲無產者不是一下子就能擺脫自己那些小資產階級成見的，這些成見不是用神術，不是依聖母意旨，不是依口號、決議、法令底意旨所能

擺脫，而是只有在與廣泛的小資產階級影響作長期艱苦的羣衆鬥爭中才能擺脫的。現在反國會派這樣趾高氣揚，這樣目空一切，這樣輕舉妄動，這樣幼稚無知，想一揮手就拋開這些任務，殊不知在蘇維埃政權之下，也就是這些任務要在蘇維埃底內部，在蘇維埃管理機關內部，在蘇維埃的『法律辯護員』中間復活起來（我們俄國打破了資產階級的律師制，而且打破這種制度是很正確的，但是它在『蘇維埃的』、『法律辯護員』底名義之下，又重新復活起來）。在蘇維埃的工程師中間，在蘇維埃的教員中間，在蘇維埃工廠內享受特權的，即熟練程度最高、待遇條件最好的工人中間，我們可以看到資產階級國會制所固有的一切壞處都在不斷地復生着，我們只有用無產階級的組織性和紀律性，作再接再厲、堅持不懈的長期頑強鬥爭，才能逐漸地戰勝這種禍害。

自然，在資產階級統治下面，要克服我們自己黨內，即工人黨內的資本主義陋習，是很『困難的』事情；要把被資產階級偏見所完全腐化了的、習以爲常的、當國會議員的領袖們趕出黨去，是『困難的』，要使資產階級出身的分子中間絕對必要的一部分人（即令人數很少的相當一部分人）來服從無產階級的紀律，是『困難的』，要在資產階級的國會裏建立真正不愧爲工人階級代表的共產黨黨團，是『困難的』，要使共產黨議員不從事資產階級國會的玩意兒，而從事於在羣衆中進行宣傳、鼓動、組織的迫切工作，是『困難的』。凡此種種都很『困難』，這是用不

着說的；從前在俄國是困難的，現時在西歐和美國更不知要困難多少倍，因為在西歐和美國，資產階級強大得多，資產階級民主傳統的勢力等等，也強大得多。

但是所有這些『困難』，若與無產階級在準備獲得勝利的時候，在無產階級革命期間內以及無產階級奪取政權以後所終歸必須解決的完全同類的任務比較起來，簡直如同兒戲。將必須在無產階級專政下，來重新教育千百萬農民和小業主，數十萬職員、官吏及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使他們大家都服從無產階級的國家和無產階級的領導，戰勝他們中間的資產階級的習慣和傳統——這些真正偉大的任務比較起來，那末，在資產階級統治下，在資產階級國會裏，建立真正無產階級政黨底真正共產黨黨團，乃是一樁輕而易舉，形同兒戲的事情。

如果『左派』以及反國會派的同志們，連像克服現在這種小困難的事情，都不能學會，那末，我們就可以肯定地說，他們將來或者是沒有能力去實現無產階級專政，不能大規模地使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和資產階級的機關服從自己並改造這些分子和機關，或者將來必須倉卒補習這些事情，並由於這樣卒倉補習，就會使無產階級的事業受到很大的害處，做出比平常更多的錯誤，表現出比平常更大的弱點和無能等等。

只要資產階級一天沒有被推翻，只要小經濟和小商品生產一天沒有完全消失，則資產階級的

環境，自私的習慣，市儈的傳統，就一定會從工人運動底內部和外部來損害無產階級的工作，而且所損害的範圍，不僅在社會活動底一方面，即國會活動方面，而且必然在社會活動底所有各方面，在一切文化和政治的舞台上，毫無例外。在某種工作上，遇着某一椿「不愉快的」任務或困難，便想畏難偷安，托詞躲避，這是絕大的錯誤，爲了這點，後來一定要償付代價的。應該學習並學會毫不除外地掌握所有一切方面的工作和活動，到處克服一切困難以及一切資產階級的風氣、傳統和習慣。另一樣處置問題的辦法簡直是不鄭重的舉動，簡直就是幼稚氣。

一九二〇年五月十二日

寫於一九二〇年四月至五月間

一九二〇年六月印成單行小冊子

選自列寧全集第三版第二十五卷第一六五至二五〇頁

簡要註釋

(I) 考茨基（一八五四——一九三九年）德國社會民主黨人，第二國際時代馬克思主義之大理論家、經濟學家、歷史學家。一八七四年，加入奧國社會民主黨，依附於該黨由魯伊和奧斯特所領導的半無政府主義派。在馬克思和恩格斯直接影響之下，成了馬克思主義者。在「特殊法」時期（一八七八——一八九〇年），在德國社會民主黨底蘇立非法的機關社會民主黨人上合作。一八八三年，創辦了學術性的雜誌新時代（*Die Neue Zeit*），任它的編輯至一九一七年爲止。在九十年代，寫了很多馬克思主義的著作（如土地問題等）。一八九八年，經過大動搖之後，出而反對伯恩斯坦修正主義（反伯恩斯坦）。但是，在其這一時期底著作中，即已有了好多漏洞和放棄馬克思主義的地方（如關於辯證法、關於無產階級專政的問題、對馬哲學的調和態度等）。在其走向改組之道路一著中，對於歌司一九〇五年革命的估計，一般說來，還表現了馬克思主義的觀點，但是，從這個時候起，機會主義的「中派」的趨勢（考茨基的這種趨勢，始終是很嚴重的）；在其一切政治的理論的活動中便逐漸佔了顯著的優勢。他成了西「中派」底最有名的代表，而所謂「中派」者，就是機會主義的變種之一。在帝國主義大戰時期，他最後與馬克思主義決裂，用國際主義的辭句掩蔽自

已立場的真正社會沙文主義。他是德國「獨立社會民主黨」創立人之一，後來成了該黨的右翼。俄國十月革命以後，反對蘇維埃制度，堅持所謂「純粹」的民主制度和國會主義。在德國十一月革命後，任愛伯格、謝德曼第一次政府的外交部副部長，在任內實行爲協約國製股服務的政策，竭力阻止與蘇維埃俄國恢復關係。在伯恩會議上，以最贊成的方式反對蘇維埃俄國。第二半國際創立人之一，一九二二年，贊助它回到第二國際的隊伍內。在其晚年的著作中，尤其是在兩卷本的唯物史觀（一九二七年）一著中，對於馬克思主義之教實，達到極端地步。他是蘇聯最兇惡的敵人之一，公開宣傳反蘇戰爭和武裝干涉。可參看列寧的無產階級革命與教廷考茨基一書。——（見正文第八頁）

(二) 施威爾（生於一八八二年）奧國社會民主黨人，第一次世界大戰前爲該黨左翼，鬥爭雜誌編輯，所謂「奧地利馬克思主義學派」之有名頭子。著有許多關於工人運動、哲學及民族問題的小冊子。在其民族問題與社會民主黨一著中，主張小資產階級的「民族文化自治」的理論。在帝國主義大戰期間，爲考茨基主義者；一九一四年爲俄國俘虜，拘留於西伯利亞，後由克倫斯基政府依彼得堡蘇維埃的要求，從該地釋放。在其短期停留於彼得堡期間，贊成孟什維克國際主義派底立場。在奧國一九一八年十一月革命後，爲社會民主黨人倫勃爾聯合政府底外交部長（倫勃爾曾協助協約國封鎖匈牙利蘇維埃共和國）。一九二〇年爲第二半國際組織者之一。反對第三國際，著了幾本反對馬克思主義和蘇維埃制度的書，如世界革命（一九一九年）、布爾什維主義與社會民主黨（一九二〇年）、蘇維埃俄羅斯的新方針（一九二一年）。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二十二日被追不得已而公開承認：『在蘇聯有經濟政策底基礎上面，正在進行着社會主義成分與資本主義成分的鬥爭，這一鬥爭可說有社會主義勝利之希望』；但同時却說：聯共正在使資本主義復辟。一九二七年七月他領導奧國社會民

主張，利用該黨的影響，以擴張維也納工人底起義。現爲第二國際執行委員。——（見正文第六頁）

- 〔三〕阿得列爾（生於一八七九年）奧國社會民主黨人，父爲維克多·阿得列爾。一九〇七——一九一二年爲瑞士蘇立文大學理論物理學助教，同時兼任瑞士社會民主黨機關報人民權利主筆，以後爲奧國社會民主黨書記。帝國主義大戰時，採取和平主義立場。因羣衆的工人運動底低落而感到失望，於一九一六年十月二十二日刺死奧國總理新杜克伯爵，以是被判死刑，以作苦工十八年代死。一九一八年奧國革命後出獄，而出反對俄國十月革命。同時，他竭力消滅日益發展的奧國無產階級革命。一九二〇年企圖成立「中派」的第二半國際。一九二二年，根據他的提議，此第二半國際與復辟的第二國際合併，他任國際社會主義局主席。「左」的社會民主黨是以革命詞句掩蔽社會民主黨政策底官僚階級的實質，而阿得列爾正是這種「左」的社會民主黨底代表者。在哲學上，他是屬於馬赫主義者。——（見正文第八頁）

〔四〕這本小冊子的著者是奧托·鮑威爾。——（見正文第九頁）

- 〔五〕火星報是列寧在一九〇〇年來創辦的第一個全俄革命馬克思主義者機關報，在國外出版而秘密散佈於俄國各地。一九〇〇至一九〇三年間的列寧火星報起了巨大的歷史作用，造成了創立俄國無產階級獨立政黨的基礎。一九〇三年十一月，即在俄國社會民主黨第二次代表大會閉會後不久，孟什維克把火星報奪入自己掌握，而將其變成爲自己派別組織的機關報，用以進行反對布爾什維克，反對第二次黨代表大會決議的鬥爭。於是孟什維克所把持的火星報便被稱呼爲「新」火星報，以別於列寧所主編的革命的「舊」火星報。——（見正文第九頁）

〔六〕連拿慘案是指一九一二年四月四日（公曆十七日）沙皇軍隊槍殺連拿金銀（西伯利亞）內舉行罷工反對官方殘

酷剝削的工人一事而言。俄國各地工人用暴衆政治罷工和示威運動回答了這次慘案。——（見正文第十七頁）

〔七〕第四屆國家杜馬中的布爾什維克代表團因宣傳反對帝國主義戰爭，一九一五年被以「叛國」罪名流放西伯利亞。——（見正文第十七頁）

〔八〕龍格（生於一八七六年）法國社會黨黨員，律師，在帝國主義大戰幾年間，採取修正主義立場，並且始終投票贊成軍事公債。Lebellet。報的創辦人和本筆，該黨內部有派與首領，在一九一八年斯特朗拉斯基大會上，該黨多數採取龍格立場，而龍格遂成了人道派與思想家和編輯。十月革命後，在黨中左傾情緒壓力之下，反對武裝干涉蘇維埃俄羅斯，贊成無產階級專政。一九一九至一九二〇年，為「恢復國際委員會」主要活動者之一。在一九二〇年國際大會後（在該大會上共產黨人獲得勝利），與他的同道者一同退出黨，以後依附於維也納第二個國際；再後，又回到第二個國際。列寧對於龍格的批評，可看政治論綱簡評一文（全卷二十五卷，三十一至三十九頁）。——（見正文第十八頁）

〔九〕費邊派 這就是所謂費邊社的社員，該社以羅馬的名將費邊·匡克塔托爾（匡克塔托爾是拉丁語，意義就是做事遲性的人）底名字命名，於一八八四年在英國成立。該社成立的用意，就是要用和平的辦法來宣傳社會主義，而與馬克思主義的社會民主聯合會相抗衡。該社正式宣佈的宗旨，就是要用民上的精神來修改英國的憲法，並宣傳用社會主義的方法組織生產。該社不放棄政治鬥爭，不拒絕參加國會選舉，同時它却否認階級鬥爭，宣傳階級合作，不承認社會革命是不可避免的。——（見正文第十八頁）

〔一〇〕屠拉博（生於一八五七年）意大利改良派社會主義者，就其所受教育講，為法學家、著作家。從一八九二年起，為意大利社會黨領導人之一。一八九八年，因參加所謂「飢民騷動」，被判處十二年徒刑。但過了一

年，被政府釋放，並建議使他作議員。在帝國主義戰爭開始時，他反對意大利參戰；在意大利參戰以後，則贊助以威爾遜、表爲精神的妥協派的「和平」；在大戰之後，在社會黨大會上，領導右的改革派，反對無產階級專政及與共產國際接近；在一九二二年分裂之後，成爲統一社會黨的首領。（見正文第十八頁）

〔二〕謝德曼（生於一八六五年）德國社會民主黨人，青年時代爲排字工人。一九〇三年，被選爲國會議員，不久，即在國會中佔據顯要地位，爲伯爾施密特合作者。一九一二年，被選爲德國社會民主黨中央委員；同年，在社會民主黨於國會選舉中大勝利以後，爲黨國主義陣委員和國會副議長。在伯爾施密特以後，與愛伯特同爲德國社會民主黨的主要領導人。在帝國主義戰爭年間，該黨的一切救濟活動，都是在他領導之下進行的。在德國一九一八年十一月革命之前，企圖挽救君主政體，加入巴登斯基親王內閣。在革命以後，當選入「人民代表委員會」——德國社會主義共和國臨時政府。曾用一切方法，窺覷日益開展的無產階級革命運動。（見正文第十九頁）

〔三〕諾斯克（生於一八六八年）德國右派社會民主黨人，木工；長久在職工會中工作，佔據領導職位。一八九七至一九〇二年，任哥尼斯堡、利姆尼希及布蘭登堡等地社會民主黨報紙的主筆。一九〇六年，當選爲國會議員。尚在帝國主義大戰之前，即保護德國資產階級殖民地政策。在大戰年間，依附於謝德曼並立場，唯與社會民主黨大多數黨員一同支持政府，投票贊成軍事公債。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壓服基爾海員起義，此後，被委爲基爾總督。隨着革命運動高加強，諾斯克以殘酷鎮壓海員有功，被召至柏林，加入「人民代表委員會」。他依欽反革命的軍人——雷特維茨等，殘酷地壓服了一九一九年柏林工人的一月起義。任謝德曼內閣國防部長時，在保皇派軍官幫助之下，並用大批恐怖的手段，壓服了革命的工人運動。

德國資產階級利用他作爲緩慢日益發展的無產階級革命之工具，並在他協助之下，準備了卡普「行動」之基礎，卡普暴動，才結束了他的部長野心。——（見正文第十九頁）

- 〔一三〕希法亭（生於一八七八年）德國社會民主黨首領之一，所謂「奧地利馬克思主義」底有名的理論家和代表者。一九〇六年旅居德國，在這裏積極參加社會民主黨黨校之領導工作，在德國社會民主黨理論刊物新時代上合作，並編輯新派報（*Neue Zeit*）（一九〇七——一九一五年）。一九一〇年發表其主要著作「財政資本論」，其中論調和馬克思主義與機會主義。不論何時，總接近於考茨基，在第一次帝國主義大戰期間爲「中派」。一九一七年加入德國獨立社會民主黨，爲其中中央刊物自由編輯和中央委員。爲該黨底資產階級的改良主義政策之主要代表者。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德國革命後，爲政府「社會主義化委員會」委員。一九一九——一九二〇年反對獨立派加入共產國際。一九二三年爲斯塔特萊曼聯合內閣財政部長；一九二八——一九二九年爲社會民主黨人總聯合內閣財政部長。在社會民主黨基爾大會上（一九二七年）辯護「有組織的資本主義」理論。現在爲社會法西斯主義思想家之一。——（見正文第十九頁）

- 〔一四〕哈特爾（生於一八七二年）奧國社會民主黨修正主義底有名代表者。在其關於民族問題的著作中，關於小資產階級的「民族文化自衛論」作了最徹的解釋。在帝國主義戰爭期間，爲顯明的社會國防派。在一九一八年美國革命以後，任奧地利共和國首任總理兼外交部長（一九一九——一九二〇年）。反對無產階級革命與無產階級專政，堅持與資產階級的階級合作。從一九二〇年起，爲國民會議議員。——（見正文第十九頁）
- 〔一五〕阿烏斯鐵爾里茨（一八六二——一九三一年）奧國社會民主黨首領之一，屬於該黨右翼，國會極右派議員，該黨中央機關報「人民日報」編輯。在帝國主義大戰時，曾採取顯明的沙文主義（極端侵略性的國家主義）的立

勇。——（見正文第十九頁）

〔二六〕普列漢諾夫（一八五六—一九一八年）列寧以前俄國馬克思主義或基人與最大的代表者。起初參加「土地與意志」黨，在一八七九年該黨分裂以後，成爲「黑分社」首領。一八八三年，流亡國外，脫離民粹主義，與阿克塞爾羅德、查赫里奇等，成立了「同頭」的一個社會民主組織，分辯解放黨。在九十年代，跟民粹主義、伯恩施坦主義及英在改選上場上的反映——經濟主義，作了積極的鬥爭。在九十年代，成了火星報與曙光報編輯之一，曾受兩種黨委託，起草革命草案，這個草案受到列和方面的積極批評。在普列漢諾夫修正以後，才作爲火星報黨原則和理論部分基礎（其土地部分主要爲列寧所寫的），這個草案，經過小小的改變，被俄國社會民主黨第二次大會所通過。在一九〇三年該黨分裂以後，與一個時期，依附於布爾什維克，後來又依附於孟什維克，但是經過若干時期，在組織上脫離他們，但在思想上始終是接近於孟什維克。自取消土黨發生後，在反對它的鬥爭中，不久又與孟什維克接近。在帝國主義戰爭期間，做了極右的國防派（「號召」）的首領；在二月革命以後，仍繼續這條路線（「統一」），同時堅決主張擁護臨時政府。在一九一七年七月廿日以後，採取了完全反革命的立場，堅持「俄的政權」之思想。仇視十月革命。列寧曾對普列漢諾夫的道理和哲學著作評價很高，但同時指出了他的一系列的重大錯誤（例如承認衆形論，對辯證法的本質、馬克思主義國家論之不正確了解等）。——（見正文第二三頁）

〔二七〕列寧是指的普列漢諾夫所著的白色恐怖一文，該論文發表於一九〇三年第四十八期火星報上。普列漢諾夫在這篇論文中關於法國大革命底恐怖寫道：「法國大革命底恐怖更加厲害的恐怖，在歷史上是沒有的，法國大革命底恐怖把真正的金剛力士抬出歷史舞台，它好像「天上的雷爾風暴」一樣光臨法國。它無情

地破壞了「舊制度」裏一切殘餘。然而這種恐怖是什麼呢？它是什麼時候開始的？它的巨大力量是由什麼地方得來的呢？主張恐怖的人們底策略究竟是什麼呢？據馬魯賴止權的意見，恐怖開始於一七八九年七月十四日打破巴士底獄的時候。它的力量乃是人民革命運動底力量，主張恐怖的人們底策略的主要特點，就是無論如何總要設法維持和加強拿破崙革命自動精神。這種恐怖，並不是由於封禁選舉的民力量發生一失擊一心理所引起的，而是相反的：是由毫不動搖的，相信這種力量的信念所引起的。

……恐怖的代表，乃是法國人民反對歐洲革命聯合力量而進行的英勇戰鬥中的領導者。這種恐怖的歷史，對於俄國的革命者，是異常值得學習的。然而它之所以值得學習，正因為它不斷向我們說：必須準備我們俄國的人民去打被我們全俄各地的巴士底獄。」（見普列漢諾夫文集第十二卷第四四九至四五〇頁）——（見正文第三三頁）

〔一八〕伯恩施坦（生於一八五〇年）德國社會民主黨人，為該黨非法的中央機關報社會民主黨人編輯。九十年代中期，在該黨理論刊物時代上常發表論文，企圖修改革命的馬克思主義之哲學的、經濟的、政治的基礎，而代以調和階級矛盾的理論，否認社會主義革命。當時德國社會民主黨底領導人，雖有指斥，但是這種批評很不够，仍讓他在黨內保留地位，宣傳他的觀點。在伯恩施坦觀點出現以後，列寧當即予以澈底的抨擊（可參看全集第二卷四七三——四八六頁俄國社會民主黨民族抗議一文）。在帝國主義大戰時，為社會和平主義者。現為第二國際底首領之一。其觀點在德國社會民主黨內完全獲得了勝利，這從一九二五年所通過的新黨綱上，即可看出來。——（見正文第三三頁）

〔一九〕列寧是普列漢諾夫著的、發在一九〇一年第二——三期早晨雜誌上的（對東德或者是伯恩施

坦先生底精神遺囑 (Cant's 的發音與康德同，字義是口是心非——譯者註) 這篇論文上的下列一段話：「伯恩斯坦先生的見解中，現在只剩下社會主義底很少的痕跡。實際上他接近於主義「社會改良」的小資產階級分子，比較近於革命的社會民主黨多得。然而他依然做一個「同志」，人們並沒有把它清洗出黨。」

(見普列漢諾夫文集第十一卷第六十三頁)——(見正文第二三頁)

(二〇) 列金 (一八二八——一九二〇年) 德國職工運動底活動者，最右的社會民主黨人之一，修正主義者，紙張是金屬幣施工。一八九〇年，當選為德國工會總委員會主席，從一九〇三年起，為國際職工會聯合會秘書，從一九一三年起，為該會主席。在帝國主義大戰期間，為極端的社會沙文主義者，利用自己的職信，使職工會服從軍閥的利益。一九一九年，為國民大會底委員。——(見正文第二三頁)

(二一) 斯巴達克黨 是秘密的組織，帝國主義戰爭開始時，以李卜克內西為首的德國左派建立這個組織，目的在於進行反帝國主義鬥爭的革命鼓動。該團體曾開展真正革命的反抗鼓動，然而它却不能擺脫中派底影響，它看不見與各種機會主義者有分裂之必要，它依然留在社會民主黨底範圍以內。一九一六年「獨立黨人」(加河捷、列選布爾)與社會沙文主義的、正式的社會民主黨分裂以後，「斯巴達克黨」曾加入德國獨立社會民主黨，同時却保留自己的組織，依然為一個特別的團體。在德國十一月革命(一九一八年)以及社會民主黨人——諾德曼派和獨立黨人組織了政府以後，「斯巴達克黨」才與獨立黨人斷絕關係，到了那年十二月，該黨宣佈取消，而組織德國共產黨。——(見正文第二三頁)

(二二) 萊得布爾 (生於一八五〇年) 德國社會民主黨人。在帝國主義大戰期間，採取「中派」立場，曾出席齊美瓦爾德會議，堅決反對「齊美瓦爾德左派」自「獨立黨」與德國社會民主黨分裂後，為該黨首領之一。在一九

一九一九年一月柏林工人起義時期，與李卜克內西和首德同爲柏林革命委員會委員，但他反對無產階級專政，博羅所譯「民主」。自共產黨人在加勒大會（一九二〇年）勝利以後，與「獨立派」在一起，但是，自「獨立派」與第二國際底社會民主黨人聯合以後，則拒絕跟從他們，而保持自己的小團體之存在。（見正文第二四頁）

(二二) 克里新平（生於一八七五年）德國社會民主黨人。在社會民主黨分裂（一八一六年）以後，爲德國獨立社會民主黨著名的黨員和領導人。一九二〇年夏季，在共產國際第二次大會上，遂行關於「獨立派」加入第三國際的談判，但是回到德國以後，却拒絕聯合共產國際。一九二二年與獨立社會民主黨的殘餘部分又回到德國社會民主黨裏。（見正文第二四頁）

(二三) 伯爾甫（一八四〇——一九一三年）魯維工人出身。在V·李卜克內西影響之下，於一八六五年加入第一國際，而成爲馬克思與恩格斯的。一八六九年和李卜克內西成立社會民主黨，一八七五年該黨與拉薩爾派合併，而成爲統一的德國社會主義工黨，以後改名爲德國社會民主黨。多次當選爲國會社會民主黨議員。一八七二年與李卜克內西同被判兩年徒刑，拘禁於萊赫。後當局放逐和拘禁數次之多。爲黨的大會之經常參加者。在國際無產階級運動上起有顯著的作用。在理論上，常自認爲馬、恩的學生。屬於黨的左翼，常常猛烈抨擊黨內和國際上的伯恩施坦主義和機會主義。晚年採取「中派」立場。著有好多書、小冊子及講演，流行頗廣。——（見正文第二四頁）

(二四) 布列斯特和約是一九一八年三月帝國主義德國及其盟邦奧匈帝國、保加利亞和土耳其強迫當時尚未建國的蘇維埃共和國簽訂的投降條約。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威爾遜國領事復後，蘇俄政府便把這個條約宣佈廢除了。（見正文第二四頁）

(二六)拉狄克(K. Radok, 生於一八八三年) 加里西亞人。嗜職在布爾什維克隊伍內的奸細。從一九〇一年起，在加里西亞社會民主黨中工作；自一九〇四——一九〇八年，在波蘭社會民主黨內工作；此後赴德國，為德國社會民主黨左翼。一九一七年十月，赴俄國，加入布爾什維克黨。據一九三七年蘇聯叛國案審判所揭露的材料，一九一八年與喀威奸細分子布哈林在一起，號稱所謂「左派共產黨人」，藉以反對布列斯得和約，就圖謀破壞蘇維埃政權，殺害列寧和斯大林；從一九二四年起，加入托季反對派，並為該派領導人之一，積極反對聯共領導。

一九二七年聯共第十五次大會將其開除；一九二九年承認錯誤，恢復黨籍。從一九三一年起，任蘇聯政府機關報消息編輯委員，但暗中在托、布反革命聯盟領導之下，為了反對聯共領導和蘇維埃政權，與帝國主義國家偵探機關勾結，出賣蘇聯國家秘密，積極進行暗害和破壞活動，並力謀帝國主義者侵略蘇聯，企圖在戰爭中使紅軍失敗，進而奪取蘇維埃政權，恢復資本主義制度。一九三七年蘇聯法庭判處徒刑八年。——(見正文第二六頁)

(二七)布哈林(一八八八——一九三七年) 據一九三七年蘇聯叛國案審判所揭露的材料，在十月革命最初幾天起，他就陰謀反對列寧、反對黨、反對蘇維埃國家。一九一八年初，自稱為「左派共產主義者」，竭力反對布列斯得和約，主張繼續戰爭，圖謀以此顛送年輕的蘇維埃政權；一九一八年春，陰謀反對列寧，並勾結「左派」社會革命黨人，圖謀逮捕和殺害列寧、斯大林和斯維爾德洛夫；一九一八年夏季，主謀槍斃列寧，使列寧受傷；一九二二年，為了從內部動搖和推諉列寧的領導，故意使黨內意見分歧達於尖銳；在列寧臥病和逝世以後，積極企圖推翻聯共的領導。一九二八——一九二九年反對聯共全國工業化和農業集體化

的總路線；以後爲了反對聯共領導與蘇維埃政權，與反革命的托季陽圖攜手，在蘇聯社會主義建設中，極端進行暗害、軍事破壞、爆炸工作；殺害基羅夫、明仁斯基、奎只舍夫、高爾基；還企圖殺害人民所愛戴的大批黨政領袖；並與帝國主義國家偵探機關勾結，出賣蘇聯國家秘密，以間諜消息供給外國偵探機關；努力執行帝國主義國家偵探機關的意志，力謀破壞蘇聯共和蘇聯，毀壞國防，破壞建設，協助外國武裝干涉，準備使紅軍遭受失敗，分裂蘇聯；把蘇聯遠東沿海割割給日本，把蘇維埃白俄羅斯割給波蘭，把蘇維埃烏克蘭割給德國，消滅蘇聯社會主義制度，使資本主義制度復辟。因罪大惡極，蘇聯法庭於一九三七年判決槍斃。——（見正文第二六頁）

〔二八〕蘭斯白雷（生於一八五九年）有名的英國政治家，工黨黨員，下院議員。一九一九至一九二〇年做市長。爲社會主義每日快報（"Daily Herald"）創辦人和編輯之一。爲了考察俄國工人底革命勝利，曾兩次訪問蘇維埃俄羅斯（一九二〇年和一九二六年）。在每日快報和工人週刊（"Janistry's Labour Weekly"）上，對於俄國革命底事件，常作同情的解釋。——（見正文第二七頁）

〔二九〕倫諾德爾（生於一八七一年）法國社會黨首領之一，新聞記者。在佐列斯被告以後，爲人道報編輯，把該報變爲社會黨國主義和反對國際主義底機關報。在一九二〇年該黨臨時大會上，爲少數派，與共同進者退出大會，而與一部分「中派」（龍格）保持機會主義的法國社會黨，今日該黨已經滾到社會法蘭西主義方面去了。爲共產主義和蘇聯底最顯明的敵人。——（見正文第二七頁）

〔三〇〕工黨分子乃是英國工黨底黨員，該黨成立於一九〇六年，它在自己的隊伍中包括工聯底會員以及其他工人組織底會員，它的目的，主要是國會鬥爭和進行選舉運動。在第二國際中，工黨是極右派。——（見正文第二七頁）

【三】克倫斯基（生於一八八一年）俄國二月革命中小資產階級首領之一；律師。因在政治案件中充任辯護師而

著名；從一九一二年起為國會議員，在這裏加入勞動黨派。從帝國主義戰爭開始起，為社會黨國派。在二月革命後，加入「社會革命黨」；曾任彼得格勒蘇維埃副主席，違反該蘇維埃執行委員會不許作臨時政府部長的決定，竟加入臨時政府為司法部長。在顧赤考夫辭職後，任海陸軍部長，依照協約國的要求，調動俄軍於六月進攻德軍，但結果完全失敗。在彼得格勒蘇維埃階級七月運動被壓服以後，曾任迅速更換的幾次聯合內閣底總理。在柯爾尼諾夫事變以後，曾任總理和最高總司令。他以國家元首資格，實行妥協政策，而遭到反革命和波那帕特主義方面。一九一七年十月間，他企圖依款前線，組織向彼得格勒的進軍，但結果被彼得格勒的工人赤衛隊所擊敗。十月革命以後，逃至國外，進行積極的反蘇聯活動。——（見正文第三〇頁）

【三二】高爾察克（一八七三——一九二〇）帝俄海軍將官；十月革命後為西伯利亞革命政府之一的頭子。帝國

主義大戰時（從一九一六年起）為黑海海軍總司令。二月革命以後，被迫去職，逃至國外。十月革命以後，一九一八年，接受英人和俄國反革命者底提議，到哈爾濱，組織反革命的白衛軍。秋季到奧姆斯克，由「社會革命黨」內閣委為反革命的游擊部長。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十八日，在反革命的軍閥、大資產階級及英人支持之下，在奧姆斯克舉行政變，將「社會革命黨」的內閣閣員逮捕，宣佈自己為「俄羅斯最高統治者」。是年十二月，在烏發，逮捕了「立憲會議委員會」的委員，並在英法政府援助之下，開始了反對蘇維埃政權的武裝鬥爭。其綱領是用軍事獨裁和肉體消滅工人階級的辦法，使君主政體復辟。為了達到這一目的，不惜把版圖變為帝國主義殖民地。但是英勇的紅軍和革命的游擊戰，終於消滅了他。他本人被俘虜。一九二〇年二月，根據伊爾庫茨基革命委員會的決定，把他及其末了一個總理茂別拉也夫槍斃了。——（見正文第三〇頁）

【三三】鄧尼金（生於一八七二年）帝俄軍官，在蘇聯十月革命後內戰時，爲反革命的白衛軍頭子之一。一九一七年，依索富格爾哥薩克和英國的財政軍事援助，聚集幫助柯爾尼洛夫。十月革命以後，逃至頓河，參加反蘇維埃政權的戰爭，在一九一八年柯爾尼洛夫落台以後，爲南俄反革命的白衛軍總司令。在他的活動中，企圖依據於俄國社會底「活的力量」。爲了這一目的，根據他的提議，在總司令之下，設立「特別會議」，其參加者，除極端的保皇黨之外，還有立憲民主黨人。但是「特別會議」從其成立之日起，就暴露了其內部的犬儒態和毫無生氣。他並企圖用「土地改革」的法法，把農民吸引到自己方面來，但亦未成功。他被紅軍擊敗後，於一九二〇年三月間，將總司令名義潛位於當時還盤據在克里米亞的反革命的弗蘭格爾，此後他本人逃至英國。——（見正文第三頁）

【三四】萊因河法蘭克地方出版的德國共產黨（斯巴達克黨）之分報（Die Spatung）Ger K. P. D. U. Spatung Kochand Frankfurt a. W.）這本小冊子，是「左派」共產黨人的團體所辦的，其中所論述的要點，後來就成爲德國共產黨主義工廠改組的基礎。一九一九年一月柏林工人就舉義很厲害地被鎮壓下去，這就使得一部分德國共產黨人主張審查黨的策略原則和組織原則；不久以後，還在一九一九年春季使德共產黨底毀壞就已表現出來了。新派底人（什列迭爾、永格、威德列爾）認爲無產階級失敗的主要原因，第一就是工人階級分散在好些政黨之內；第二，就是過於重視公開的鬥爭方法，它們以爲實際上這種方法使擊破的革命自動精神降臨。「左派」共產黨人，反對黨底策略路線和組織路線，而主張組織全國工人聯合會（Allgemeine Arbeiterunion），來統一所有上列直接爭取無產階級專政和蘇維埃制度的革命工人；「左派」共產黨人堅持「直接行動」，要求共產黨人拒絕參加反動工會中的工作。一九一九年十月在甘德里別爾格的黨代

表大會上，「左派」舉手反對德共中央統帥選別爾格的提議，他們被剝奪了繼續參加黨代表大會工作的權利，他被迫退出黨。在一九二〇年四月四日反對派底柏林代表大會上（該大會代表了幾千個反對派分子），「左派」組織了新黨，叫做德國共產主義工黨，開始與德國統一的共產黨進行持久的鬥爭，使革命無產階級底隊伍大形潰散。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在「致德國共產黨黨員一封公開的信」（一九二〇年六月十四日第十一期共產國際雜誌）上指出德國共產主義工黨底綱領式的宣言、策略上和組織上的原則，「顯然離開共產主義……而走到小資產階級的、無政府主義的政策方面去」。德國共產主義工黨與羣衆的工人運動沒有聯系，它的綱領上和策略上的原則乃是馬克思主義觀點和無政府工團主義觀點的混合物，所以不明確和不固定，因為這個緣故，就在共產主義工黨裏，有了產生新的、顯然表示「民族主義」的右傾反對派之餘地。在該黨內部，成了而且發育了右的派別，即所謂「漢堡派」(「Hamburger Richtung」)。(見正文第三〇頁)

〔三五〕本書俄文版第一版此句本爲「荷蘭論壇派」。與俄文版同時出版的有英、德、法文版，列寧在他專門寫給英文版的增補中，指出必須把他在俄文版上所用的「荷蘭論壇派」這一個名詞，改爲「荷蘭共產黨底一些黨員」。故這裏俄文版原文已經刪列寧的這一指示而加以改正了。

「論壇派」於一九二〇年加入共產國際以後，就建立了荷蘭共產黨，後來由荷蘭共產黨中產生了「左派共產黨員」。不久之後，左派的領袖——洛明德、郭里斯特與郭爾斯爾離開了政治活動。……（見正文第三三頁）

〔三六〕芬芬別爾格（生於一八七二年）漢堡社會民主黨人，以後加入共產黨。在一九一九年十月德國共產黨海德

變大會上，與沃里夫標本和呂勃頓專無政府工團主義的「左派共產黨人」。在共產黨分裂以後，被開除黨籍。參加過成立「共產主義黨」的領導工作。一九二〇年初，與沃里夫標本組織所謂「漢堡派」，其目的是在把「一切民族分子」連資產階級在內，吸引到共產黨人方面來，以反對法國。他的所謂「民族布爾什維主義」並沒有成功，以便他就脫離了工人運動。——（見正文三五頁）

〔三七〕沃里夫標本 德國「左派共產主義者」：一九一九年十月與勞芬別爾格及奧托·魯爾，在共產黨分裂大會上同代表「左」翼，被開除黨籍。在共產黨分裂後，參加組織「共產主義黨」的事情。一九二〇年初，以所謂「民族布爾什維主義」理論出現，號召一切「民族分子」連資產階級在內，使「布爾什維克」，以與法國作鬥爭。——（見正文三五頁）

〔三八〕霍爾森爾（安頓·雷涅庫克底筆名） 荷蘭左派社會主義者，氣象學教授，一九〇七年他和其同道者瓦萊庫普、羅爾克斯特等被機會主義者開除黨籍，一九〇九年，建立了左派社會主義的報紙論壇報。自共產黨分裂成立後，加入共產國際。一九二〇年，在共產國際第二次大會以前，在被得格勃出廠了一本小冊子：世界革命的發展與共產國際策略，發揮了「極左派」的政治主張。共產國際第二次大會宣斥了「極左派」底立場；在大會以後，他在維也納又用自己的真名字出版了那個小冊子。在該小冊子補充中，他污蔑共產國際第二次大會為機會主義，唯拒絕加速革命以奪取非共產主義草案。現在他已經離開了工人運動。——（見正文三五頁）

〔三九〕什列透爾（生於一八五五年） 德國社會民主黨人，一九一九年加入共產黨。一九二〇年，屬於「左派共產黨」，該派構成所謂「漢堡派」，其信條號召「一切民族分子」，包括資產階級在內，在「民族布爾什維

主義」旗幟之下，與法國鬥爭。——（見正文第三五頁）

〔四〕文選附 一九二〇年加入「左派共產黨」，為共產主義黨（創立）。「決裂派」的思想是領導人之

一，該派在工人中間沒有什麼影響，不久即消聲匿跡了。——（見正文第三五頁）

〔四〕*Kommunistische Arbeiter-Zeitung*（共產主義工人報）乃是德國共產主義黨的機關報。該報自一九

一九年起開始出版，至一九二七年停版，開始時是日刊，後來改為旬刊出版兩次。該報擁護黨直接行動

的方法，激烈反對利用公開的鬥爭，例如反對共產黨員參加國會及加入工會。——（見正文第三五頁）

〔四二〕是指的「八九五年列寧在彼得堡創立的「為工人階級解放鬥爭協會」。該協會將各個零散的馬克思主義小

組織一為一個集中的組織，它是做國革命無產階級政黨的萌芽。——（見正文第三八頁）

〔四三〕馬林諾夫斯基（一八七六——一九一八年）俄國四屆國會莫斯科省工人黨事務議員，同時為警察廳密

偵員。他利用自己誘惑的才能，突出於其他成員中間。一九一八年夏季，根據華考夫斯（他與警察廳亦有

關係）的要求，不得不退出國會而出國。一九一八年，他回國被捕，被最高法院處刑槍決。——（見

正文第三八頁）

〔四四〕最後這一段話，由列寧建議，曾完全探入共產國際第三次世界代表大會所通過的關於組織問題的提綱，該

提綱是肯能與俄國黨起草的。——（見正文第三九頁）

〔四五〕羅科科（一八九九——一九二四年）葉卡切林洛斯拉夫省的最大地主。當第三和第四屆國會主席。二月

革命以後，為國會議員臨時委員會主席，克倫斯基時代大資產階級反動派積極組織者。十月革命以後，逃

往國外。——（見正文第三九頁）

〔四六〕根據聯共（布）歷來大會底統計，由一九一七年四月會議起至俄國共產黨（布）第九次代表大會止，黨員人數底變更如下：一九一七年俄國社會民主黨（布）底全俄四月會議，計八萬八千人；一九一七年七月俄國社會民主黨第六次代表大會，計十七萬七千人；一九一九年四月俄國共產黨（布）底第八次代表大會，計三十一萬四千人；一九二〇年四月俄國共產黨（布）第九次代表大會，計六十一萬一千人。——（見正文第四〇頁）

〔四七〕尤金尼奇（生於一八六二年）帝俄海軍官，十月革命以後，逃至芬蘭。一九一九年，爲反革命的「西北政府」（係英國人在愛沙尼亞所組織）的軍隊首領，兩次企圖奪取彼得堡（一九一九年五月十六日和十月十二日，至二十五日）。在第二次圖謀進攻彼得堡時，被紅軍所擊敗，率其殘部逃往愛沙尼亞，以後又逃至英國。

——（見正文第四〇頁）

〔四八〕葛培爾茲（Zornpfer）（一八五〇——一九二四年）美國捲煙工人。任美國勞動聯合會主席達四十年之久，該聯合會擁護享有特權的工人貴族之狹隘職業的利益，宣傳「階級利益之協和一致」，並猛烈反對無產階級中間的革命趨勢。在帝國主義大戰時，依靠於美國工人階級的右傾分子，積極支持威爾遜總統底政策。一九一九年參加巴黎和平會議工作，任國際勞工立法委員會主席。一九二二年充任華府會議美國代表團團員。主要對蘇實行孤立政策，積極反蘇。曾任「全國公民聯合會」——由資本、勞動及其他公民代表組成的團體，以有名的德克富翁貝根爲主席——副主席。他甚至認爲美國的職工運動都太左了。——（見正文第四六頁）

〔四九〕如沃（生於一八七六年）法國勞動總聯合會書記，無政府工團主義者。在帝國主義大戰時，爲顯明的社會黨

國選。一九一六年爲國際職工聯絡局（此局是爲了代替柏林國際秘密與面設立的）主任。一九一九年爲國際聯盟國際立法委員會主席。如沃曾促成了一九一九年七月二十二日法國說罷工的失敗。他是改良派的阿姆斯特丹國際黨首領之一。爲法國駐國際聯盟的代表。——（見正文第四六頁）

(五) 亨德森（一八六三——一九四一年）（即漢德森）英國職工運動和英國工黨有力首領之一，就職業請爲總工人。帝國主義大戰以前，實行與自由黨政府妥協之政策。自基爾哈爾斯滕去該黨主席職務（一九〇八年）以後，於兩年內曾佔據這個職位；後來於麥克唐納因其和平主義而放棄這個職位後，於一九一四——一九一七年再度担任此職。在帝國主義大戰之初，與哈爾斯滕一同簽署以第二國際英國分部名義告英國工人書，號召反對戰爭，但在英國參戰後，却採取社會沙文主義立場，進行徵募自願軍的運動。一九一五年爲第一次聯合內閣教育大臣，一九一六年爲路易·喬治戰時內閣不管部大臣。但一九一七年被迫辭職，因贊同在新托爾斯召集國際社會主義大會的思想，遂引起了英國湯姆·戴氏勝利」的資產階級的憤怒。在麥克唐納第一次內閣時（一九二四年）爲內務大臣，第二次內閣時（一九二九——一九三一年）爲外交大臣。在麥克唐納投入保守黨時，曾領導黨內舊有的「反對派」。一九三九年德國法西斯匪徒進攻波蘭，發動世界大戰前，爲英國駐德大使，力謀與德國締結特約安協。——（見正文第四六頁）

(五二) 麥爾基諾（一八八三——一九二五年）法國工團主義者及鋼鐵工人團體組織者，以他爲會員勞動介紹所底領導者。一九〇五年當選爲金屬工人聯合會秘書處委員，指導該聯合會達十八年之久。法國勞動總聯合會歷次大會底參加者。一九一五年，奧布龍龍同爲「國上義運動左翼底代表者，曾代表法人出席齊美瓦爾德會議，並與德國代表曾爲同簽署反戰宣言。回到法國以後，積極參加組織「恢復國際聯絡委員會」的工作。

一九一六年，在工團主義組織與勞動會聯合代表會議上，跟如沃·同發覺贊成歐戰的議案。一九一八年，轉至如沃方面，成了阿梅斯特特職工國際總聯合會考·薩維埃俄羅斯的敵人。（見正文第四六頁）

〔五二〕丹尼耳·德文昂（一八五二—一九一四年）美國社會黨底領袖，世界產業工人聯合會底創立人與領導人

二一，曾跟美國職工會議考·的機曾主義和普爾行爲作鬥爭。一九一二年，一九一五年爲國際社會主義局委員。在其文字工作中，發揮了「工業國家」組織的思想，在該社會的建設上給了無產階級職工組織以過分的意義，過高估計了工人政黨之作用和意義。（見正文第四七頁）

〔五三〕列寧是指的一八五二年九月二十四日恩格斯致馬克思的信，在這封信裏，恩格斯寫道：「工人們在過去所發生的一切事變之後，由於暫時的經濟繁榮，由於他們堅信『帝國底繁榮』，似乎已經完全『資產階級化了』」（請看馬恩書信，書。該書是由岡多拉特斯基翻譯、校訂和註釋的。一九三一年莫斯科和列寧格勒兩處印行的第四版第七頁、七〇—）（見正文第四八頁）

〔五四〕人民政治日報 是德奧共產黨底日報。一九一六年爲赫格龍特所創辦。一九二〇年該報主張必須進行無產階級的階級鬥爭，並進行了努力的鼓動，以反對參加瑞典政府的正式社會主義者（以勃朗寧爲首）所實行的讓步政策。（見正文第四八頁）

〔五五〕世界產業工會 International Workers of the World (I. W. W.) 是美國工人底革命組織。一九〇四年，當西部礦工聯合會底鬥爭正激烈的時候，產生了這個組織，以便與妥協的美國勞動聯合會底起來。這個組織到了一九〇九年才在組織上完全形成，它具有革命的工團主義的性質。世界產業工會底主要活動，就是多半在無產階級最落後和無組織的階層中組織罷工。在罷工的時候，這個組織用革命鬥爭底方

法來行動，與警察衝突的時候，就組織工人來自衛。一九二二與一九一三年間，世界產業工會職員實行了幾十次大罷工而得到大勝利。在大戰的時候，世界產業工會並沒有中止單業的罷工鬥爭，因此它的會員備受政府壓迫。十月革命以後，在美國成立共產黨以後，世界產業工會敬視美國共產黨員和激進埃政權。只是在共產國際執委向世界產業工會發表宣言以後，這個組織對共產黨所採取的態度才改變了性質，而只在一九二〇年甚至進行了談判，討論了世界產業工會執行委員會代表與統一共產黨代表是否可能召集共同會議的問題。——（見正文第五頁）

〔五六〕蘇巴托夫（一八六〇——一九一七年）蘇巴托夫主義即「警察社會主義」的鼓吹者和組織者。從一八八九年起為莫斯科時探局副局長，以後為正局長；曾在俄國好多城市（維爾諾、明斯克等）發展廣泛的好相活動。一九〇二年組織了會「莫斯科機器工廠工人互助會」、「彼得堡工廠工人互助會」，其目的是在使工人離開革命活動。一九〇三年辭職，以後由官廳放逐至烏拉第米爾。一九一五年在特列科夫又加入警察。一九一七年二月受槍斃。——（見正文第五頁）

〔五七〕此地是指的荷蘭、左派。共產黨人關於國會主義的提綱，該提綱登載在一九二二年二月第一期共產國際駐阿姆斯特丹臨時辦事處公報二（*Final item of the Provisional Bureau in Amsterdam of the Communist International*, No. 1 February 1922）。——（見正文第五三頁）

〔五八〕盧森堡（一八七一一一九一九年）德國社會民主黨左派領袖和德國共產黨創立人之一，德國、波蘭和俄國工人運動的參加者。著有許多關於經濟等問題的理論著作。生於波蘭，一八八九年流亡蘇立支，一八九三年參加波蘭王國社會民主黨，就成立工作。從一八九七年起，差不多從未中斷地在德國社會民主黨隊伍內

工作，自光輝地進行反對伯烈德地主義和米萊爾主義以後，在該黨內和第三國際內佔有顯著地位。一九〇四年，在伯烈德問題上，堅持孟什維克底觀點；後來才脫離了孟什維克。一九〇七年，在俄國社會民主黨倫敦大會上與布爾什維克在一起，出而反對孟什維克。是年秋季，在司徒加大會上，與列寧在一起，對於戰爭與議案提出了革命的馬克思主義的修正。在帝國主義大戰之前不久，出而反對考茨基和「中派」的其餘代表者，就專攻內左傾急。反對派，但並沒有提出與他們斷絕關係的問題。在布爾什維克與取消派的鬥爭中，採取調和主義，在許多原則問題上，支持孟什維克。從帝國主義大戰開始起，採取國際主義立場，但心在組織上沒有決心與社會民主黨脫離。在不多在全部大戰期間（從一九一五年二月起），處在獄中，在非法的勒巴達克通信上合作，提出「領導原則」——國際主義者底政治上張，這個政治主張，於一九一六年六月間，在「國際社」全體會議上通過。是年春季，在獄中，用尤尼烏斯的筆名，寫了一本社會民主黨的危機小冊子，其中指出了有成立第三國際的必要。在獄中所寫的俄國革命小冊子（一九一八年九月）中，也對於十月革命的估計上，犯了許多錯誤的論點，這些錯誤論點的大部分，以後都改正了。在德國一九一八年十一月革命以後，脫離社會民主黨，創辦和編輯報（"Köln Arbeiter"）雜誌。參加過德國共產黨成立大會的工作。在德國一九一九年一月起被監禁以後，為謝德曼政府所逮捕和槍殺。處決。對於全世界的工人運動有巨大的革命功績，但同時在哲學論與策略觀點上（「盧森堡主義」）犯了一系列的半孟什維克的錯誤。例如關於政黨作用，關於帝國主義，關於民族殖民地問題，關於農民問題，關於不平等革命問題，等等。——（見正文第五三頁）

（五九）李卜克內西（一八七一年十一月十九日—一九一九年）德國革命的工人運動底領袖和德國共產黨創立人之一；共產主義

青年運動底發起人。威廉·李卜克內西底兒子。從其政治活動底最初起，即依附於德國社會民主黨左翼。熱烈主張組織青年工人以進行反軍閥的宣傳。一九一七年同德則青年國際底發起人。是年，曾出版平民主義與反軍閥主義一書；因此，入獄一年半。在世界大戰宣佈以後，一九一四年八月三日，在社會民主黨與社會黨內發言，反對提督贊成軍事公債，但八月四日在黨的紀律壓力之下，與其他一切人一同投票贊成該軍事公債。在下一大表決中（一九一四年十二月二日），他是投票反對軍事公債底唯一議員。一九一五年着手組織「斯巴達克黨」，並以小叢書方式，出版非法的刊物，取名為斯巴達克黨。在被勸員以後，未能出席商業瓦爾德會議，但致函該會議，號召作堅決的階級鬥爭。一九一六年五月一號，在柏林散發反戰傳單，這次行動，曾博得為革命工人們進行示威，從此被捕，被判決做苦工四年半。一九一八年德國革命，才釋放了他。在俄國布爾什維克勝利以後，他雖處在獄中，但他是德國首先結在俄國革命方面的人們之一，他號召德國工人仿效俄國榜樣組織蘇維埃，而且在一九一八年十一月間，確實組織了蘇維埃。在一九一九年一月柏林工人起義期間，任革命委員會委員，領導運動；在革命委員會取消以後，被謝德曼政府所逮捕，與盧森堡同被反革命的德國軍人所殘害。在帝國主義大戰期間，李卜克內西的名字，成了社會主義革命的象徵和共產國際的符號，他是共產國際底思想上的創立人之一。（見正文第五三頁）

〔六〕狄慈根（一八一八——一八八八年）——鐵錫是皮匠，沒有住過學校，自學成爲工人哲學家，恩格斯底朋友。有一個時期曾旅居彼得堡。後來又到美國，在該地社會主義運動上起了巨大作用。在哲學上離開馬克思和恩格斯，而獨立地另外創造了一套觀點，其觀點與辯證唯物論的基本原則相近。其哲學著作有：人類頭腦工作之本質、哲學的條件、社會主義意識形態論。（見正文第六〇頁）

(六二) 列表此地是指的狀態極所著的哲學養成續和關於邏輯的信 (‘Idea Acquiritur de Philosophia und Kristallin Logik’) 書中下列一段話：『同時只須慎重其事，不要誇大區別，不要使二種區別過度，但不至於荒謬。』。(見正文第六二頁)

(六三) 赫施特(生於一八八四年) 瑞典左派社會黨底首領。在帝國主義戰爭年間，為革命的國際主義者，曾與瓦爾德會議底參加者，在該會議上加入『齊瓦瓦爾德左派』。一九一六年三月，在工人反戰大會上出席發言，此次被控叛國，判處三年苦役。從一九二二年起為共產黨人，無共產主義的。‘Ferdinand Tönnies’ 編輯：一九二四年，因機會主義(尤其其他堅持共產黨人可以信仰宗教)被開除出共產國際。現為第二國際底黨員，修正主義者在關丁文集裏出版人。……(見正文第六三頁)

(六四) 波爾迪加(生於一八八九年) 有名的意國共產黨人。王權陣。一九二一年參加社會主義運動。一九一四年曾出席在安科納所舉行的社會黨大會，堅持社會黨左翼底立場。同年組織鐵路罷工，以抗議當局對羅曼納和馬那哈兩地起義之殘酷鎮壓，因此被解職。帝國主義大戰時反對社會愛國主義者。一九一七年成立，不參加派『小組織』，以後該小組織與格羅斯派同為意國共產黨底核心(一九二一年)。一九一七年為他所辦的『社會主義青年團』刊『光輝』和『蘇維埃』日編輯。意國共產黨中央委員。在共產國際第二次大會上，為超左觀點底熱烈擁護者，堅決反對共產黨人之參加資產階級國會。一九二一年一月在意國社會黨大會上要求與改良派決裂。大會結局是社會黨分裂，另成立意國共產黨。一九二三年共產國際執委第三次擴大會議責斥其『抵制觀點』，以後他與共產國際之間，關於統一戰線策略、工人政府等問題又暴露了新的分歧。他企圖在意國共產黨內另成立小組織，但是這一企圖為共產國際執委和意國共產黨第三次大會所堅決指責。一

一九二七年法西斯政府將他逮捕，被逐至烏斯吉克島。——見正文第六四頁

〔六四〕即蘇維埃日報，爲一九二八年左派社會主義者——擁護第三國際的人在波阿城地方所創刊。——卡普是波爾

迪加。列寧是指的下列三篇論文：（一）意大利社會黨中共產主義的深淵派（"Profondismo" *Avantguardia*

Assemblea del Partito Socialista Italiano，見一九二二年一月十八日第三期蘇維埃日報）；

（二）列寧與深淵派（"Lenin e il Profondismo"，見一九二二年二月一日第四期蘇維埃日報）；（三）

錯誤（"M. Fallo"，見一九二二年二月一日第四期蘇維埃日報）。——（見正文第六四頁）

〔六五〕葛拉底（一八七二—一九二六年）意大利社會主義運動最有名代表者。意大利社會黨左翼——馬克思主

義派底組織者和領袖；從一九一五年起爲莫斯科中央機關報"*Avantguardia*"編輯。在帝國主義大戰期間，採取國

際主義的立場，積極參加成立美英兩國聯合會的工作。在共產國際第二次大會上，爲意大利代表團領袖，並

加入大會主席團，但半年以後，在意大利社會黨大會上，拒絕莫斯科條件（要求與改良派——杜拉

第、毛克連尼、特列佛斯等毫無保留的決裂）之一。全部中派都是附和葛拉底的。因此，共產國際執行委

員會將意大利社會黨從國際排除出去。格爾西、鐘拉利、波爾迪加等遂成立意大利共產黨，葛拉底與他的

同黨繼續與改良派在一起，但是，在下層工人和法西斯帝反革命運動壓力之下，他逐漸向左演進，於一九

二〇年加入意大利共產黨。——（見正文第六四頁）

〔六六〕"*Comunisti*"（共產主義雜誌）由兩星期出版一次，由索拉主編。一九一九年創辦。列寧此地是指

的下列兩篇論文：（一）社會黨在波洛尼亞所召集的大會（"Il Congresso Socialista di Bologna"，見

the "Maoistism" 見一九一九年十一月十五日第三期共產主義雜誌。——（見正文第六四頁）

〔六七〕民國報是德國社會民主黨台時中央機關報，在萊布齊地方出版，由威廉·李卜克內西主編，在一八七〇年至一八七六年間，恩格斯在民國報上做了許多論文，後來把這些論文搜集起來，出了一本小冊子。一九〇六年米知把這本小冊子譯成俄文出版，名為一八七一年至一八七五年的文集（斯米爾諾夫譯，譯文校訂）。一九一九年由北方書局出版。列寧所引論的是最近出版的本子。——（見正文第六六頁）

〔六八〕瓦爾提（一八四一—一九〇五年）法國社會主義者。青年時代即參加革命運動，而為勃朗斯基熱心擁護者之一。曾任巴黎公社國民教育委員與第一國際總委員會委員。第二國際時代，代表法國，參加第二國際國際社會主義局。在帝國主義戰爭爆發數日後，即投筆革命，而跑到保護祖國方面去了。——（見正文第六六頁）

〔六九〕恩得（Engels）（一八四一—一九二二年）有名的法國社會主義者。一八八一年與馬克思、恩格斯、拉拔格一同起草了法國社會黨綱領。積極跟無政府工團主義者和論管束主義者以及機會主義者、實行派、伯恩施坦派的流派作鬥爭。其猛烈反對伯恩施坦的與資產階級聯盟和妥協的政策。為反對社會黨黨員加加瓦、高雷、內閣（米萊爾）去，而進行的廣泛的革命運動，其功績亦屬於恩得。在法國聯合社會黨（在一九〇四年阿爾斯特外國聯大會後，恩得派與伯恩施坦聯合而組成的）內，恩得派為左翼，但逐漸演進而為「中派」方向。在帝國主義戰爭開始之初，顯明地首倡自己的革命歷史，屬於於「愛國主義」的情緒，成立了與資產階級的「神聖聯盟」，並加入資產階級的民族國防政府。——（見正文第六六頁）

〔七〇〕恩格斯在一八八六年十二月二十八日致維什威威英加的信中寫道：「我們的理論不是教條，而是革命進

程來解釋，這種過程引起了一整串密切聯系的、彼此追隨的現象。」（見馬恩書信一書。這本書由阿多拉特斯基翻譯、校訂和註釋。一九二一年莫斯科和列寧格勒兩處印行的。第四版第三五七頁）。（見正文第七一頁）

〔七〕契爾內舍夫斯基（一八二〇—一八八二年）「偉大的俄國學者和批評家，精巧地說明了資產階級經濟學底破壞（馬克思）教代俄國革命者底導師。經濟學家，以翻譯米勒經濟學原理聞名，用烏托邦社會主義的精神，對該書加以自己的註釋，並著有好多關於社會主義思想通俗化和批評一八六一年農民改革的著作。同時，他又是一個文學批評家，在現代人雜誌（他是該雜誌領導人之一）上，寫了許多光輝的論文（譬如果里時、列辛以及關於普希金的文章）。他認為俄國公社是社會主義社會制度底可能的萌芽。為俄國六十年代革命運動底領袖和七十八兩年代革命運動鼓勵者之一。一八六二年被捕，一直處在獄中和充軍中，幾乎到一八八九年為止，失掉了直接參加社會活動和著作活動的可能。對俄國社會思想的發展有巨大的影響。」（見正文第七一頁）

〔七〕列寧顯然是只憑自己的記憶來引證這一段文字的。契爾內舍夫斯基對於克里所著的致北奧合眾國總統的關於政治經濟問題的信一書之俄文譯本，做了「論評論」，他在評論上說：「歷史的道路，也不是涅瓦大街，這等條大路，有時經過卑下廢場的田野，有時經過泥濘卑濕的田野，有時經過窪地，有時經過最密的森林。誰要害怕墜下飛鳥，害怕毒箭射下，就不要從事社會的活動。」（列寧著契爾內舍夫斯基全集，一九一八年版，第八卷，第三七五—三八頁）（見正文第七一頁）

〔七〕阿克塞里羅德（一八五〇—一九二八年）第二國際底思想家和領導者之一，俄國孟什維克或頭子。於七十

年代參加民粹派運動，係附於暴徒巴爾察等。一八八三年與普列漢諾夫等在國外成立勞動解放社。一九〇〇年參加火星報編輯部。一九〇三年在俄國社會民主黨第二次大會上，爲少數派頭子之一，從此時起便成了布爾什維主義底極不可調和的敵人。一九〇五年革命失敗後，爲取消派頭子，堅持社會民主黨底活動須合法化，並須廢除秘密的黨的組織。仇視十月革命。在反布爾什維主義的鬥爭中，墮落到擁護資產階級民主基礎和自由主義政策的地步。爲第二國際國際社會主義委員會，贊成第二國際首領們對蘇維埃俄國新的仇視態度，主張有武裝干涉蘇聯之必要。（見正文第七二頁）

〔七四〕查蘇里奇（女）（一八五·一·一，一九一九年）起初是民粹派，以後成爲社會民主黨人；六十年代末開始革命活動；一八六九年被捕，小獄兩年，一八七五年被充軍。一八七八年因彼得堡總督格列波夫大肆專制政治壓迫文留波夫（受普列漢諾夫）而憤激，用手槍擊中格列波夫，格列波夫受重傷。被陪審裁判所釋放。一八八〇年流亡國外，與普列漢諾夫等一同成立勞動解放社，參加該社的文字活動，首次把馬克思的總部主要著作譯成俄文。後來非法地回到俄國，在一九〇〇年起，與列寧等一同編輯火星報。在一九〇三年分裂以後，便附於孟什維克；在一九〇五年革命失敗後反動時期，與取消派沉溺在一起。在帝國主義大戰時期爲社會沙文主義者。反對十月革命。（見正文第七二頁）

〔七五〕馬爾托夫（一八七三·一·一，一九二三年）孟什維主義底有名首領和政論家之一。於一八九五年開始革命活動，參加彼得堡工人階級解放鬥爭協會，火星報與曙光報編輯員。在俄國社會民主黨第二次大會上，爲少數派首領，從那時起，便成了孟什維主義底有名的思想家和政論家。一九〇六年被捕並驅逐至國外。俄國第二次國會選舉時，爲孟什維克小組黨領事，堅持與立憲民主黨聯盟。在一九〇五年革命失敗後反動時期，爲

取諸派首領之一，編輯該派的機關報社會民主黨人的呼聲。一九一三年末回至俄國，以工人日趨編輯的資格，領導社會民主黨右翼反對布爾什維克的鬥爭。在帝國主義大戰諸年間，歷居國外，採取「中派」立場，以革命對付護國其社會沙文主義。曾出席布魯塞爾總會議（中派）和巴黎總會議。俄國二月革命以後，經過德國回至俄國，成了官方孟什維主義的反對派，支持舊生活派，但是沒有脫離孟什維主義。在蘇維埃第二次代表大會上，堅持必須由一切社會主義政黨代表組織政府，在孟什維克和右派社會革命黨人退出以後，仍留下參加大會，但是不久，對於蘇維埃政權就採取了不可調和的仇視的態度。一九二〇年歸居柏林，在該地創辦和編輯孟什維克的中央機關報社會主義月刊，進行反蘇聯活動。——（見正文第七二頁）

〔七〕波特列索夫（巴斯達羅威爾）（生於一八六九年）孟什維主義首領之一。一九二〇年左軍期滿後，逃亡國外，與列寧一同參加火星報的組織。在一九二二年俄國社會民主黨第二次大會上，依附於孟什維克。在一九〇五年和在反對期間，曾領導孟什維主義中的右派。為取消主義處理論家之一。在帝國主義大戰諸年間，為社會黨國主義最公開的辯護人之一。一九一七年在進行瘋狂的反布爾什維克運動的實際階段的今日報上，起有領導的作用。十月革命以後，在國家檔案總局工作。自一九二六起，逃至國外，為孟什維主義的極右翼。積極反對蘇聯，為克倫斯基今日報同盟密切合作者和民主社會主義或改良的編輯。——（見正文第七二頁）

〔七七〕司徒盧威（生於一八七〇年）九十年代社會民主黨員，俄國社會民主黨黨章起草人。合法馬克思主義最有名的代表者。在一九〇〇年末到一九〇一年初，曾以「民主反對派」代表的資格，與火星報合作，但不久就與馬克思主義和社會民主黨最近脫離，而投入自由派陣營，成為立憲派「解放社」之首

領。爲立憲民主黨中央委員。(一九〇五年革命失敗後，遭到最反動的黑色百人團的國家主義方面。在十月革命後，蘇聯內戰期間，參加反革命的柯尼金政府；以後又做了白俄烏爾格爾政府次部長；再後，編輯白黨在布拉加出版的俄國思想雜誌，把右派立憲民主黨人和保皇黨都聯合在一起。從一九二五到一九二七年，編輯白黨在巴黎出版的正統保皇黨的復活日報。——見正文第七二頁）

(七七)此地所講的，是指一九〇一到一九〇二年火星報編輯部在雷漢地方與司徒盧威所代表的「民主反對派」底談判。談判內容，就是司徒盧威及其團體與革命的社會民主黨合作的條件。談判結果，根據司徒盧威所提出並爲火星派大多數違反列寧的意見所通過的條件，簽好協定，但在實際上，這種協定，並沒有實行。——見正文第七二頁）

(七七九)切爾諾夫(生於一八七三)社會革命黨思想家和頭子；一直是該黨的中央委員和其中史機羅報革命的俄羅斯編輯，一再出而批評馬克思主義，特別是企圖證明馬克思主義不能應用於農村經濟。在帝國主義戰爭年間，採取動搖的立場，搖擺於國際主義與國防主義之間；曾出席蘇瓦瓦會議(在表決該會議時時重傷)。在俄國二月革命以後，爲顯明的社會國回派，任臨時政府第一次聯合內閣農業部長，七月革命以後辭職。立憲會議主席。十月革命以後，爲蘇維埃政權最兇惡的敵人。一九一八年曾參加加羅克和社會革命黨人在伏爾加的叛亂，並領導立憲會議代表在烏贊的大會。一九二一年出席在巴黎舉行的白黨前立憲會議代表會議，該會議成立一委員會，其委員均爲社會革命黨人和立憲民主黨人。克羅斯揚科致函時，曾持索佛佛協助。近年來爲所謂「構成的社會主義」(小資產階級的改良主義之變種)底代表者之一。——(見正文第七二頁)

【八〇】那布松（波布羅夫）（一八五〇—一九一九年）俄國土地與意志黨創立人之一，一八七二年充軍至西

爾白干爾省。一八七八年，因加入友人會，又充軍至西伯利亞，直至一八八七年為止。一八九三年，與別的民粹派一同組織了「民權社會革命黨」，以代議制度代替專制政體為目的。但不久，在一系列的逮捕以後，該黨即行瓦解。自九十年代「社會革命黨」成立起，即加入該黨中央委員會，幾乎從無絕管。在反動諸年，曾反對該黨內戰和沒落的情緒。從帝國主義大戰開始起，採取和平主義立場，與契爾洛夫夫一同參加齊美瓦爾德和比塔爾會議，一九一七年八月間，反對社會革命黨中央底妥協政策，與契爾洛夫夫分手，成為當時跟着布爾什維克黨走的左派社會革命黨人總首領，一九一八年，堅持十月革命的勝利，責斥左派社會革命黨人的叛亂，並且完全與「革命的共產黨人」（他們於一九二〇年加入了俄共）採取一致立場。——（見正文第七二頁）

【八一】革命的共產主義者，乃是米爾巴爾（米爾巴爾是德國的外交家，一九一八年締結布列斯特和約以後，曾擔任蘇俄駐德大使；左派「社會革命黨人」企圖破壞與德國所締結的和約，在莫斯科作亂，殺死了米爾巴爾）——譯者註「職級以及「社會革命黨」左派暴動（一九一八年七月）以後，脫離左派「社會革命黨」的分子，一九一八年七月末，在蘇拉托夫地方脫離左派「社會革命黨」的組織和團體，舉行了會議，在這個會議上，決定召集代表大會並組織新的民粹黨。根據會議底決定，在莫斯科出版勞動意志報，這個報紙開始時是由亞歷山大洛夫、巴捷里、比爾科、多布羅澤托夫、科列加葉夫、烏斯季諾夫主編的（後來這個報紙改為對誌）。

九月二十五日在勞動意志黨代表大會上就定左派民粹黨為基礎，該黨自稱為革命共產主義黨。在代

表大會決議上特別指出蘇維埃策略立場如下：「新政國按照自己的思想和政綱說來，依然是民粹派，同時它採取切實的和誠意的奧布爾什維克合作的策略，採取真正蘇維埃政黨的立場。……它放棄秘密的活動，也不去破壞其黨成員以內外政策，它承認共產黨只是革命主要的領導力量。」「蘇承認蘇維埃政權是勞動者的階級勝利必要的條件，承認蘇維埃政權創造客觀的先決條件去建立社會主義的制度。……它認為只有蘇維埃政權是第三國際理想和社會主義唯一的一和真正代表，所以它在國際政策問題上，認為只有不削弱和不破壞蘇維埃政權而是鞏固這種政權的種種辦法，才是適當的。」

當時那唐松在他致勞動意志報編輯部的信中，也完全同意於代表大會決議（見一九一八年十月一日勞動意志報第十四期上）。

一九一九年十月在該黨第四次代表大會上，通過了「新的政綱。這個政綱雖然企圖放棄『社會革命黨』的傳統見解（例如這個政綱提『必須實行農業集體化』），然而它依然充滿了小資產階級的要求，它是民粹派折衷主義底表現。但同時它又政綱特別明顯指出這個政綱底策略基礎是擁護布爾什維克的蘇維埃政權底策略基礎。」

一九二〇年四月，又提出對於蘇維埃政權底設施——對組織勞動軍以及勞動軍之化——它應採取什麼態度的問題而召開該黨第五次代表大會，在這次代表大會上該黨底有種分子佔多數，他們企圖使黨九上積極反對布爾什維克的道路。然而該黨在中央委員會底逼迫之下，中央委員會甚至不惜把大會解散了，依然能夠保持原有此策略立場。自從那個時候起，革命共產主義者開始準備轉入俄國共產黨（一布）。共產國際第二次世界代表大會（在該大會上許可革命共產主義者派兩個有發言權的代表出席）通過關於一個國

黨內只能有一個共產黨的決議之後，革命共產黨就在一九二〇年八月開的代表會議上，通過了加入俄國共產黨（布）的決議。——（見正文第七三頁）

（八二）還在下列兩項共產黨未成立好以前，就產生了「左的共產主義運動」，而儼然成爲一派。這個運動底基本特點，就是斷然反對國會議員和反對英國工資。宗派中最火的領袖——社會工黨（*Socialist Party*）——在這個問題上曾採取最不調和的態度。這個政黨的基本核心，就是一九一三年脫離社會民主黨聯盟（*Socialist League*）在甘特受黨領導之下，降到低的社會愛國主義組織的水平）的左的分子以及帝國主義戰爭時期加入社會工黨的革命工人（因爲在帝國主義戰爭時期社會工黨革命的、反軍國主義的鼓動和宣傳曾在英國工人羣衆中起了極大的影響）。社會工黨參加了關於此一問題的談判，要把凡是贊成革命的階級鬥爭和無階級專政這種立場的左派組織合併起來成爲統一的黨派；然而它想提出以不加入工黨作爲統一的不易條件，但是沒有得到不列顛社會黨方面的贊助，因此拒絕繼續談判，同時該黨的某人被烏里、馬克曼、勞勃和別里在這個問題上表示不滿，並繼續參加統一會議，因此被排除出黨。附和左派的第二個組織——南威爾斯社會主義協會（*South Wales Socialist Society*）——乃是南威爾斯地方極端的煤礦工人的比較不大的一個團體，它帶着工團主義的性質。這個團體極端不去做革命的政黨參加國會，這就使得它與工人社會主義聯合會構想起來，而這個聯合會裏面，多半是婦女，她們在西爾菲德·潘克赫斯特氏領導之下，採取了極左的反國會的立場，這種立場在實質上只是該聯合會一般不主張政治活動的局部表現。工人社會主義聯合會（後來改名爲共產黨）宣佈自己加入共產國際之後，依然堅持自己沙彌上和策略上的觀點，在共產國際裏保持「左的」反對派地位。在蘇格蘭工人中間，影響比較大的，是工廠工人委員會（*Shop*

(*Workers' Committee*)，這些委員會是在帝國主義大戰的時候組織起來的，它們組織起來的目的，就是反對那些官僚階級和平地放棄罷工鬥爭的妥協派的工聯。工廠工人委員會不僅領導了這一時期的罷工鬥爭，而且也進行了公開的反抗宣傳。在俄國十月革命以後，尤其是在武裝干涉和封鎖的時期，工廠工人委員會曾努力進行了鼓動工作，來擁護蘇俄，要求英國政府承認蘇維埃政權並與它恢復商業關係。在對內問題上，工廠工人委員會堅持必須進行羣衆的革命鬥爭去反對資本主義的國家，以便建立依靠工人代表蘇維埃的無產階級專政。工廠工人委員會不主張參加資產階級的國會，它們同時進行了激刺鬥爭，以反對工廠內和國會外的活動。

在共產國際第二次代表大會上，工廠工人委員會代表曾發言反對共產黨員加入工黨。共產國際第二次代表大會八月六日最後一次會議上，列寧在自己的關於加入英國工黨問題的講演中，曾批評了工廠工人委員會反對加入工黨的態度。大不列顛共產黨成立的時候（一九二〇年八月二日至三日），把參加國會選舉和加入工黨這兩項列入自己的政綱，而上面所指出的那些左的團體，却依然沒有加入共產黨。它們依然獨立存在，直到一九二一年一月二十九日和三十日在里德新地方舉行共產主義組織和團體代表大會的時候為止。在這一次代表大會上，大不列顛共產黨（以前的工人社會主義聯合會），蘇格蘭共產主義工黨（一九一九年十一月在格羅登地方成立），工廠工人委員會以及其他幾個共產主義團體合併起來，成爲大不列顛統一的共產黨，它們完全站在共產國際的立場上。社會工黨這一次也不同意合併，在該黨的上層分子中間，對於加入工黨的問題，保持激烈反對的態度。該黨地方組織中有很多黨員主張與共產黨員合併。——（見正文第七九頁）

〔八三〕“*Workers Breadth*”（工人無畏報）乃是一九一四年工人社會主義聯合會（W. S. C.）在倫敦所創辦的機關雜誌。主要是西爾維婭·潘克赫斯特。該雜誌進行了反國會的鼓動，並常常反對英國無產階級革命組織加入英國工黨。——（見正文第七九頁）

〔八四〕西爾維婭·潘克赫斯特（女）（一八八二—一九二八年）英國社會主義者，在帝國主義戰爭以前，為英國婦女參政運動領導者之一。在帝國主義大戰期間，曾進行公開的反軍國主義的宣傳，因此，遭受資產階級政府方面軟禁。在戰後十月革命以後，參加極左的社會主義工人聯合會的組織（其會員主要為婦女）。這個組織對國會議員持否定態度，反對加入工黨。該聯合會出版了自己的機關報《工人無畏報週刊》，以潘克赫斯特為編輯。一九二〇年，曾出席共產國際第二次大會。以後因拒絕工人無畏報從黨的領導，開除黨籍。——（見正文第七九頁）

〔八五〕加拉克爾·蘇格羅工人，一九〇四—一九一二年為礦工工會執委委員；一九〇六年出席在柏林所召集的國際礦工大會；一九二〇年去職反對國會主義和共產黨人加入英國工黨。在共產國際第二次大會上，堅持其與共產國際基本路線顯然分歧的觀點。其立場（代表英國“左派共產主義者”派觀點）為共產國際第二次大會所責斥。為英國共產主義運動積極參加人之一，英共中央委員。——（見正文第八〇頁）

〔八六〕加拉克爾所著的論文其完全標題是：“Letter to the editor from W. Galacher in the name of the Scottish Workers' Committee of Glasgow.” (“*Worker Breadth*” No. 46, 21 February 1920.” 加拉克爾用格拉蘇哥地方薩赫蘭工人委員會匿名表致工黨的一封信）（見一九二〇年二月二十

一日工人無畏雜誌第四十八期上)。——(見正文第八〇頁)

〔八七〕克略英斯(生於一八六九年) 英國工黨首領之一，國會議員，非熟練工人聯合會主席。一九二一——一九

二二年，爲國會工黨黨團主席。一九二四年，加入英國工黨政府，爲不管部大臣。——(見正文第八一頁)

〔八八〕麥克唐納(一八六六——一九三九年) 英國工黨首領；第二國際首領之一；所著『構成的社會主義』(庶理論

家。工黨和工人代議制委員會創立人之一和工黨書記(一九〇〇)至一九二二)；從一九二二年起，爲國會議

員；一九二二至一九二四年爲國會工黨黨團首領；在帝國主義戰爭期間，採取和平主義立場(一九二二年再

度爲國會工黨黨團首領，並爲官方反對派首領。從一九二四年起，經過若干時期的左傾(當時他加入第二國際

際)以後，他又回到第二國際的懷抱裏，最後，依附於工黨的右翼(在帝國主義大戰以前及其期間，即爲

該黨首領)。一九二四年，爲第一次「工人政府」首相兼外相，實行溫和和自由主義的政策。從一九二九年

六月起，又任第二次「工人政府」首相，這個政府，在本質上，乃是繼續保守黨的反工人的和帝國主義的

政策。在一九三一年秋季，該政府到台以後，轉入保守黨陣營，領導聯合的「國民」內閣(工黨、保守黨、

自由黨)，其任務是挽救英國資本主義者。——(見正文第八一頁)

〔八九〕斯滕頓(生於一八六四年) 英國社會主義者；獨立工黨出席英國工黨執行委員會的代表(爲該黨右翼)；

下院議員；一九二四年，加入麥克唐納內閣，任財相；一九二七年末，退出獨立工黨。——(見正文第八

一頁)

〔九〇〕路易·喬治(生於一八六三年) 英國政治家，自由黨首領，屢任首相職務。在帝國主義大戰以前，竭力實行

民主改良。他把第一次世界大戰，估計爲「神聖正義」的「民主戰爭」，在這個時候，他與保守黨聯盟；

實由帝國主義者專政，使在工人階級中獲得和英國憲法基本原則，實行義務兵役制，以武力鎮壓愛爾蘭獨立運動。在三年之內，使英國公眾幫助戰時的自由軍陣地，反對薩繆爾政府。一九二〇年，在自衛軍最後失敗以後，他主張與蘇維埃俄羅斯恢復商務關係。——見正文第八四頁。

〔二〕曼徹斯特 是英國最富勢力的地方報紙之一，在曼徹斯特地方出版，反映自由黨至深廣利益。一八二一年創辦。現時主筆是斯科特。

列寧在此地所講到的路易·喬治於一九二二年三月十八日在下議院自由黨黨團會議上所作的演說，在一九二二年三月十九日第二九六五期曼徹斯特專報上所發表的演說，標題為：“Mr. Lloyd George's Speech to the Liberal M.P.s.”（路易·喬治對國會自由黨黨團所作的演說）。——（見正文第八四頁）

〔三〕阿斯克羅特（一八五二——一九二八年）英國政治家，自由黨首領。一九〇八年為首相；一九一五年為聯合內閣（有社會主義者亞德爾遜參加）首領。一九一六年以後路易·喬治當首相。當路易·喬治與保守黨聯合時，另成立獨立自由黨左翼，脫離自由黨；出而反對路易·喬治政策。在路易·喬治內閣倒台後，兩個自由黨合併，但各派間之鬥爭仍繼續進行。在一九二四年國會選舉中，又遭受失敗。一九二五年得賈斯稱銜，為上院議員。鮮明的反蘇分子。——（見正文第八四頁）

〔四〕窩雷斯（生於一八六八年）英國自由黨黨員。一九一八至一九二二年為國會議員。——（見正文第八六頁）

〔五〕應克午（生於一八八四年）英國工人運動最著名活動者之一。從一九一二年到一九一九年，為不列顛社會黨編輯報章編輯。一九二二年英國共產黨成立後，為該黨總書記。一九二二年因為在英國傳播共產主義刊物而入獄。——（見正文第八六頁）

〔九五〕耶吉爾（生於一八七四年）英海軍守備領袖，一九三九至一九四〇年任海軍大臣；一九四〇至一九四五年任首相。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前和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一貫反蘇反共。——（見正文第八八頁）

〔九六〕科爾尼洛夫（一八七〇—一九一八年）帝俄軍官，蘇聯內戰時對反革命頭子之一。曾參加俄日戰爭和帝國主義戰爭。一九一五年，指揮在加里西亞的部隊，退却時，被奧軍俘虜，以後偷跑。一九一七年四月為彼得格勒軍區司令，曾下令調動炮兵，鎮壓工人遊行示威，後根據彼得格勒蘇維埃的要求，被迫去職。七月事變以後，被委為最高總司令，迫使臨時政府恢復前線死剩，差不多將選舉的士兵委員會之權利取消，採取殘酷的辦法以對付軍隊中的布爾什維克情緒。一九一七年八月，在反革命的軍人支持和同情之下，企圖建立軍事獨裁，以此目的，向彼得格勒進軍，結果完全失敗。十月革命以後，由貝盧夫監獄逃往頓河，在該處與反革命的阿列克謝耶夫一同領導反革命的白衛軍，反對蘇維埃政權，但被紅軍所擊敗。一九一八年四月，在奧卡切林諾達爾之戰役中受擊斃。——（見正文第一二〇頁）

〔九七〕卡普（一八六八—一九二五年）德國政治活動者；保守派；帝國主義大戰前，四係與業信用機關底組織者和領導者，與奧斯普七大地產者有密切關係。在德國一九一八年革命前，為國會議員和祖國黨創立人之一。一九二〇年為反革命的國家政變——所謂「卡普行動」底主要領導者，當時，他成為政府的首領，但僅維持幾天而已。卡普政府為德國工人總罷工所推翻，此後，他逃至瑞典，在流亡中死掉。——（見正文第一二〇頁）

〔九八〕德萊福斯（一八五九—一九二七年）法國參謀總部一位軍官，猶太人，一九〇四年因被誣告叛國，被軍事法庭判處終身監禁。他是在保皇派、教會派、反猶太主義者所把持的法國參謀部之壓力下被判刑的，這

此人的目的是把出賣軍事秘密給德國的真正罪惡揭發起來（真正罪惡都是法軍當中最反動的軍官），而想藉此給共和政體以精神上的打擊，因為共和政體是允許猶太人在法軍中任官任職之權的。一八九七年秋季，社會主義者和資產階級民主派最進步的分子發動重審「德萊福斯案件」的運動，這個時候，關於德萊福斯的問題，立即獲得了顯明的政治性質。在擁護和反對重審的目標之下所進行的鬥爭，實質上是共和派與保皇派的鬥爭，而保皇派屢謀舉行軍事政變。這次審判，引起了全國的巨大騷動——羣衆的不滿意、報紙上的激烈爭論，在輿論壓力之下，德萊福斯終於被赦免了。……（見正文第一〇）頁

- 〔九九〕漢德曼（一八四五——一九〇一年）有名的英國社會主義者、律師、新聞記者。私人與馮恩相識。一八八三年成立「社會民主聯盟」，以後改名為「社會民主黨」，一九一一年又改名為「不列顛社會黨」。一九〇一年為國際社會主義局主席。帝國主義大戰前轉向擁護帝國主義；在大戰期間成了極端社會沙文主義者。一九一六年四月在不列顛社會黨傑爾伯特大會上（大多數反對戰爭），與其信徒一同被開除黨籍。之後，成立民族社會黨，一九二一年又改取老名稱社會民主聯盟。反對蘇維埃制度，主張干涉和封鎖蘇聯。漢德曼從來不是馬克思主義者，關於他的評論，可看列寧漢德曼論馬克思一文（全集第十五卷二六七——二七〇頁）。——（見正文第一一頁）

- 〔二〇〇〕抵制派乃是意大利社會黨左派小組，它在波爾迪加領導之下，努力與改良派作鬥爭，它不主張參加資產階級的國會。後來到一九二一年，在沃沃地方舉行的黨代表大會上，懷疑派由社會黨中分裂出來，成為組織意大利共產黨的基本核心。——（見正文第一一頁）

- 〔二〇一〕留特維茨（生於一八五九年）德國軍人，反動派，一九一九年曾積極參加對斯巴達克起義的鎮壓。為一

九二〇年卡普發動底組織者之一，當時，德國政權有幾天曾落在卡普為首的反革命政府手中。——（見正文第一一七頁）

〔一〕卡普是所著的論文“Ein-Gebotende Situation”（決勝負的關頭），講到魯爾區中鋼鐵工人武裝起義的事情。考茨基寫道：“魯爾區中目前的政潮，只是卡普和留特維茨底國家政變所引起來的反動。如果沒有這一次政變，魯爾區的工人就不致於實行武裝起義，那裏直到現在都會極其平靜。政府離開參加政變的人而逃到魯德加特，以避免流血慘劇，政府並不以此事為丟臉。政府自從得到勝利以後直到現在，也沒有懇請參加政變的任何人。政府是否能夠用自己的仁慈態度（雖然稍微有一點仁慈態度也好）去對待更加勤勉的工人（整個德國的生命有賴於這些工人們底手所做的工作）呢？如果政府在這一方面不採取任何辦法，那時德國人民就要受苦，那時德國人民就要過黑暗的日子。”（見“Frankfurter”報第十七期，一九二〇年三月三十日出版）——（見正文第一一九頁）

〔二〕克里斯平底論文“Neue Politische Situation”（論政潮）登載在一九二〇年四月十四日第一二三期獨立社會民主黨人底自由報上（“Freiheit”）。——（見正文第一二〇頁）

〔三〕列寧此地所引證的，是尼采的論文“Interview with Turner”（尼采著：與屠拉赫的談話），該論文登載在一九二〇年三月二十二日第三二五五號的曼徹斯特導報上（“The Manchester Guardian”）。——（見正文第一二〇頁）

〔四〕赫列維斯——意大利社會黨最老的黨員之一，其中央機關報“Avanti”底編輯，直到一九二二年為止。該會議員，意大利改良主義底理論家，屠拉赫底信徒。在帝國主義戰爭年間為和平主義者。——（見正

〔二、七〕莫其夏尼 意大利老社會主義者之一。國會議員，意大利社會黨改良派黨有名活動者。曾出席齊美其爾
德和昆塔爾會議。——（見正文第一二二頁）

〔二、七〕托斯尼 意大利社會民主黨人，改良主義者，就其觀點說，依附於屠拉佛派，主張與資產階級合作，唯
上述社會主義者參加資產階級政府。——（見正文第一二二頁）